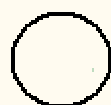
苦笑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陈公博





超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K26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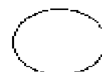
苦 笑 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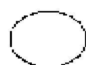
陈 公 博

（供内部参考）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4178


814178

苦 笑 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陈 公 博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四月印刷
工本费 0.80元

超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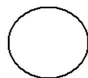


超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出 版 说 明

一九三九年，陈公博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其时，汪精卫正筹组汉奸政权“南京政府”。随后，陈公博即参与“南京政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任“南京政府”代主席。

在《苦笑录》一书中，陈公博回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记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本书写成后，陈公博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最近始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本社现翻印供内部参考。





DC44/05

超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目　录

自　序 …… 1

卷头的预白 …… 5

第 一 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 9

第 二 章　廖仲恺先生的被刺 …… 20

第 三 章　西山会议 …… 26

第 四 章　三月二十之变 …… 34

第 五 章　宁汉分裂 …… 58

第 六 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 …… 80

第 七 章　广州驱李之役 …… 106

第 八 章　《革命评论》时代 …… 121

第 九 章　护党救国军 …… 135

第 十 章　北平扩大会议 …… 149

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 …… 178

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 …… 191

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 …… 199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 208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 214

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 …… 235

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 …… 241



自　序

这本书是纪载过去几件大事的实录，清楚了它的事件，同时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内容既这样简单，实在没有“序”之必要。但我想一想，为什么我名之为《苦笑录》呢？又似乎应该略略加以说明，既要说明，那便是序了。反正要写几句卷头语之类，我不如索性直唤它是“序”。

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仿佛夏天的天气，万里晴空，骄阳如火，你偶然见着天际横着一抹淡淡的微云，也许不大而且绝不经意，然而这一抹淡淡的微云，一阵便倏然变成了骤雨，一阵或者倏然变成了狂风。身当其事的人们，自己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源，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要防患未然罢，本来似乎没有患；要补救事后罢，竟直使你来不及救，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身命也要听天由命的让其浮沉。在当时遇事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笔纪载，事已隔了许多年，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我写这本纪载，是不希望读者当作正史读的。正史是什么？等于我们过了一天，拿铅笔在月份牌那个日子画一个符号。例如今日是一月一日过去了，就在一月一日那格上横一画，但一月一日之内所经过的事情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那

横的一画丝毫也不能表示它的原因和结果！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成立，我知道将来正史是必会大书特书"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但国民政府成立前所酝酿的种种喜剧，正史是不会记载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引出来的种种悲剧，正史也不会记载的。并且历史是人做的，人有时老老实实的在制造一段历史，也有时虚虚伪伪的会磨灭一段历史。历来正史的编年纪事不必谈，即自创业的皇帝以至于揭竿的英雄，关于他们的本身谁没有过奇异的传说？只是成则为王时候，那传说便变了神迹，败则为寇时候，那传说倒变了鬼话。就算是不值一谈的鬼话罢，有时也会被人磨灭得干干净净，一点不给它记上历史。

我不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正史看，难道我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小说读吗？那又不然，大凡小说多少总带点臆想，带点虚构，否则情节和词藻都太平凡，动不起读者文学上的兴味。可惜我这本书根本没有臆想，也没有虚构，情节是那么平淡无奇，词藻是那么单调乏味，它也没有文学的价值，它也不合小说的体裁，只好当作一种零碎史料，帮助读者于读正史时候，偶然"疑不能释"，拿它作翻案的张本。

什么是写这本书的动机呢？那是我完全为着打不平。我知道将来国民革命正史出版时，一定有许多事实被抹煞的，一定有许多朋友受冤枉的，我为着打不平，所以要写这本书，我固然唤它是《苦笑录》，但读者喜欢时也未尝不可以唤它是"洗冤录"。

为着从事政治十几年，境遇把我挫磨到一点棱角也没有了，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只是爱打不平的天性，无论政治怎样

把我压迫，始终没有毁灭，依然特立。我想想大概为着遗传的关系罢，也许为着陶炼的关系罢！我为什么提起遗传呢？我父亲生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流人，他为革命丢了他固有的地位不惋惜，他为革命花了他整个的家产不懊悔，我身上有了这种倔强血液的成分，自然带了只问心之所安不问事之成败的天性了。我为什么提起陶炼呢？我在少年时即在革命里翻筋斗，儿童时代便学会那驰马试剑，听惯了那任侠仗义，使得我后来成功了一个重然诺轻生死的一个傻人。

血统既有倔强的遗传，环境又有那奢遮的陶炼，所以我一生做事都爱犯困难和冒危险。难道我真爱困难和危险吗？绝不，只是我遇困难时，心想我今日真碰着困难了，如果我能够把困难克服，岂不极有趣味？我碰着危险也有同一的想像，假定危险终于跳不过，最险也不过是死，无缘无故而碰到死，你想天下事更有比它有趣味的么？

我自少很有爱好文学的倾向，我发梦也想不到会做政治家。我不但对于政治没有兴趣，而且素来就对于政治讨厌。满清时代的政治已够我讨厌了，民国时代的政治更够我讨厌了。大概也因遗传关系罢，终于命定了要我要走上政治的一条路。谁叫我生就打不平的天性呢？少年时候跟着父亲闹革命，自己何尝有见地，有主张，不过看见满洲人统治了中国，故而要打不平罢了。民十四由美回国，何尝想从事政治，只见国民党局促一隅，一般所谓老同志的，都避义如浼，袖手不顾，故而要打不平罢了。对于反蒋，我何尝想两次首先树起大旗来作急先锋，也是看见蒋先生阴鸷谲悍，要硬磞磞的抢领袖，故而要打不平罢了。

除了打不平之外，写这本书也恐怕带几分浪漫的气息。我始终当人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做人有做人的责任，而做人也有做人的兴趣。我对于事是绝对负责的，但责任完成之后，我要保持我的性灵。远的不必说，就在实业部的当时，我办公比别人到得早，退值又比别人走得迟，但一离办公厅之后，把门一关，心想："且让部长的公博先生暂时关在这里，我自己的公博先生要自由一下了。"因此，说实在话也是我的保持性灵，终不成因我从事过政治，便再不容许我说实在话？政治真是令人够受了，为着政治，有时你不能不说心内不愿意说的话；为着政治，你有时又不能说心内十分愿意说的话。我扮要角，念戏词，真太久而且太多了，我今天不能不本着我的性灵，痛痛快快写些"求其心之所安"的实在经过。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算是说完了。我还想补一下白的，差不多在这本书里，谁都受过我的批评，读者不要说："人人都不对，难道天下间只有你一个好人吗？"我绝不承认我比别人好，或者我承认我比别人更坏，不过既名实录，应该存真，我既不愿无聊的扬善，也不愿有意的隐恶，一笔一笔的纪实，并不是故意扬己而抑人；况且这本书或者在我死后才能出版，天下更无死了才找人晦气之理？

这本书虽然写好，我知道出版是无期的。政治上的内幕差不多完全给我揭穿了，我不愿意政治还因我这本书重复惹起轩然的大波，我只有把这份草稿封锢起来，倘若我命长的话，等到书中人物有三分之二以上作古才付刊，倘若我命短的话，那读者或者可以比较的快些和这本书相见。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公博序于香港

卷头的预白

（一） 这本纪载是从民国十四年七月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止。中间少不免还有大事漏了叙述，但凡我没有参加，或者不是亲自与闻的，恐怕犯了以耳为目的弊病，不敢强以不知为知，一概从略。至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中日战事发生后，更有许多大事，那我打算另写一本专书，在此也不枝节的再提。这本书写成以后，还有大事继续发生，是不是我还补述呢？我目前也没有这样计划。

（二） "盖棺论定"四个字是中国人臧否人物的忠恕之论。这本书是写成于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天，以后书中人物必定还有变化的，但我再不等他们去盖棺，我就以今日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他们若再有变化，有机会时只好另写一篇文章去叙述，我决定不再变更这本既成的纪载。

（三） 书中有两位先生我对他们是称先生而不名；一个是汪精卫先生，他是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又是国民政府的创业者，所以我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也是统一中国的大功者，所以我也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自然我对于他两位都难保无微词，尤其对于蒋先生不满，但我依然对他们表示尊敬。

（四） 中国人的名字最难记忆，他们有大名，也有别号，

往往有人知一个人的别号，而不知他的大名，也有人只知一个人的大名，竟直不知他的别号。书中有许多人物，我只唤他们别号，原因不是我故意谦抑的代他们讳名，而是我对他们太熟了，平时叫顺了口，提笔记载时，似乎叫他们大名，反而觉得太生硬。这本书出版一定距离写书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恐怕年代湮远，读者不一定知道某人别号就是某个大名，我所以不惮烦的照着笔画的顺序，编定一个名号表，至于我单写他们大名的，那就不再烦赘。以下是一个名号表：

王法勤号励斋	王宠惠号亮畴	孔　庚号雯轩
孔祥熙号庸之	古应芬号勷勤	白崇禧号健生
朱培德号益之	朱晖日号步云	朱家骅号骝先
伍朝枢号梯云	李济琛号任潮	李宗仁号德邻
李章达号南溟	李品仙号鹤龄	李　江号冠洋
李烈钧号协和	李福林号登同	李文范号君佩
李　铭号馥荪	何应钦号敬之	何　键号芸樵
狄　膺号君武	吴鼎昌号达铨	沈鸿烈号成章
林　森号子超	居　正号觉生	胡汉民号展堂
胡宗铎号今予	胡　瑛号经武	陈济棠号伯南
陈铭枢号真如	陈　诚号辞修	唐生智号孟潇
唐绍仪号少川	徐景唐号赓陶	徐永昌号次辰
徐　谦号季龙	孙　科号哲生	夏　威号煦苍
马超俊号星樵	陶　钧号子今	张人杰号静江
张　继号溥泉	张发奎号向华	张定璠号伯璇
张学良号汉卿	张　群号岳军	张治中号文伯
黄　实号蘅秋	黄　郛号膺白	黄绍竑号季宽

黄镇球号剑陵　邹　鲁号海滨　许崇智号汝为
冯玉祥号焕章　商　震号启予　鹿钟麟号瑞伯
郭泰祺号复初　傅汝霖号沐波　傅作义号宜生
程　潜号颂云　覃　振号理鸣　叶恭绰号誉虎
彭学沛号浩除　经亨颐号子渊　贾景德号毓儒
邓演达号择生　邓世增号益能　赵丕廉号芷青
熊式辉号天翼　刘文岛号尘苏　刘　兴号铁夫
刘　峙号经符　刘　骥号菊村　刘维炽号季生
鲁涤平号咏盦　蒋方震号百里　蒋光鼐号景然
薛　岳号伯陵　薛笃弼号子良　蔡廷锴号贤初
阎锡山号百川　谢　持号慧生　戴传贤号季陶
萧振瀛号仙阁　谭延闿号组安　罗文干号钧任
顾维钧号少川　龚　浩号孟希

第 一 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于十四年七月一日，现在虽然不列入于国家纪念日，而在政府方面每年都有照例的纪念，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似乎还没有四月南京政府成立那样深刻。倘使没有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也连带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只是历史是人造成的，而有时历史也会被人抹煞的，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印象很模糊，其原因就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们极力想抹煞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那一段艰难缔造的历史。

在孙先生逝世之前，本已拟定成立国民政府的方案，无如当时大元帅所占的地方仅仅得一个广州市，在东江方面有陈炯明统属下的林虎和叶举军队，在南路方面又有陈炯明统属下的邓本殷军队，北江虽然有谭组安先生的湘军和朱益之先生的滇军，西江虽然有李任潮先生的第一师，可是都有些残破，力量未能充实。就是广州市罢，那时还有著名的杨刘军队，所谓杨刘军队就是云南杨希闵和广西刘震寰的队伍，他们自从由广西东下，便盘据着广州，把小小一个广州市划区防守，不过他们划区并非为着军事需要，而为着开烟和开赌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既在烟赌，对于大本营的命令是绝不服从

的，这样大本营还不能算健全，怎样可以改建国民政府？

说至此地，我可以回述我个人回国的经过了。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廿九抵美国的纽约市，在哥仑比亚大学的大学院整整研究了两年，于十四年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取道欧洲回国。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決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我既有了旅费，遂定于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往伦敦，经过柏林、巴黎，而抵罗马时，知道孙先生已在北京逝世。我原想更往东欧一游，至是恐怕广东又有变动，只好将原来计划变更，就在义大利的纳波里登船，直航归国。

我到广东的时候，已是四月中旬，那时汪先生随孙先生北上，孙先生逝世之后，他病在上海未归。而廖先生则因东江初平（那时蒋介石先生已带黄埔军队占领潮汕，是为第一次东江之役），也往了潮汕，只有胡展堂先生以省长资格（那时他接了

廖先生省长之任)兼代大元帅职务,留守广州。我和胡先生是不大熟悉的,因是我只往广东大学找邹海滨先生接了一次头,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

不久汪廖两先生都回到广州了,他们告诉我大本营是不能号召的,必得要改组国民政府,不过国民政府成立的先决条件必得将杨刘两军队敉平,否则不独政府命令不能出国门,恐怕还不能出府门,这样虽然把大本营改组了国民政府,也恐于事实无益。

那时国民党的兵力太弱了,要夺回广州市,势必放弃东江,但两利相权取其重,只有命令蒋先生回师会同湘滇两军来消灭杨刘军队。杨刘在广州也实在太胡闹,除烟赌之外,什么也不管,广州差不多每一条大街都有烟赌,他们的军队就是烟赌馆的卫兵,官长则淫乱骄奢,士兵则荒纵横悍;这样的军队不除,国民政府真无从成立,国民革命也无从谈起。

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

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廖先生问。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没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我说。而且我当时对于教授很感觉兴趣，对于广州的政治实在看得太不顺眼。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廖先生这时对我有点失望，但依旧带着希望的神气。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我还肯定的说。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这一问太难倒我了。平心而论，当时国民党虽然说已改组，但离所谓“组织性”还远。我只有说：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那时廖先生已把握着我的辩论弱点，直接采取攻击的姿势。

“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

着了。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廖先生很兴奋，那时他站起来，很像不答应就要决斗。

"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我不犹疑的说。

我既决定我的命运，我们便开始谈到包围广州的计划，谈到宣传的方法，谈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及其一切。我反复提出"廉洁政府"的口号和决心，否则不能做到廉洁政治，国民政府虽改组，依然不能号召，因我迷信"事实胜于雄辩"的真凭实据，徒事宣传，羌无故实，是没有用的。廖先生很赞同我的意见，那样我便决定了即日开始工作。

这次消灭杨刘的计划，实在并不怎样困难，因为杨刘的军官和士兵都有了钱，根本没有打仗的决心，东江回师的遣将调兵，成了公开的秘密，杨刘始终没有什么军事准备。大本营本来设在河南的士敏土厂，省政府也临时移驻那里办公，我们日夕往来于河南省城之间，杨刘像睡着了一样，并不加以干涉。我替大本营作了两篇文告，一篇是本着中央党部决议案，宣言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一篇是力辟中国国民党共产化的谣传。我送了这两篇文告过士敏土厂，想想政治的事已了，以后完全是军事行动，我遂送母亲到香港暂住，因为我家适居于城内炮火应该集中之地，我不想老人家担受惊恐，所以送她至香港。

我原想到了香港便赶回广州，但到了香港便碰着两件大事。第一件上海已有了五卅事件，省港正酝酿着响应，预备作

政治罢工。第二件香港政府因预防罢工，特别注意于国民党所办的《新闻报》，因此新闻报馆被搜查，该报的社长陈秋霖也因此入狱。对于香港罢工，我正注视它的发展，而秋霖入狱，我为公谊私情，都难得猝然回广州。因此汪先生在我离广州后找我参加宣传，我也不能回粤工作。

杨刘的军队不几天便消灭了，除了杨军旅长赵成梁被炮轰毙之外，其余的官兵不是归附就是逃亡。不过我在香港时，知道为着消灭杨刘，国民党的最高干部已起了破裂。有一天我碰见邹海滨先生，我非常骇异的，他也住在香港。我那时还没有官守，居住那里都不成问题，而邹先生是中央党部的常务委员，又兼着秘书处的职务，在那时军事正在紧张时候，怎样可以优游的住在香港？

"邹先生，你为什么来香港？"我很惊诧的。

"这次军事，我真不愿意过问。他们既然主张打，让他们打便了，我是不愿参加的。"邹先生很安闲的回答，而且带点不大高兴的神色。

打杨刘不是最高干部决定的吗？邹先生是常务委员，岂有不参加决议之理？邹先生这样说，我知道里头必定有文章，我虽然不好再问下去，我心里总是怀疑满腹。这段哑迷直至我回广州之后才了然，因为最高干部对于杨刘还有轻重之分，对于打杨是一致的，而对于刘震寰，最少胡先生和邹先生不赞成用武。当时为什么要打杨刘呢？除了他们违抗命令，包庇烟赌之外，杨希闵已和北京段祺瑞有了默契，刘震寰也到过两次昆明和唐继尧联络，希图打倒国民党而做广东省长。在最高干部会议之时，胡廖两先生主张各不同，胡先生主

张单打杨，而廖先生则极力主张对于杨刘一起解决。两个人争执了许久，胡先生拗不过多数的意见，只好服从决议。胡先生的主观和个性本就很强，而且他的脾气很喜欢卵翼几个军人作撑腰之具。他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名义上以代帅的资格主持，但实际上不大愿意过问的。有一次正在军事紧急时期，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有人问胡先生怎样处置，胡先生冷冷的回答："我不管，你们问仲恺和加伦罢。"照这样态度，那么海滨先生宣告中立也是不足为怪的。

杨刘败平之后，汪先生为着别的事故到香港来，要我即日到中央党部办事。我告诉汪先生我正在等秋霖出狱，否则我难于回粤，所幸没有几天秋霖已被释放，这次算是递解出境，《新闻报》也复版无期，我和秋霖一起回广州了。

我在中央党部任什么事呢？廖先生告诉我，打算在中央党部添设一个书记长。其时中央党部的制度，在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中推选九人为常务委员，而在常务委员之中又推出三人组织秘书处，秘书处只有书记一人秉承那三位秘书办理日常公事。那种制度自然不大方便，因为常务委员都很忙，每天能来办公不过两三个钟头，书记又只能起草文件，无法提挈秘书处的事务。而且中央又有好几部，所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等，每日都有事接头，常务委员既不常在，而书记又无权处理，故有书记长设置之必要。其实当时书记长也是为我而设的，说到办事，还有许多棘手。因为我当时既非中央委员，对于各部事务也不见得都能指挥和联络，我也知道办事必感困难，只是汪廖两先生既恳恳切切的要我干，我不好知难而退立刻辞谢。

814178

杨刘军事既告敉平，国民政府的组织便马上着手。汪廖两先生嘱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定期于七月一日国府和省府同时就职。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州"六二三"的奇变又已来临。原因是民众为着响应上海五卅事变，游行示威，至沙基时英兵开枪，屠杀民众，又闯下了一场大祸。因着这次事变，更促成历史有名的省港大罢工，直至我们北伐进至长江流域，国民政府将近北迁，此事才勉强告一段落。

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两日，我在中央党部办公室，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弹劾文，说国民政府成立是一件非常的大事，中央执监两会事前并不与闻，此举实为违法。弹劾文的领衔人是邓泽如先生，这个弹劾显然的给将近出胎的国民政府一个大打击。我接到公事是在下午四时，第二天便要开常会，第三天国民政府便要宣告成立。事出非常，这件事怎样办呢？我不提出罢，我在职权上是违法，我提出罢，国民政府便难于如期成立。我想了一想，还是找仲恺先生罢。我打了几处电话，才知道他在省长公署开会。我通电话至省长公署找廖先生，据说他正在开会，不能接电话。我说这是十分紧要的事，非立刻通话不可，廖先生终于离开会议席，问我有什么急事。

"监察委员会刚才来一公事，弹劾中政会，说成立国民政府为违法，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廖先生一定事前不预闻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是谁干的？"电话里廖先生的声音显然现着骇异。

"是邓泽如先生领衔的，你想该怎么办？"

"不要紧罢，明天在会议上把它打消便了。"

"我想不好，因弹劾是对中政会的，不是对个人的。我想最好通知胡先生，劝邓先生撤回。否则纵使能于明日会议打消，也著了痕迹。而且这几日间外边谣言很盛，纵使他们的弹劾不能成立，也于国民政府前途的印象不好。"我给廖先生一个贡献。

廖先生算是对于我的提议同意了，我立刻将原文亲自送至省长公署，并请廖先生无论如何夜间总要将原文送回，因若不能劝中监会撤消，翌日还须提出的。我心知这事情并不那样简单，若中执会没有委员同意，邓先生这个老实人绝不会擅自提出这种重大问题，并且非有大力的委员主使，邓先生也没有那样胆量提出弹劾。

那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谁当第一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在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当时，广州社会的推测，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尤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赞成他负那种大任。

胡先生为什么不被推为国府主席呢？也有近因，也有远因。那近因即是在这次杨刘之役，胡先生只赞成打杨而不打刘，现在杨刘既同被敉平，即是主张同打杨刘者得了胜利，而胡先生算是主张上的失败者。加以在战争期中，胡先生似乎太过于冷淡，杨刘既灭，人望更是不归。至于远因则说起来很长，那是胡许的交恶。自革命二次失败之后，本来胡先生和许

汝为先生很要好的，然而两个人的脾气总似先天似的合不来；胡先生素来自负聪明，而许先生则素来惯于骄蹇，只是一则在失败时期，没有可以冲突的地方，二是一个是文，一个是武，一时也没有利害的矛盾。一次他们终于破裂了，那是陈炯明反叛之后，许先生由江西回师救粤，不幸在北江失败，许先生便带领着残部，和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去打福建，胡先生以文人在军无用，由江西间道回至上海见孙先生。胡先生是当时大本营的秘书长，论起失败责任，自然也不能完全诿卸。然而胡先生是素来自负聪明的，聪明人焉可以打败仗？所以虽然没有一定的要成则居功败则诿过，但至少对许先生下了许多苛刻的批评。许先生在福建时已经听见胡先生的评语，怒不可当，迨后来由福建回师广东，中途又打了几次败仗，孙先生对之更感不满。许先生以为孙先生对他不满，其故都由于胡先生的中伤，以一个素来骄蹇的人，自然更不会和他认为对头的自负聪明的人合作。这次统一东江和敉平杨刘，粤军第一军都建有殊勋，许先生是第一军名义上的主帅，这次改组国府他倒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于是结合了一般将领的力量，得了最高干部的同意，内外合力，共同拥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

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都是胡先生的致命伤，除此之外，胡先生更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当时军队的数量以许先生的粤军为最多，军队的素质以黄埔的党军为最锐，其次谭组安的湘军，朱益之的滇军，对于胡先生皆恶感多而好感少，在这种错综复杂情形之下，大家对于国府主席皆瞩望于汪先生了。

记得当日中政会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欢而散。因为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只把政治委员会主席让之胡先生，那种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极感不满。后来更因国府草创，仅先成立两部，财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题大发脾气，说他本人不懂外国语而任为外部部长，迹近玩笑，不待议终，当即发怒离席。鲍罗庭花了许多唇舌，扮作调人，说李鸿章也不懂外国语而为有名的外交家，在国府筚路蓝缕之时，非有一人才干如胡先生者不能胜任，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这样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后来廖先生的被刺，西山会议的召集，种种恶因，都种于国民政府改组的当日了。

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夕，那真是危难四面，局促一隅。蒋先生由东江回师之时，陈炯明的军队又占领了东江，重要城镇的惠州且告失陷；南路则为邓本殷所据，渐渐迫近了江门。尤其困苦的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惨案，省港罢工，英法兵舰云集广州，差不多随时可以惹起严重外交，颠覆政府。然而时期已定，决心不再变更，国府终于七月一日依期成立，我也徇了汪廖两先生之约，任职广东省府的农工厅，兼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这是国府成立之前夕，且是我个人从事政治事业之始。

第　二　章

廖仲恺先生的被刺

国民政府成立之翌月，那就是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的门首。

在廖先生未遇害的前两个星期，社会上已有若干的谣传，说某人对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某人和某人已被列名于杀害之列，一时谣诼四起，风雨满城。

就是八月二十之前两日罢，这种谣传已吹进了国民政府。有一次在会议席上，廖先生刚坐于汪先生的侧边，汪先生曾写一张条子给廖先生，说闻得有人将对于他不利，请他注意。廖先生耸耸肩头笑了，说："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那日清晨，我刚到农工厅办公，中央党部的庶务科长刘陶打给我一个电话：

"廖先生被人打了。"刘陶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急促。

"怎样打法？"我问。其时我的态度还镇静，因为广东话的"打"字含义太模糊，而且工会终日罢工，示威游行，互相斗殴，因打架而殃及旁人，事所常见。

"是用枪打的。"刘陶的声音显然露了颤抖。

"在那里？不要紧吗？"我那时陡然忆起近来的谣言，知道事态很严重。

“在中央党部，现在已送‘公医’了，请你到‘公医’看他罢。”电话立刻收了线，大约刘陶要赶到广东公立医院了。

那时农工厅的地址在西门内的光孝街，而公医院在东门外的百子路，那两所地址正处于东西两极端，我们那时做厅长的大多没有汽车，每天办公往来完全以人力车作代步。这样我要走到百子路，起码也要一个钟头，我立刻叫人雇了一部汽车，苦的是等了半个钟头，汽车还没有到。在等汽车的时候，心内真是又焦急，又悲痛，只有自己安慰着，希望所伤的不是要害，而且更幻想着，或者我到时，廖先生已包裹好已经出医院。

我到百子路时，已经是九点多钟，我进公医院门首，已有不少的人进进出出，我看多数的人都是央党部的职员，面上露着沉默和严肃。其时刘陶已先到，我问他：“不要紧吗？”刘陶哽咽着说：“大概没有希望了！”我刚上楼梯，汪先生的眼已满含着痛泪走下来，一见我便说：“公博，你也得注意：暗杀名单内你也是有名的。”我其时只顾着看廖先生，对于汪先生的警告也无暇回答。

廖先生躺在一间病房的床上，鲜血满身，两只眼微微的睁开，眼球凝住，显然的再没有希望！医院那时显出混乱的情形，我看见廖先生再无回生之望，不觉悲从中来，禁不住大哭。廖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已止住了哭声，告诉我们廖先生被害的情况。

原来那天早上中央党部开会，廖先生是八时以前坐汽车去中央党部的，刚出百子路碰见陈秋霖，廖先生知道秋霖有事和他商量，拉他同车一起到中央党部谈话。汽车进了党部的门首，廖先生下车时，便见几个人由大门冲出来，开枪向廖先生轰击。

“我当时只见火花撩乱，也不知道廖先生受伤，及见廖先生倒下地来，我也覆在他身上。我问廖先生受伤没有，廖先生

已不能答，我于是抱他乘着原车到公医来。"廖夫人这样一边啜泣，一边诉说。

眼见廖先生不能再活了，这是对于党国何等的损失！同时我已知道陈秋霖腹部也受了伤，而凶手之一的陈顺，已被邓泽如和廖先生的随从击伤，现在也抬到公医院疗治。我神态稍为安定之后，便去探问陈秋霖，那时他神色还很镇定，只是医生不许我们谈话。至于凶手陈顺已受重伤，入了昏迷状态，看当时情形，自然主使者大有人在，而凶手也不止一人，不过凶手重伤，当然得不到口供，等到他伤愈之后，始可审讯。

正待重入廖先生的房间，许汝为先生已来，他告诉我们暗杀的名单共有八人，汪先生和我的名字都在内。汪先生那天因为手肿，没有到党部会议，否则或者已经和廖先生遭遇同一命运，也未可知。许先生并嘱我赶快到粤军总司令部一谈，因为缉凶善后，非详细商榷不可。而且许先生说，在这个时候没有卫兵是不行的，硬要派八个卫士跟我进出。

我们出了公医院便到粤军总司令部，那时粤军总司令部设在东门外省议会的旧址。总司令部的参谋们和副官们面上都露出惶惑和紧张，路上的行人和道旁的树木入我眼里似乎都在表示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无疑的这次事变是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损失，因为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组之后他赞襄孙先生也最多，这次损失固然难以计算，而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已横了一重阴暗的云雾。

谁是幕后的主凶呢？在中午时候，情况渐渐明了。凶手陈顺昏迷时候频频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名，而且凶手被擒时候，遗下一枝头号曲尺的手枪，在广州当时，

人们有这类手枪是很少的。许汝为先生想起梅光培认识朱卓文，遂叫人找梅光培来，看他能否认得这枝凶枪的物主。

说到此地我似乎应补述一下朱卓文的历史，朱卓文曾做过孙先生的卫士，历来广州有事，他都是"搅民军"一个角色，有一次他居然做过很短时期的民军统领。梅光培也是历次"搅民军"的，广东所谓"搅民军"，即是组织和运动土匪流氓的意思，梅朱两个人因"搅民军"时常往来，粤军中人谁都知道，所以这次汝为先生一找便找梅光培来认那支曲尺。梅先生来了总部之后，果然认出这枝枪是属于朱卓文的，他举出证据，说有一次他和朱卓文玩鸦片烟，朱卓文因带了手枪累赘，困着烟床不舒服，遂解出来搁在烟炕。头号曲尺是很难得的，梅光培欣赏好些时，因此确认这支手枪是朱卓文之物。凶手既已得了主名，粤军总部派兵到朱卓文寓所围捕，但朱卓文行刺得手，立刻走过了河南，并驾了一只汽艇逃到了乡下了。后来朱卓文投到一个土匪唤做雷公全的，那土匪把他监视起来，要求国民政府给他一笔赎金。但不知什么原故，往返磋商，没有结果，国民政府在广州始终没有拿到归案讯办，至到民国二十五年才给陈伯南拿住枪毙。不过他枪毙的罪名不是为廖案，而为的是他阴谋想推翻陈伯南本人，我打算叙述这件案件之后，才补他一笔。

朱卓文固然是主凶，但他这个人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显然他的背后还有主使的人物，于是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三个人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汪先生、许汝为和蒋介石三个人，委员会的权力是受之中政会，不止可以调动军警缉凶，而且可以扩张范围乃至于镇压反动。

中央党部为镇压反动起见，加紧宣传，除了决定国葬廖先生之外，更以中央党部礼堂为廖先生停灵公祭之所。当时我为着医生嘱咐，还见不着陈秋霖，廖先生的逝世，我们也瞒着陈秋霖。无如廖先生逝世是一件大事，秋霖虽然被瞒着，但到廖先生灵柩离开公医院那天，秋霖已是知道了。秋霖睡在病床听见礼堂奏哀乐的声音吹进耳中，问看护是不是廖先生已逝世，看护说不是，秋霖叹口气说："你们也用不着瞒我，那哀乐一定是为着廖先生奏的。我没有别的痛惜，只是国民党前途不知将来弄成什么样子罢了！"离廖先生逝世的几天，秋霖也是不治，因为秋霖虽然中了一枪，但是在腹部，开刀经过虽然还算良好，但希望不要发炎。然而秋霖的热度慢慢高，医生遂宣告束手。我们也把秋霖的灵柩抬到中央党部，安在廖先生之旁，这场惨剧算是告一段落。

廖案主谋是什么人？那显然是党内左右派之争，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特别委员会对于廖案，认为若不彻底办去，反动即生，于是由蒋先生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同时得许汝为的同意，革去第一军长梁鸿楷而代以李济琛，扣留两个粤军统领梁士锋和杨锦龙；更解散几枝杂牌军队，因为这些军队都与右派有渊源，而于这次暗杀案恐有相当的关系。不过认为主要人物胡先生的堂弟胡毅生是逃走了，当时哄动一时所谓右派十人团的组织因此受了打击，

然而以后许多党的问题依然还是无法解决。

胡先生因为他的兄弟被捕，那天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请他的夫人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不过因此胡先生的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

平情而论，这次有组织的暗杀是不是和胡先生有关呢？汪先生说得好："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个解释也很明了，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阻止，这是事实。

后来许久汪夫人告诉我，当时所谓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见胡先生。问胡先生："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胡先生不答。李天德出来对人说："你们怎说胡先生要杀廖先生呢？我问他是不是要杀廖仲恺，他始终仰着头没有答我。"听的人答道："你真是傻瓜，他的不答，就是答应。难道他当面叫你去杀吗？"我们于这种问而不答情形之下，大概十九得其真相了。

固然我不愿意深文周纳，也难得到实据真凭，不过后来民廿五的时候，朱卓文已大摇大摆做了中山县的沙佃局长，陈济棠发觉他有颠覆他政权的阴谋，捕获就地枪决时，胡先生旅居香港的妙高台，还正式打电陈济棠保他。依公义而论，朱卓文还是被通缉的犯人，实在不应委他做官，捕获之后，尤不应明电保释。依私交而论，胡廖无论政见如何不同，终做过出生

人死的患难交，明明是廖案的主凶，而胡先生不恤人言去电保。我们后来论史的，似乎于此有以窥其微罢！

跟着廖案不久，又有蒋先生驱逐许汝为的事件，这件事自然和廖案无关。当时蒋先生对于中政会的报告，有数许汝为十大罪状之事，这事的内容非常复杂，而最大的问题为着许汝为把持财政。在该事发动之前，蒋先生已商好许汝为部下第一军的李任潮和陈真如，而许先生自己嫡系之第三师谭曙卿又早已为人收买，因之半日戒严，而许先生不得不悄然赴上海了。这事本与廖案无关，我之所以补此一笔，因为汪胡后来之极端交恶，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我前文不是说许先生藉着廖案想要杀胡吗？许先生这次走沪，自然恨极汪先生，因为他的意思，以为汪先生之任国府主席，他有殊勋，此次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沪之后，后来会见胡先生，反说廖案之时汪实在要藉故杀胡，所以没有实行，完全靠他反对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难容物，现在先入许先生之言，真以为实有其事，后来汪胡始终不能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　三　章

西　山　会　议

“西山会议”，到了今日，人们对它的印象已慢慢模糊了，也许简直已经忘记了，不过西山会议在民十四年时的确是国民党内一件大事．它影响三月二十之变，它影响宁汉分立，它

影响到宁汉合作后的特别委员会，它影响到民十九的扩大会议，直到四全大会之后，西山会议派才慢慢的消灭。

构成西山会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国民党内的反共空气，第二个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失意份子反攻。就第一个原因说罢，到了民国十四年，共产党的气焰的确咄咄迫人，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这班共产党的确犯了列宁所谓的幼稚病，就其大者来说，只知道本身的利益，而不知道革命全体的利益。在广州时候，无日不看见工会分裂，工人罢工，我在农工厅时候，门口排列行打行的工人请愿，是日常司空见惯之事。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经过考虑的，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抓工人，势不能不煽动罢工，工人一罢工便势不得不请求援助。共产党把持操纵的总工会便趁势出头，一面派人指导组织，一面予以经济援助，更一面遣派代表至官厅替工人要求；这样经过一次罢工，共产党便多抓到一些工人，或一个工会。可是共产党当时忘记了它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它是赞成国民革命的。广州既是国民政府的治下，而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那么政府维持秩序的作用已完全失掉。这样情况慢慢恶化，于是变成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不革命的了。共产党当时也未尝不感到这个矛盾，但因为要抓工会和工人起见，也不得不走这条歧路。那时不止广州为然，在国民党治外的各地也莫不然，只是在国民党治外，这种矛盾减了一点直接摩擦罢了。虽然在国民党治外减少了对立的矛盾性，

可是同时发现了别一种的工作问题，就因为国民党的工作显然没有共产党的努力。那是不是国民党人的能力比不上共产党呢？那不是的；第一，共产党的宣传，说三民主义不彻底，共产主义才彻底，学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异的，也是比较单纯的，三民主义太复杂了，焉有共产主义那样明了！诚然他们对于马克斯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辩证法，也都摸不清，而且根本中国没有人能够翻译。但他们索性不去研究，只拿着陈望道先生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作法宝便够了。共产宣言那么的明了，开始说明世界都是斗争的，平民和封建斗争，农奴和地主斗争，及资本主义勃兴，又变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结果资本主义自掘坟墓，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劳工专政。这样简单的说明正合中学生的程度和脾胃，又加上中国非科学的社会，一切数字和统计又很模糊，就是要用功研究也无从着手，于是三民主义真太复杂而共产主义真太简单了。第二，所谓各地工作，无过于罢学与罢工，国民党对于这些工作没有特别的预算，而共产党有它的特别费，所以除非学生不游行，工人不罢工，如果有游行和罢工，只有见着共产党的活跃，而见不着国民党的活跃，国民党就有活动能力的党员，也不得不依共产党为附庸，这样一来，便相形见绌，在国民党内反共的空气遂觉得"放之则弥六合，养之则退藏于密"，所以就使没有西山会议，反共行动迟早也会在国民党内爆发的。

说到第二个原因，那更明了，其初国民党干部有打杨打刘不同的主张，其后有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失意份子，更且有廖案的嫌疑犯，和蛰居上海的失职军人。这一班人不止主张不同，自胡先生出游苏俄之后，更怀有人人自危之念。广东对于这

一班人也加以不断的注意；在上海的自然无法监视，在广州以内的，自然希望他们早一点离开。当时这个算盘在我事后平情的观察，不能说是有什么恶意，只是希望他们不再在广州捣乱。不幸的很，这个计划头一步便落到广东大学邹海滨先生身上。邹先生对国民政府实在太不满意了，第一，他是赞成打杨希闵而不赞成打刘震寰的，后来毕竟杨刘同归于尽，使他不能维持对于刘震寰的友谊。第二，他当时办成广东大学，很算经过一番辛苦经营，到了国民政府成立，广东大学便头一个受了严重的打击。原来当日的广东大学，便是今日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向来没有大学，只有高等师范，和法政工业两个专门学校，邹先生自从陈炯明叛变之后，已丢了两广盐运使，他很想专心办教育，所以想出一个广东大学计划，把高师改为文理科，把法政和工业专门学校改为法科和工科。不过那时一切财源都落在杨刘军人的手，政府人员的薪俸尚且无法维持，那里更有钱来办广东大学？邹先生靠的是刘震寰友谊，于是在刘震寰手里让出几项税捐来办大学。到了国民政府成立，标榜军民财政统一，廖先生当首任的财政部长，便提出广东大学所包办的捐税要收归财政部，由政府支配统筹，而广东大学的经费以后由国库支出。但广东那样穷困，谁人能相信政府能够守约呢？于是邹先生认定这是廖先生特予他个人的打击了。

邹先生既对国民政府不满意，自然时常有些辛辣的批评，而国民政府也认邹先生为不稳分子，希望借个题目使邹先生能够早日离开广东，免得再有别种意外的举动。恰巧在国府成立之前有沙基惨案发生，国府于是用人民名义组织一个宣

传团，到南北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的真相。谁作领队者呢？最好是邹先生和林子超两先生了。当日我想邹先生作领队是国府打算请他暂时离开广东的，而林先生作领队，因为他有当过参议院院长的资格，请他凑数的。

邹先生到了北京之后，便计划着择地开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反对广东，但因后来人数不能超过半数的法定人数，才于十一月十二日在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开会，开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和警告国府的当局。这个会议自然算是非法，但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支持。例如一班老先生如张溥泉、居觉生、谢慧生，那是公开活跃的；许汝为、胡展堂，也是支持的；就是吴稚晖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也表示同情，不过不大主张这样干的；孙哲生先生、伍梯云先生和古勷勤先生也有若干关系的。

西山会议的一群，自然还算邹先生为最活跃，在西山会议之后，他还在上海召开一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广州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遥遥相对，照例也选出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旧址成立中央党部，同时也照例指派各地地方党部，在中国内地没有什么活动，然而在海外倒有几处支部非常活跃。

我叙述这段西山会议，算是告一段落了，至于它的后来影响，我以后叙述别事的时候，再附带描写。不过当中牵连到我身上的还有短短一段滑稽故事，我很想补它几句。

邹先生在离广州的时候，大约也不打算南返，于是广东大学遂鼓起罢教风潮。一般邹先生所聘来的教授，自然不便说要挽留邹先生，因之抬出经费无着的口实，开始罢教。

广东大学当时已经有了无数的小组织，共产组织有郭寿华、黄光明诸人，反共组织所谓士的派有张农、何觉甫诸人。邹先生既已远离，学校是无主了，教授又都罢教，学校更是骚动了，但共产的组织是反对邹先生的，同时而连带反对罢教的。就是反共产的组织，当时有力的分子多在三四年级，他们行将毕业，也不愿就此散伙。教授只管罢教，而学生还要求上课，广东大学当日的情形，很有点骚乱而无法镇定的样子。

为了广东大学的校长问题，迁延两个星期，中政会无法解决。谁来当校长？很是一个问题，到了最后，汪先生只好逼我出马了。我还记得在会议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

“广东大学校长问题，再不能迁延不决了。”汪先生坐在主席的地位，在讨论一般政治问题之后，慎重的提出。

“最好汪先生自己兼，我想没有别人比汪先生更适当的。”谭组安先生笑着提议。

“国府主席怎好兼大学校长，就纵使我能分开身的话。我看还是组安先生罢，因为你是一个翰林院。”汪先生也笑起来，提出了对案。

“若以翰林而论，我是老翰林不中用了，倒不如梯云先生，他是洋翰林。”组安先生望着伍梯云，他知道以汪先生来兼校长也不会通的，所以修改了他的提案。

“我不是不愿干，我实是怕麻烦，如果有人能够把罢教风潮平息下来，我也愿意干。”梯云先生倒不客气，但露出非罢教完毕，不轻于尝试的口气。

汪先生知道这样揖让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望着我说：

"公博先生，还是你去罢。"

我听了汪先生的提议，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吓一跳。我首先申明我实在没有工夫，因为我已经兼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政治训练部，一个是农工厅，两者有一于此，已够我忙，何能再兼大学的校长。其次，办教育一件事不可视为儿戏，尤其教育行政，万不可以兼职，我虽然也学过一些教育学的，但校长是一校行政之首，绝不应更使一个百忙的我来兼。如果汪先生一定要我干，须先把我两个职务免职。

"你先去把罢教风潮平息，然后另找别人去干怎样呢？"汪先生提议。

"公博先生去很好，他必定有平息风潮的能力。"组安和梯云为图卸身事外，赶快和议。

我知道当时决没有人肯冲这度难关。汪先生自然不会兼校长，而组安和梯云又都是有经验的聪明人，谁也不愿去找麻烦，大概也因为我当时太豪气罢，于是挺身答应，只是声明仅仅维持三个月，把罢教风潮平息之后，请汪先生另行派人接替。

我到广东大学不出三日，果然教授都复教了。那自然不是我的功劳，因为学生无论左右派都愿复课的，至于教授真要罢教的不过少数人，大多数的教授只要经费有着，也不愿把这学府毁坏。我到广大接事之后，便召集教授学生在礼堂讲演，起初四座有些吁吁的声音，及我再申叙我对于广大的意见，四座再听不见嘘声，迨至末了反而鼓掌群起。我自然也不以嘘气为损害我的尊严，因为那反对空气早在我意料之内，我也不以鼓掌为满足，因为欢迎空气也在我想像之中，不过我的原则，以为无论什么问题，你若把你本身问题搁在问题之

内，自然解决困难，你若把本身问题搁在问题以外，自然解决容易，我解决广大罢教问题，也是应用这个原则。

教授是没有问题了，只是学生问题没法解决，学校虽然复了课，但学生的小组是无法打破。我当时实在太忙，有时竟直两三天腾不出工夫到办公室。一群学生更和工人勾结在一团，左派学生勾结省港罢工委员会，右派学生也勾结了反共的各工会。学生参加工会游行示威，大家采取了对立的形势，有时左右派的学生冲突，竟勾引工人至校内斗殴。我虽然严厉的处置了几次学生，但想一想，我不辞校长，只有辞政治部或农工厅。我向汪先生辞职好几次，汪先生都踌躇，有一天他很欢喜告诉我："褚民谊回来了，你可以卸广大的责任了。介石也说：'让公博再干下去，广大必会大乱。'"

我很高兴辞去广大校长的兼职，只是我这一辞倒出乎广大教授意料之外。原来外间的传闻，说我之长广大是共产党阴谋夺校的一种计划，就是邹先生在上海发表谈话也如此说，我的老友周佛海先生在上海发表文章也如此说。有一天法学院长余恺湛来见我，说有人在蒋先生处告发我在广大蕴有阴谋；事实是这样，在夏天的一天，广州公安局长李甫溟家内来了一位蒋先生的秘书，因为夏天，热气太熏人，他一到便脱下长褂子，叹一口气。李先生问他为什么叹气，那位秘书先生说：

"有人在蒋校长处告陈公博办广大有阴谋，蒋校长叫我去查。你想既是阴谋，那里能查得出呢？这不是苦差事么？"

"谁去告发公博的？"李甫溟问。

"听说是褚民谊。"那位秘书又叹一口气。

这一段故事，又离奇，又滑稽，但我既已脱身苦海，也不再追问。此事后来在北平扩大会议时碰见邹海滨先生，有一次闲谈接收广大的经过，邹先生忍不住笑起来：

“真的，我们以为你接广大是共产党的阴谋，哪里知道那样左推右推，才推出你来受苦。”这一段滑稽故事，遂在彼此一笑了之之下结束。

第 四 章

三月二十之变

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之变，其难解是在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是在结果。我听说蒋先生曾在他的日记略述三月二十之变的来由，不过截至我写这篇记载为止，蒋先生还没有将他的日记公布，他的记载只是一种非卖品，专用以为对于他的部属宣传，我始终没有读过。只是有一次汪夫人陈璧君对我说过，她一日无意中在汤山俱乐部见过一次，我问她怎样说法，她笑一下说：“还不是说那次因为汪先生要杀他吗？”

事变的时候，我住在广州的东山，那个地区是在广州中比任何地方为幽静的，蒋先生的住宅离我不远，而在沿河的地域，住满了俄国顾问团。三月二十的早晨，大概还没有到六点钟，我还睡在床上，站在门口的卫兵直入我的卧室报告，说东山地区全部已戒严，许多军队把俄国顾问的住宅包围起。我

心内狐疑这是什么一回事，说解决不稳的军队吗？当然我会预早得通告。说是一种政变吗？自然我的住宅也会包围，因为我那时总是被目为左派，而又为当政人们的一个比较重要角色。我穿好衣服之后，打一个电话到国民政府，问那里有什么人，国民政府的副官回答，现在还早，不到办公时间，还没有人到办公室。我问那副官有没有军队包围国民政府，副官在电话回答说是没有。我再摇一个电话到西华二巷汪先生家中，无论军用电话或普通电话都一样的没有声息。我想或者是有事了，还赶快盥洗，穿上军服，吩咐汽车夫直驶汪公馆。我出到东山马路铁路的旁边，看见戒严的军队都是第一军，更见陈继承团长带了士兵在那里警戒。我知道问陈继承是问不出什么原因的，但因为士兵都属于第一军，心里倒放下一个重担，知道并不会有什么政变。因为当时第一军都叫做党军，广州无论朝野都以为最靠得住无过于第一军的军队，那里会有党军叛变党的呢？

我到汪公馆门首，倒看不出什么异样，汪先生早在十九日请假不到国府办公，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最后见汪先生是在十八夜，那天汪先生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在省政府的洋花厅宴请各军政治部主任，是夜参加宴会的有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至于第四军的政治部人选还未任命，所以没有人参加，我是全部军队的政治训练部主任，自然是一个半主人的陪客。席间汪先生对我说："今日不知为什么，在黄埔军校演讲时，有些头晕，现在还是昏昏邓邓的，大概老毛病又要复发

了。”我说汪先生太辛苦了，应该休息一下罢，汪先生笑一下说：

“那能够！我说给你们一段故事。有一次监狱里头有一个囚犯患了病，狱医来看过之后说：‘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话是好听的，你想一个囚犯怎能可以自由地搬到别处疗养？我现在就是十足那个囚犯。”

汪先生拿出这个譬喻来，大家都笑了。然而十九日下午我在国民政府已见不到汪先生，我问起秘书长陈树人先生，才知道汪先生因病请假。我问陈先生说：“昨夜汪先生还不愿请假的，怎么今天倒不来？”陈先生笑说：“大概汪先生的病给汪夫人发觉了，汪夫人一发觉，那肯让汪先生来办公。”

我到汪先生楼上，汪先生倒不在卧室，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面色苍白，显然病很沉重。汪夫人见我来，问我有什么要事，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

“外间戒严，汪先生知道吗？俄国顾问的公馆也被包围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匆促的问。

“我完全不知道，正在有人来报告，我还在怀疑。”汪先生这样不大经意的答。

“我刚才打电话到这里，连电话也不通了。”我追究电话不通的原因。

“那是璧君因我病，怕电话嘈闹，故意把听筒搁起的。”汪先生在解释。

我正在详述东山戒严的状况，谭组安和朱益之都到了。据他们的报告，说蒋介石找他们，托他们转呈一信给汪先生，我们看那封信，是蒋先生的亲笔，大意说共产党意图谋

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等语。谭组安先生并说蒋先生已占了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已扣起来，至于第一军的党代表无论是否共产党已于昨日下午全体免职，概行看管。

“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先生很愤慨的坐起来，禁不住一阵头晕又倒在床上。

“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组安和益之两人同时这样献议。

到底蒋先生当时怎样企图，实在大家都不懂，说反对汪先生吗？当日汪蒋的交谊特别厚，谁也知道。说反对共产党吗？蒋先生最近的演讲还企图消灭黄埔校内共产和反共产的斗争。这件事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除了接受谭朱两人的提议以外，实无其他办法。

“我也和你们一齐去造币厂。”汪先生立起来，抓着一件长褂穿上，可是穿上一半又晕倒在床上。

“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夫人很焦急的劝阻。

“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汪先生重复睡下。汪先生从来不肯说这种自负的话，大约当日真是气极。

“我们是去了，但会不会给介石扣留，实不可必。现在更没有别人，我们想托公博先生通知鲁咏庵和黄蘅秋，吩咐军队准备，以备万一之变。”谭朱两先生也露了忧虑，对我这样嘱托。

"两位只管放心去，通知两方军队的责任都在我的身上。"我义不容辞的答应。

组安和益之刚离汪公馆，宋子文和李任潮两先生又接踵而来。那时汪先生已不能多说话，只由我草草告诉他们经过。

"我也想到造币厂看看。"子文先生说。

"你去不得，过去对于财政，介石对你很不满意的。"汪先生劝止了宋子文。

"任潮先生，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先生向着任潮征询意见。

"今日哪里有办法？不只电话电报给介石派人守住了，连铁路和轮渡的码头他也派人守住了。现在谁也不能离开广州半步，离开是有危险而于事无补的。"李任潮还是很安详，露出素来慢吞吞的神气。

我因为要通知第二第三军的军部，不等两人谈毕，便马上动身。那时鲁咏庵是第二军的副军长，黄蘅秋是第三军的参谋长。我到高第街第二军部通知了鲁咏庵，到大沙头第三军部通知了黄蘅秋。据他们说，命令是不能由电报发出的，只有派人送去，不过他们的军队都远在北江，第三军最近的驻扎地也在新街。我们商量了半天，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勒兵以俟后命。我通知了两人之后，便又回到汪公馆，报告了汪先生，更自告奋勇，看守国府的大本营，遇有政治的紧急处置，我打算便宜行事。

到了国府之后，陈树人先生已来，我略述早上的经过，又打个电话到家里把我的铺盖送到国府，预备在那里住宿。陈先生倒若行所无事，不大感觉重要，他是一位画家而兼诗人，

他看事的轻松就等于脩逸的诗画。他以为局面是不要紧的，介石是不会反汪的，他看政治的内容，跳不出他绘画素描的简括。

下午的形势已和缓多了，我再到汪公馆，知谭朱两人已经回来，只说介石要限制共产党，其余则得不到什么要领。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那时国民党人心目之中，不论其为左派或右派，无不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立刻分共，抑或给予他们活动上一种限制，种种细目上的商榷，只好偏劳奔走的谭组安和朱益之去办，我既无事可干，只牢守着国民政府。

约摸在三点钟左右，周恩来和邓择生都来了国府，周恩来不承认共产党有谋叛事实，惟对于国共的冲突，也希望得到一个和平调停的办法。周恩来是露了脸的共产党人，自然对我谈话采取让步的语调。周恩来去后，邓择生便掀开他的理论话匣子了。

"公博，你看国民党的寿命到底有多久？"他挺起胸脯，象对学生发问的神气，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而又是黄埔军校现任的教育长。

"你怎样观察？"我冷静的反问他一句。

"我看国民党只是一个清道夫罢了。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必来一个共产革命。我以为国民革命完成之时，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日，我们仿佛是一个清道夫，扫除道路让共产党去走。"邓择生去了一次德国，似乎已经熟读柯茨基的国民革命论，和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宣传品。

"算了罢，择生！我总不以你的理论为然。我看马克斯的

理论仅象英国亚丹斯密的《原富》和亚尔萨斯（按：应作马尔萨斯，原名是 T. R. Malthus。）的《人口论》，在著书的当时未尝没有他的时代价值，但时代一过，理论便暴露了它的错误，你怎样可以奉为圣经？而且就照着共产宣言，要大资本吸收小资本，中等阶级消灭之后，才形成有产和无产两个壁垒斗争，这种事实，不独中国难于实现，就是欧洲各国的中等阶级天天还在那里增长。我只有在理论上见到阶级斗争，而在事实上难于发现它清楚的分野。"我也以我的理论来反驳。

"你这样连俄国的共产革命的事实也否认了，是不是？"择生很象握着胜利之环。

"那么你以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照着共产宣言所说，资产阶级自掘坟墓吗？"我也拿事实来反抗。

"那是俄国的特殊情形。"择生还分辩。

"这样中国就没有特殊情形吗？如果我们真照着民生主义去干，我以为终可于国民革命之中，达到完成社会主义的目的。"我抓着邓择生所谓特殊情形的弱点。

我们辩论了许久，终归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口头斗争。我们知道两个人口头辩难是时常得不到结论的，何况两人都带点主观，结果我们又把理论斗争停止下来，而谈到三月二十之变怎样去收拾。

二十一那天整天往返磋商善后的细目。我因为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例如党代表是归我管辖的，经这次事变，这种制度就根本发生问题。我整日都焦心于筹划维持现有的制度，至于怎样去限制共产党，我也懒得去管，而且也不需要我去管。

二十二早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了，这次会议，因为汪先

生不能起床的缘故，所以开在汪先生家中。开会之时，汪先生依旧睡在床上，我们环着床来讨论。那时蒋先生也来了，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说话，似乎有点倔强，也似乎有点愧怍。那次的讨论也简单，第一是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第二请俄国召回军事总顾问基散加。这位基先生是在加伦将军走后才来的，听说有点跋扈，而和蒋先生时时意见相左。末后更讨论到怎样停止省港大罢工，指定陈友仁、宋子文和我三个人作国府的代表，相机和香港政府交涉。此事末后我因参加北伐，始终没有和香港方面接过头，其后以"革命的退却"为名，草草结束了罢工，我因那时在汉口，其中经过，我不大明白。

经过这次会议，我们以为三月二十之事可以告一个段落，谁知二十三日我去找汪先生，据说他已不见客，过了几天，听说他已不在西华二巷居住了。自此之后，我更不知汪先生的消息，有些人说他已离开广州，有些人说他还在西关养病。后来许久才知道他离广州之时，还和胡展堂先生同船，这一段离奇的经过，我也想补叙一下。

为什么有三月二十之变，我们还蒙在鼓里，而上海各地的所谓右派已盛传此事专为驱汪。因此胡先生不久遂从莫斯科赶回，希望重新把握着政治。然而那时鲍罗庭也回来了。据说他以前离开广州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控告他太妥洽和不革命，所以莫斯科调他回国而代以基散加，现在基散加碰了钉子，莫斯科又急命鲍罗庭和加伦赶速回粤。我不知基于什么条件之下，蒋先生又和共产党妥洽了，据说是俄国协济军械的结果，所以蒋先生又暂时缓和，我因没有参加其

中秘密，只好存疑不述。胡先生初回时候很起劲，不过因为情形很隔膜，态度也有点犹疑，他在莫斯科时候，曾经提议过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回粤时候又在那里观望。

有一天黄昏时候，约摸是七点钟，那是五月底或六月初我已经忘记。甘乃光先生跑至我家里说鲍罗庭请他约我至白云山相会。

“他约我什么事？太夜了，明日再说罢。”我说。

“鲍罗庭说蒋介石和谭组安都已去了，大约有什么重要问题要商议罢。”甘先生这样敦促我。

“白云山上有床睡吗？”

“据说蒋先生常在能仁寺住宿的，你怕没有床？”

我想真有什么紧急会议，我既是中政会的列席委员，不能不到，我连夜饭都不及食便和甘乃光同行。那时广州至白云山的公路仅通至沙河，上能仁寺还得穿过很长的田野，和上一段很峭的山壁。我们赶上能仁寺已经十点钟了，身体也乏极了，等到我们摸入寺内，只听说鲍罗庭已到，他也睡了。他知道我们到达，起床招呼我们，我问他怎么不见蒋谭两先生，他说他们明早准赶到。

我们先食夜饭再说罢，可是只有罐头食品和面包，我很懊悔不食了夜饭才来，更懊悔为什么不明早和组安一起到。不过那夜确是清静极了，天气是初热，山风微微的从丛木吹来，我和甘先生跑出山门逛一阵，领略些清气，说些笑话，各自归寝。

早上我们都在山前散步，远远见着组安先生穿件短衣从石磴一步步走来，随从的人们揽着他的长褂跟着。组安先生

身体很胖，兼且有点心脏病，走路时微微喘气，我看他确乏了。大约他把轿搁在山下，高兴步行逛逛山，我期待他，更期待他提出重要的议案。午前十一时便食中饭，大家围着桌子说笑话，聊天。蒋先生是始终不来，等到三点钟，太阳渐渐移向山西的树杪，组安先生便提议下山了。我问组安："今天不是有会议吗？""没有没有，只是蒋先生约我们游山。""呵，原来如此！我打算再过一个清静的夜才走。"我那时反不愿下山。"不要停留了，明天或者更有事呢。"组安催促我。

这一次游山清兴本来很潇洒自在的，然而已惊动了胡先生。原来我们上山之时，已有人暗中报告胡先生，说鲍罗庭和蒋谭诸人在白云山密开会议，或者再有政变。胡先生得到这个惊人消息，遂于我们下山之日匆匆附船至香港，恰巧那日汪先生也真个离开广州赴港，转轮出洋。两个人虽是同船，恰未相见。这个消息后来许久我们才知道，大家都引为奇谈，三月二十之变据我目击的仅是如此，然而真相到底怎样，我还和其他人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汪先生是走了，但走往那里是没有人知道，各人皆似失了一个重心，同时各人也感觉微微的失望。其时广西的李德邻、白健生、黄季宽已把广西统一而隶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湖南的唐孟潇不但派了刘尘苏来接头，而且更派了他的夫人来粤以报国府派去的白健生和陈真如之聘。恰于国民政府平定东江南路之时，湘粤来归之日，而汪先生离去广州，各人皆认定是中国革命前途的损失，由是反蒋空气也潜伏于每一个军事和政治的单位。

但三月二十之变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慢慢的各方面传闻又得了些不明真相的真相。据说是中山舰长李之龙谋叛，打算于三月二十攻击黄埔，由欧阳格告密，于是蒋先生才派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且捕去李之龙。但李之龙是在三月二十日晨光熹微的时候在他寓所捕去的，如果他是攻黄埔，他为什么不在舰上？中山舰的确泊在黄埔军校面前两三日，但十九日已奉蒋先生的命令调归驻泊省河，如果中山舰要攻黄埔，为什么又很服从命令而离开黄埔？这个真是闷葫芦，然而欧阳格是三月廿日的祸首，谁都认定了。蒋先生和鲍罗庭妥洽之后，首先便囚了欧阳格，再又囚了广州的公安局长吴铁城，接连又迫走广州市长伍梯云，并且限他即日离粤，而以孙哲生兼任广州市长。蒋先生这样办，据说是惩办三月二十的首要，而囚吴逐伍，据说他们要破坏省港罢工。那时广州的政治真是扑朔迷离，翻云覆雨，很像夏天的天气，忽而迅雷骤雨，忽而苦热骄阳。

有一天蒋先生更派邓择生来见我，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要限制共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这个组织包含十二个人，那是蒋先生自己，谭组安、朱益之、何香凝、邓择生、陈果夫、邵力子和我，至其他各人我已忘记了。这个组织很短命，只在何香凝家内开过一次会。这次开会，可以算是第一次会，也可以算是最后一次会，以后便无声无臭的夭折了。这次开会也不过随便谈谈，没有章程，没有纲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组织，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要这个组织。

不久又有人传说张静江先生是这次事变的核心，据我所

知张静江是于三月二十之后才到广州的，但有人说他早于三月二十之前到粤，只是躲着，到三月二十之后才露脸。那时广州真变了一个神秘的魔窟，很象阴谋诡计都充满四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隐秘。

张先生是不是这次政变的核心是一个神秘之谜，我无由了解，而且我也不希望去了解，但一天鲍罗庭特别约我谈话了。鲍罗庭的为人，我还找不出适当的批评，我只略述他对于政治会议的运用技术。当时反对共产党的都骂鲍罗庭把持政治委员会，依我平情的论断，与其说他是把持，不如说他是运用。他的技术是这样，他对于小事的通过或提议，不大过问，但对于大事，则绝不含糊，尤其对于他自己的建议，他在事前没有疏通好，绝不会提出。他定好了建议的节目，必找逐一个的政治委员恳谈，待大家都赞成了，他方才提出。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客气而且最重感情的，经过面对面的恳谈，很少不会同意．而且鲍罗庭更有背景，军械和经济的接济，都要靠他打电赞成，自然所谓军械和经济的协助是微乎其微，但以广州当日的困苦处境，有人雪中送炭，自然茶也当酒。如果你不大同意的话，他必然说某人也赞成了，某人也赞成了，那么许你是顶倔强的人，也不得不慎重考虑，最低限度减了强硬的反对。他利用这个方法，慢慢变了凡是鲍先生的提议，无不通过，故凡鲍先生一开口，都象有充足的理由。或者你心里有了怀疑，可是既然已有某某人事前赞成，那何必再作无谓的反对。那天鲍罗庭特别约我谈话，我想又有极大的文章了。

我到鲍公馆，在坐只有他的翻译张春木一人。张春木的名字唤做张太雷，是一个共产党中央的执委而兼负广州责任

的。我和鲍罗庭谈话，本来用不着翻译，今天他特别在座，我知道或者有什么事而需要他帮腔。

"汪先生走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已失重心，陈先生以为是不是应当在执行委员会内设一个主席？"鲍罗庭拿着小调羹正搅茶内的糖块，那时正在下午，我们是在用下午茶的时候。

"汪先生也会归来的，而且执行委员会设一个主席，总章无此规定。如果要设主席，根本非修改总章不行，难道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半年多，我们又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临时代表大会吗？"我很质直提出了我的疑问。

"这个主席是临时的，章程可以待汪先生归来再修改。你知在革命期间，我们只有看革命的需要与不需要，而不应守着呆板的总章。"鲍罗庭竟以革命的需要压迫我。

"好，就算是革命的需要，但谁来当这个主席呢？胡先生是不愿回来的，谭先生恐不肯干，即干也恐领导不起。蒋先生罢，他的年龄和资格都有问题，而且新经三月二十的乱子，恐怕不能餍人望。"我耐着性子向他分析。

"我想主席最好是张静江先生。"鲍罗庭这时笑起来，又似嘲谑，又似严肃。

"什么！你提出张静江先生。张先生是一个跛子，怎样能领导？纵使他真能干，只是一个监察委员。你想一个监察委员怎么可以来当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我以为鲍罗庭是在开玩笑了。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张先生是孙先生的老友，我记得孙先生在北京病危时，张先生一个四肢瘫痪的人，闻得这个消息，连扒带跌跑上北京，孙先生一见他便哭了。"鲍罗庭那时不

更嘲谑而更严肃。

“张先生难道凭这一哭就可以取得中执会主席的资格了吗？”我那时已怀疑到这种计划或者已经早已成熟。

“但除张静江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陈先生你赞成了吧，蒋介石已赞成了，谭延闿也已赞成了。”鲍罗庭似乎已经告诉我那天谈话的结论。

“蒋先生不独赞成，据我所知还是提议的一人呢！”张春木那时插科的加上一句。

“但我依旧反对，然而我毕竟是中政会的列席委员，用不着我赞成，而反对也无效。”我只听着大众意见便了。

过了两天，张先生的主席算是由鲍罗庭建议，他照例先说一番理论，陈述革命的需要。那事本已接头好的，开会不过是一个形式，自然大家无话，草草通过。只不过苦了张先生，因此便成了众怨之府，种下了后来种种恶因，宁汉分裂之时，也拿着张先生做一个口实。而张先生自己呢，也有些不善于自处，每次开会，每有问题，都不大讨论，他自以为是的都通过，自以为不是的总搁起。每一个议案，他老人家坐在主席位上，口内念念有词的读了一遍，便说这案通过，旁边的秘书长叶楚伧先生便执笔写“通过”两字。张先生的眼睛固然不明，声音又特别低哑，我们连案由都没有听清，那案已经通过或不通过了。当时我便打个譬喻，好象广东人听梅兰芳，虽然手上捧着一张剧词，但他唱到那里，实在无从追索，只有人家叫好，自己也随着点头而已。

…………

这样三月二十之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要问，谁也不

明白。一天我和组安先生谈到这个问题，组安先生喟然叹道：“什么共产党，这是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我问这话怎讲，组安先生说：“你还不知道吗？大概介石不满汪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生。你知道吗？汪先生和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呢！”我吓了一跳，什么时候他们拜起把来，什么时候他们又由把兄弟而结成仇怨；我再问组安，他的话匣子开了。

“我看汪先生和介石一定有问题，外面只管要好，我倒看出他们有些冲突。有一次国民政府宴客，席刚散后，有一个副官来回说介石有电话给汪先生，汪先生忽然露出不大愿意的神气，说：‘我不接。’说完这话，他便离开国府了。”

“你知道他们是把兄弟吗？自东江平定之后，介石便送了一个帖给汪先生。不过陈璧君是顶反对这套的，汪先生拗不过汪夫人，只好唯唯诺诺。一天汪先生写一封信给介石，开头写着‘介弟’两个字，给汪夫人发觉了，她大发雷霆的骂汪先生说：‘你愿意做他把兄，可是我不愿意做他的把嫂。’汪先生不得已撕了那封信重写，当着璧君面前此后不敢再写介弟，或者他们两个人的冲突，就因为璧君罢！”

谭先生更叹口气：“本来璧君也太难了，谁也要受她的气。不过一次我算是报复了。我和汪先生住在上海时候，无事时便饮酒，时常挨她痛骂，说我教坏汪先生。有一次我们出门趁了一只船游地方，璧君在船上对我说：‘谭先生，你死了太太许久，怎么多年还不续弦呢？’我说：‘我太太在生未干涉我饮酒，好容易才得她死去，没人干涉，难道我再要娶一个来干涉我饮酒吗？’”谭先生说完这句话，依然还带着胜利的神气，把眼睛张一张又微笑了。

从各方面的零碎消息归纳起来，似乎汪蒋之间真有问题，直至十五年八月围攻武昌的时候，蒋先生才亲口对我告诉三月二十的真相。

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我们从湖南的平江开始攻击，一路势如破竹，夺取汀泗桥、贺胜桥，至七月三十日遂直迫武昌城下。关于军事方面，我另有一段《军中璅记》叙述，现非本文，不再复记。我们经过八月一日和五日的扒城，没有奏效，而唐孟潇部下的何键和夏斗寅已由嘉鱼渡河攻下了汉口。我奉蒋先生的命令办理湖北财政，准备偷过武昌城渡江。似乎更没有什么事要请示，我不准备见蒋先生，一天下午我已经预备一切，要在夜饭后出发。

"公博，你去见见蒋先生罢。他今夜要起程往江西了。"邓择生气喘喘的跑入南湖学校我的房间，那时南湖学校是攻城的总司令部，唐孟潇、李德邻、邓择生和我都住在那里。

"没有事，我不去了。因为去了恐来不及出发过江。"我闲闲地答着。

"蒋先生刚才告诉我，汪先生要杀他，他对陈真如也这样说过了。你去见见他，或者他还有什么事对你说，"择生这样催促我，带着半神秘半怀疑的神色。

这样消息太使我惊诧，我为好奇之念所驱使，遂立刻起程去李家桥。那时攻城的总司令部设在鲇鱼套的南湖学校，而蒋先生则住在离南湖十多里路的李家桥火车上，以避武昌蛇山上的北军炮火直接威胁。由南湖至李家桥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旱路，跟着铁路的路轨，这是很暴露，常受蛇山的炮火攻袭的。一条是水路，可用小船撑去，但很弯曲，所费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我为急于见蒋先生的面，只有选择旱路。然而铁轨是那样暴露，我既不好乘轿，更不好骑马，只有沿着铁路步走去。

到李家桥时，太阳已经斜抹在山西，蒋先生所乘的火车，顶上也铺满警卫团的士兵，显然正待出发的模样。我上车之后，蒋先生招待我坐，招待我喝茶，我照例报告今夜要渡江过汉口，及请示有无其他命令。

"公博先生，后方有许多人要请汪先生回国，你知道吗?"蒋先生谈完公事之后，突然向我发问。

"我没有听见。"其实我真没有听过后方有这样消息，我自从六月出发之后，我总没有和广东后方通过消息。据我所知的迎汪空气，前方将领倒有这个酝酿。

"汪先生真要回来，你以为怎样?"蒋先生又追一句。

"汪先生回来，如果于革命有益的，自然赞成他回来。倘于革命没有什么利益，暂时住在国外也好。"我想只有这样答他，因为从邓择生告诉我的说话分析，我不便表示我的真意见。

"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蒋先生这时的脸沉下来，态度也有点异样。

"到底蒋先生和汪先生有什么过不去呢? 我不很明白。"我终于直捷的问。

"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 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蒋先生很愤愤的说。

“他怎样阴谋害蒋先生呢？”我骇然。

“他要我参观俄国来广东的船，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参威。”蒋先生很肯定的判断。

“这样大的事，总该有人知道吧，我们都不知道。”

“自然你们不知道，他有俄国顾问和他的老婆便够了。”

这时我真再忍不住，我说：

“这事真是太骇人听闻了。在广州当日，没有蒋先生、汪先生是不能统一东江和平定南路的。汪先生要杀蒋先生，他无异乎自杀。这事我不敢信，但今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又不能不令我相信。蒋先生叫我在湖北办财政，又叫我到江西办政务，我答应蒋先生在湖北三个月，在江西三个月，此后我将天涯海角去找汪先生；假如汪先生要杀蒋先生的话，头一个反对汪精卫的便是我，假如没有的话，我劝蒋先生还是和汪先生合作。因党内的花样已经太多了，倘若再弄下去，前途真太悲观了。”我这时大概太激动了，声音露了凄怆，并且由激越而陡变为哽咽。

“唔！唔！这样也好！”蒋先生便结束了他的谈话。我觉得无可再说，也辞别下车，当夜便过汉阳。

那夜我在渡江的途上简直没有合过眼，知道国民党的前途伏着无限悲剧和惨剧。后来汪先生自海外回到汉口，第一天我便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

长江上游既已底定，武汉大可以安枕无忧，不知蒋先生还是因为高兴呢，还是再无暇兼顾后方呢？把所有关于三月二十之变被扣的人员都释放出来了。除了吴铁城去了上海，谋

杀的罪首李之龙，和告密的功魁欧阳格都于释放后到武汉了。李之龙是从前军校的学生，到武汉后就主持了黄埔学生所办的血花剧社，他有一天来见我，为要明了真相起见，我问了他许多话。

"到底三月二十之变是怎么一回事？"他从前是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还是我的部属，我不客气的质询他。

"我一点也莫明其妙。"之龙在诉苦。

"你现在已脱离了共产党，也不必隐讳的瞒我，共产党不是命令你去攻黄埔军校吗？"我知道他在三月二十之变后，他向蒋先生发誓脱离共产党。

"实在没有这回事，陈主任，你知道，那天捉我时，还在我的床上拖我下来，而且中山舰也泊在省河，我要攻黄埔，哪还有工夫回家睡觉呢？"之龙在分辩。

"听说你所管的中山军舰十七十八两日曾至黄埔，是没有奉蒋先生命令的。"我重复提起当日我所闻。

"怎说没有命令？中山军舰十八日到黄埔，十九日又驶回省河，蒋公馆都来过电话的。"之龙以为电话可以当命令。

"那电话是蒋先生亲自打给你的吗？"我要证实之龙不能无过。

"那电话并非蒋先生亲自打给我，而是他公馆的秘书打给我的。蒋先生一向都是这样指挥，这也是习惯，我向来都这样的遵守，没有出过岔子。"之龙提起蒋先生的指挥习惯。"唉，总是我倒霉罢了，我也不敢怨蒋先生，只怨命运不好，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牺牲者。"

李之龙的冤枉，我已明白了大半，一天我偶然到武汉卫戍

司令部看陈真如，碰见了黄居素也到了汉口趁热闹。居素先生是真如左右一个纶巾羽扇的人物，他从前是和真如一起在南京欧阳竟无底下学过佛的，对于真如是半朋友、半幕僚的地位，恰恰象山中宰相的军师。北伐时候，他怕路上辛苦没有回来，武汉既下，他又趁热闹的至军门杖策。我和真如谈起李之龙诉苦的情况，居素只在旁边冷笑。

"你笑什么？"我很奇怪。

"我笑的是李之龙和欧阳格都是傻瓜。"居素仿佛有他的天机不可泄漏。

"李之龙傻瓜犹可说，欧阳格不是当日告密的吗？"我骇异了。

"你也傻了。我已见过欧阳格，我问他三月二十之变是不是他告密的？他答我的话才有趣，他并不知道什么原故，只是在三月十九夜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二十晨早占领中山舰。他也并不知道什么原故，末后不久把他囚起来。他也不知道什么原故，现在又放出来，叫他到汉口。"居素说了几个"不知道什么原故"，还在冷笑，使得我们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傻？你也傻了，难道欧阳格干了这种事，要对你说真话？"我还不相信。

"你知道欧阳格是欧阳竟无的什么人？我和他的交情，什么话不说。而且我是反共的，他揭发共产党的阴谋，为什么要对我秘密？"居素证明欧阳格的无辜。

"欧阳格既然受了这种冤枉，为什么不声辩？"我已替欧阳格抱起不平。

"你真是傻了，天下冤枉的事多极了，受点冤枉有什么要

紧。欧阳格目前虽然受些冤枉，后来难道没有好处么?"居素似乎揭出一些佛偈的真谛。

我想一想，也不禁笑起来，我真近乎傻了。

至到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办《革命评论》的时候，陈立夫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市党部演说，大骂汪先生谋害蒋先生，并说那时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十九那天竟直检了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之变。

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纪载，独至在三月二十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

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密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

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观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

过了些日子，蒋先生为着别事由南京至上海，约我和张向华至孔庸之公馆会谈。我问他接到我的信没有，并申述这是无稽之言。依我的观察，蒋先生可以代表革命军人，而汪先生可以代表革命青年，两个人如果能竭诚合作，总于中国前途有利。

“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得责罚他。”蒋先生听完我陈述之后这样说。

后来有人从南京去上海，告诉我果然蒋先生为着此事曾大骂立夫先生一顿，然而三月二十之变，其真相就在于此吗？直至民国十九年，我再碰见邹海滨先生，我才完全明白。

事实是这样，北平扩大会议算是随着晋军的军事失败。晋军既已占领的济南，被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夺去了，张汉卿以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徘徊半年多的态度也于那时转变，开兵入关，进占天津了。扩大会议经过怀仁堂一度会议，把会议的委员分作两批，一批是向外活动连夜往天津，一批是为着共患难的关系，于翌早附车往石庄，这一批往山西的委员，除汪先生之外，邹海滨先生和我都在内。

天没有明，火车便从西车站开行，大概为避人耳目关系，或者为避飞机轰炸的缘故——南京方面的飞机在占领德州之后，已来北平轰炸过一次——所以赶着天没有亮时即出发。车才过了长辛店，北平有电话来，说车要等着，因为石友三的代表萧仙阁要赶来见汪先生报告机密。也不知谁接的电话，

似乎说张汉卿的入关是为帮着我们的，不是帮着蒋先生的。我对汪先生说："不必等待了，萧先生我虽没有见过，但从各方面消息传来，他是一个混人，混人是不可靠的。"但汪先生以为虽然萧仙阁不可靠，但既已乘专车赶来，我们也须等他一下。这一等便等了几个钟头，萧先生来时，说张汉卿之入关，的确是帮助我们，我们不独不必走，且可立刻回到北平。张汉卿只是要天津，北平是不要的。

萧先生报告完毕，大家都笑了，这种笑不是高兴，而是表示不信任。萧先生走后，我们遂继续开车。在车上汪先生是自己住一个房间，邹先生和我合住一个房间，我为着邹先生年龄比我大，让下铺给他，因为下铺的上落，比较方便。在车上是没有事的，整日看书和睡觉，白天睡得太多，夜里反而没法合眼。电灯又那么暗，势难看书，我们便开始上天下地的聊天了。我们不经意的闲谈，一谈便谈到三月二十之变，邹先生忽然很兴奋，说："公博，你知道三月二十之变的原因吗？"我说我不知道，只把蒋先生在李家桥对我说的话复述一次。邹先生太兴奋，不睡而在床上坐了起来，我也下了床在抽烟卷。

"那都不是，只是伍梯云玩的小把戏。"邹先生笑着继续说："你知道吗？自从展堂出亡莫斯科之后，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

"有一天梯云请俄国领事食饭，跟着第二天便请介石的左右食饭，席间梯云不经意的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这一句话，介石的左右自然报告介石了。介

石是最多疑的，但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国领事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以为共产党要干他，或者精卫要赶他。一次介石便向精卫刺探了，说他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往莫斯科，一者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者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精卫是一个老实人，在第一次刺探时苦苦留他，以为在军事时期他不好远去。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介石说明在整军时期，他留粤与否无关重要，倒不如趁此时机，作短休息，可以恢复精神。他的言语态度当然像很虔诚，到底是书呆子的精卫终于答应了。

"介石见精卫答应了，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你知道璧君是一个好事之徒，听见有莫斯科可去，哪里有不答应之理。以为俄国那时还冷，于是制皮大衣呵，办行李呵，忙到不可开交。衣服制备之后，便天天催介石走。

"介石原来是无意去的，所谓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现在璧君天天催他动身，于是遂确信精卫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介石参观，听说当日介石要拉精卫同去，而精卫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介石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候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之故，介石遂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之变的真相。其初只是梯云的小把戏，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不料后来倒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当时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听见之后，倒冷了半截身子，既恍然大悟，又悲凉不堪。现在梯云先生经已作古，他固然是安安静静的长眠在他的寝

宫，但为了他那几句话，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寡了多少人的妻子。中国国民党分裂了至今不能真正复合，连带而拖累了无数善良的老百姓死伤流离，现在我执笔写这段经过，还是欲哭无泪。

第五章

宁汉分裂

宁汉分裂是国民党内部第一次的正式分裂，是国民党一件重大的事，也是国民革命中挫的一件惨痛之事。现在许多史论家以为共产党的叛变应当是其中唯一原因，实在构成这次分裂的还有许多理由。许多史论家又以为三月十二日武汉所开的三中全会是分裂的原因，实在酝酿分裂远在三月十二之前好几个月。现在要明了其中的复杂内容，只有让我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写。

第一是共产党的叛变。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理论和过程观察像是很清楚的，但他们的行动恰恰正相矛盾。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在第三国际的观察，以为中国要实行共产革命，必得要先完成国民革命。这个理论也许是共产党的正宗派，因为共产主义的骨髓是阶级斗争，中国还是停滞在封建组织，阶级一定不分明；先要把中国工业化了，然后才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有产业工人，有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能正式的斗争，才能促成社会革命，因此不得不先实行国民

革命。不但如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支配，它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然后才可以谈社会革命，否则局促在帝国主义之下，一般民众所感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如果提倡社会革命，民众绝不会起很大的反应。大凡革命是广大民众的需要，并非主观理论所可鼓动的，因此苏俄首先主张中国须先完成国民革命。

第三国际这种主张的改变，是在民国十一年初，因为民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宣言还是同时痛骂广州的孙先生和北京的徐世昌；后来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这个宣言虽然勉强通过，始终不能发出，因此中国的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没有宣言。民十一的春初，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叫做斯力佛历驻在上海，这位斯先生是荷兰人，其初是在荷属东印度活动，后来站不住脚，才改派来华，他在中国化名叫做西门博士，我曾介绍过他在广州教育会演说。

他在上海不知何时认识了张溥泉先生，张先生一次和他带了张春木一起来广州，鼓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记得我在广州西堤的西濠酒店会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我极端反对。我当日提出四个反对理由，第一个是国民党的主义终和共产主义不同，两个不同主义的党绝不容易合作到底。与其合而后分，不如还是在党外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个时期合作。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承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党，党员跨党，倘若遇到了两党不同的命令，叫党员服从国民党呢？还是服从共产党。如果服从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叛党，服从了共产党也是对于国民党叛党，叛党已经

是了不起，何况两党都是被认为革命党，叛党即是反革命，实在叫党员受不了。第三个理由是国民党是正在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依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许党员做官，并不要目前夺取政权的，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即是共同夺取政权，非要开一次代表大会不能推翻前案。第四个理由是共产党的人数还是很少，而且都是青年，要使它能成长健全，最好是保持一般党员的纯洁，国民党内当时的冯自由和胡毅生之流，以及一般的国会议员实在也太不理于人口了，如果共产党参加了，实在使党员容易腐化。张溥泉先生很反对我的主张，以为共产党的主义没有和国民党不同，列宁正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一样，而且两党既然都是革命党，既具同一目的，那么断不会有命令不同的地方，至于共产党改变决议更是顶容易一件事，说到国民党腐化，他也承认，但正为如此，所以要输入共产党的新血轮。这一段谈话我们自然没有什么结论，后来西门毕竟和张先生一起到桂林谒见孙先生。西门此行我听见也没甚要领，一直等到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先生到了上海时候，国民党容共才变了当时一种政策。

我为什么要补述上一段历史呢？因为我要叙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原因，然而后来共产党的活动就违背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譬如他们在广州时候专作农工运动，处处都表露阻止国民党的活动而与国民党为难。在农民运动的时候，共产党更密令他们的农民特派员，有重要消息不必报告于国民党的农民部，虽然名义上他们还由国民党特派。而且到处宣传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不彻底，要革命的还是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这一手实在使国民党太难受了，北伐之后，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军队的力量到处增加了。各地的农会工会可以说由共产党绝对把持，凡国民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工会是罢工了，农会也武装了，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安定秩序的，这么一来，国民党竟直没有力量维持地方，清党的酝酿差不多也跟着军事进展而澎涨。而且共产党以为力量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以为社会革命的开始，不必再待国民革命的成功；以为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可以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法术，立刻将国民革命一变而为社会革命。共产党最初的理论和最后的行动不符，自然国民党不得不采取最后的自卫手段，这是为什么宁汉要分裂？

第二是三月二十之变，使人太莫明其妙了。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能够统一东江，敉平南路，自然蒋先生是有大功，但汪先生坐镇着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无偏无袒的使各军得其平，必诚必实的厉行廉洁政治，一时人望所集，海内归心。广西和湖南的来归，与其说是因为广东的军事进展，毋宁说是受了国民党主张的影响。汪先生既因三月二十之变出走，虽然大家以为是一个闷葫芦，但抱不平而希望他回来的企图倒是很普遍而到处酝酿。因为汪先生的出走，大家遂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因为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大家遂不满意于蒋先生。那时虽然说不上反蒋，可是崇拜汪而惧怕蒋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

唯其三月二十之变太莫明其妙，所以一般党人和将领都有点寒心，就是没有汪先生在国府那一段的成绩，大家也有点芒刺在背的恐怖。我在出发之前，曾经和李任潮和谭组安谈

过一次话，他们的态度可以表示当时一般人的心理。我还在政治训练部，李任潮有一天用电话来找我好几次，我回部之后，便到参谋部找他。

“你找我有什么重要事吗？”我问。

“没有要紧事，因为你就要出发了，所以找你一谈。”李任潮本来不多言的，至此又沉默下去。

“你看我们真到了长江，介石会怎样呢？”任潮默然了许久才问这一句话。

“我也难说，我看还是那样罢。”我找不着任潮的要领，只能那样答。

我们又起首默然。末后我们又谈些不相干的事才散。任潮为什么有这一问？自然说话内里有文章，我那时实在和任潮不熟，而且我当日虽然不满蒋先生，然而总不愿反蒋以拆革命的战线，所以始终没有表示意见。

谭组安先生的态度更是鲜明，在北伐誓师的前一天对我说：“到了长江，介石是没有办法的，要是在长江搅不久的人到了长江那里有好办法！”组安先生虽然老成而浑厚，有时高兴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或者组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先生不满意那是很显然的。

北伐已到了长江，各军都慢慢要扩张，各有扩军之心，而又怀有自危之念，那么反蒋迎汪也很顺理而成章，这又是宁汉分裂原因之一。

第三是唐孟潇和邓择生的构煽。说到此地，今日我还是有点怪邓择生。邓择生最初是反对唐孟潇，及后又利用唐孟潇，使到武昌未下已形成蒋唐交恶，武汉既定更促成宁汉分

裂。事实是这样，邓择生时常都以理论家自负而又以革命家自居，见着人无时不挺着胸脯，大谈理论。有了这个习惯，总以为听他话的才是革命党，不听他话的就不是革命党。大概他总以为唐孟潇还是一个地方军阀，想训练他成功一个革命党吧，于是把许多革命理论硬生生的灌他，碰巧孟潇也是一个予智自雄的人，不见得便服从他认为小弟弟的邓择生领导，于是武昌未下邓择生便对孟潇不满意了。

择生既对孟潇不满意，自然在蒋先生面前有了批评。而孟潇当时的确也太躁进了，在武昌未下便希望把他三师扩充为三军，这种举动各军都不满意，蒋先生自然更不满意。

"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最多我们不得了便回广东。"蒋先生这样说。有一天我在李家桥火车上会着蒋先生，当时他还露出一种愤慨之色，恰在和邓择生见面之后。我知道邓择生又对蒋先生批评唐孟潇，而那时为着革命前途起见，我真替唐孟潇解释不少，其实当时我和孟潇谈不上密切的友谊。

不久以后我在汉口和孟潇闲谈，虽然是交浅言深，我也不得不尽量对他忠告。我说：

"孟潇，你已成了一个神主牌，只是大家不知道把你安放在大厅或是安放在神楼罢了。不过我替你想，很危险！你是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而湖南又已服从了国民政府，但你想想，湖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财政是独立的，省政府委员又是你推荐的，除了一张国府任命状之外，什么也没有关系。而且你的身边，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军人，有绅士，有佛教徒，有所谓亲信派，各有矛盾，各有利害，很象一团

火拿一张薄薄的沙纸包着，终久要烧破的。我劝你多和国府发生关系，而扩充军队也必得慢慢的，不要急。”

我这一段书生见地的话，自然或非孟潇所乐闻，我于十五年十二月离开汉口到江西，整整三个月和他没有通过消息，迨至邓择生和蒋先生破面之后，又转而利用唐孟潇。等我十六年三月重到武汉，孟潇又变了一个样子。蒋先生那时不敢将国民政府搬至武汉，共产党的问题自然是一个原因，而唐孟潇的气焰咄咄逼人也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此地，我可以叙述宁汉分裂的前夕情形了，现在记叙当时情况的，都名之为宁汉分裂，其实分裂的当时，南京还未取得，我固然在江西，而蒋先生也还住在南昌。其时军事经已稳定，吴佩孚对于武汉显然的无力反攻，而孙传芳在江西新败之后，对于江浙也只图自保，于是为达到北伐目的而为容易号召天下起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遂计划北迁。我刚由武汉调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政务委员会是当时草创的制度，等于省政府)，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刚由广州搬来，当日中央为什么不取道湖南直至武汉，而偏假道南雄和赣州以至南昌，我至今还不明白。或者是中央以为北伐总司令部设在江西，所以先来这个南昌故郡的洪都新府，或者是蒋先生和张静江早有成算，决意将中央不设在那个武汉的中心。

不过当日的宣传，早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广州。北京和南京没有取得，自然不发生建都的问题，而广州偏处南服，是难得号召天下；国府既由广州迁来，那国府所在地当然只有一个

武汉是最适中的地点了。这种宣传已融成了普遍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不止一般人所同具，就是国府的主要人物也以为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中央到了南昌不久，所有各部长如财政部的宋子文，外交部的陈友仁，交通部的孙哲生，司法部的徐季龙，乃至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都离南昌而至武汉，在那个年头的南昌城，只剩下一位代理国府主席谭组安。

各部部长之赴武汉，总以为国府就要搬去的，但迟之又久，终于消息不闻，于是在武汉在南昌就发生一种传闻，说蒋先生要把中央党部和国府袋在荷包里，以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慢慢各部部长来电催促，而武汉的民众团体纷纷来电欢迎。蒋先生见这事情已闹起来，一夜遂在总司令部开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以解决国府留赣或是迁汉。

当夜是蒋先生主席，出席的人们据我记忆所及的有张静江、谭组安、宋子文、何香凝、朱益之、林祖涵、邓择生，和我几个人，而宋子文和邓择生是由武汉赶到，仿佛代表赴汉各中委的意见。当夜会议的秘书长是叶楚伧，而司记录之事的是今日的候补中委而为当日的秘书狄君武。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是不是应当留南昌，抑或迁武汉，请各位发表意见。”蒋先生照例这样问。

“我主张留在南昌，因为南昌地势很好。”张静江先生首先发言，理由是很简单而没有充足的解释。

“谭先生的意见怎样？”蒋先生向着坐在第二位的谭组安问。

“论道理是应该迁武汉，论局势是应该留南昌，我倒主张中央暂时留赣。”谭先生很嗫嚅的说。

“各位意见怎样?”蒋先生望着各人,似乎希望各人都发表些主张。

“我没有意见。”邓择生简单说了,沉默下去。

其时朱益之刚坐在我的下手,拿铅笔就桌上的纸片写了一张条子递过来,那条子写的是:“国民政府不迁武汉,不如还在广州好。”

“我的意见还请国民政府搬汉口,因为要筹款,国府不能不搬汉口。”宋子文是办财政的,语不离宗的拿着财政作口实。

“我没有意见。”林祖涵也那样表示。

其时已轮到我发言了。我看见谭组安那样神态,知道国府留赣似已内定,难于挽回,但我这个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我站起来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可以讨论?”

“当然可以讨论。”谭组安赶快给我答复。

“国民政府应当迁汉,我有几个重要理由。第一,中国能建都之地只有北京、南京和武汉,今日北京南京没有克复,所以能建都之地只有武汉,这是就地势上论的。第二,我们宣传会师武汉已久,国府当时北迁的宣传也只有说迁武汉而没有说迁南昌,今日国府忽然在中途留在江西,中外人士固然有点惊骇,尤且恐怕他们认为我们无远大企图,致失天下之望。第三,国府的功能除军事以外,就是外交和财政,外交和财政的功效势不能在江西发挥。所以依着种种理由,我主张仍依原议将国府迁汉。”我见各人都不肯发表意见,只有本着言无不尽之旨去尽量陈述。

“我没有意见。”朱益之跟着说,虽然他的条子曾表示真

意，主张国府迁汉。

"我是一个女人，不知国府留赣好，还是迁汉好。大家以为怎样便怎样。"廖夫人也不表示她的真意。

"多数都表示国府留赣，那么国府就不迁汉罢！"蒋先生勉强作一个结论。

那时我再忍不住了，我再站起来说：

"我本来不想再说的，但我眼见着无数的危机。我请各位注意，如果国府不搬武汉，恐怕党便会由此分裂。"

"我不相信陈公博同志的说话，国府不迁汉，怎么党便会分裂？"静江先生很自信的下他的驳论。

这个会议虽然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国府留赣算是决定了。我出会场时候，跟着我后边的有邓择生和宋子文。

"你这家伙，怎么你不发表意见！"我气极了，骂起邓择生。

"我反对了一天了，今夜我不愿意再说。"择生这样解释着。

"不要紧，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子文象发牢骚的，似乎他握住了整个的命脉。

我当夜回至家中，怎样也睡不着，我知道那时形势很险恶，不难汉口方面就借着这个问题发难。我至早上三点钟再也不能合眼，起来步出院子看繁星。党立刻要分裂了，怎么办？我当时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跟武汉跑，但武汉为共党把持，我不愿意。第二条是赞成蒋先生，但经三月二十之变，我实在至今还抱着不平。第三条是立刻辞职回广州，但中途抛弃了革命大业，非我素意。而且摸一摸袋里只有二十四

元钱，那是我剩下来的全部财产，不要说要回广东，连出江西省境的路费也不够。凛冽的早风从天阶上面卷下来，身上栗然有寒意，我想徒然痴想是没有用的，大清早起来还是看看谭组安再算吧。

那夜我可算没有合着眼，一早起来连办公厅也不愿上，先去找谭组安。我到谭先生的寓所，看见邓择生早在那里，谭先生正在穿衣服，似乎刚起身，而邓择生也似才到的模样。

“谭先生，你怎么也赞成国民政府留赣？”我非常急切的，连寒暄语也不及说。

“我的困难，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谭先生抹抹眼镜正要带上。

“总司令到。”一个副官入来报告，蒋先生跟着进谭先生的房间，我们都一齐截住了话。蒋先生见了我们在谭先生那里，似乎并不惊异，很自然的坐下。

“公博先生，你看昨夜的决议怎样？”蒋先生倒先和我说话，或者我昨夜反对特别强烈，所以特意的和我多说两句，缓和我的情感。

“我依然不主张国民政府留在这里，但已经决议，那也没有办法，我只好服从决议。”我还是维持我的见地。

“我们决不能去汉口的。”蒋先生加重一句。

“蒋先生是不是怕共产党？”我不客气的直捷问蒋先生的真意。

“是！”蒋先生这次也很爽直的答复。

这时我贡献我的意见了，我对蒋先生说：

“共产党实在不必害怕的，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力量。我举

一个例；譬如我在武汉的当时，共产党只有一个秃头的总工会，底下没有一个工人。他们为要找力量，所以拼命鼓动罢工，以为工会罢了工，一定找人帮助，一定找到了总工会，他们吸收工人的方法，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为维持秩序起见，曾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刘少奇，问他国共还合作不合作。如果还是合作的话，他们应当马上停止不合理的罢工，如果不合作的话，我另外有适当的办法。经我那次镇压，武汉的罢工风潮马上低降下来了。我一个人在武汉对共产党还有办法，若整个国民政府搬了去，那办法更多了。所以我以为要镇压共产党，不止国民政府要搬去，就是总司令部也要搬去。"

"现在我们既经决议，也不必再反复了，但国府不迁汉，以后我们怎样宣传？"蒋先生沉默一下又问我的意见。

"我们以后的宣传只有说等取得南京，再搬南京便了。因除此以外，很难再说别话。"我提出一个不得已的提议。

大家对于我的提议算是赞成，我见蒋先生还似有事和谭先生商量，我和邓择生就辞了他们先走。

到夜里九点钟谭先生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要过来我家谈天；那时组安先生一星期内倒有两三次到我家夜谈，他是一只夜鸟，每谈必至早上三四点钟才走。他的谈话真是上下八千年，纵横九万里；那时的南昌实在太寂寞了，除了夜谈，找不出别样的消遣方法。

"谭先生，你今早对我说你有难处，实在你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在闲谈中，陡然忆起他早上未尽之意。

组安先生那时有点兴奋，引开他的话头，便滔滔不绝的说：

“你不知道，我也犯了嫌疑了。照理论说国民政府当然要搬武汉；照情势说我倒不反对留在南昌。你知道吗？后方许多人都在反对张静江，静江很怕去汉口的。如果我主张搬汉口，倒有两层不便，若他们反对张静江，我没有方法替他辩护，结果不是形成拥谭反张的恶劣形势吗？而且我若坚持主张国民政府搬武汉，介石不难要怀疑到我要和他分庭抗礼，对立起来。”

“难道凭你的本领，说不服一个蒋介石和张静江？”我以为组安太怕事。

“哈，你还不知道静江呢！介石是做了错事不肯认错的，而静江就以为他所做的事根本不会有错。他的脾气又倔强，又无理。我告诉你一段笑话罢，不久以前，我们在牯岭闲谈时，谈及牯岭的高度，在座还有黄膺白。本来牯岭的高度超过海拔五千尺，这是在游览书载得很清楚的，但张静江总以为靠不住。黄膺白是一个学测量的，他还傻头傻脑的和他争执，反复说着什么三角，什么几何；张先生更是一个不信科学的人，始终以为什样都靠不住，我忍不住便和他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办法，叫一个人用几千尺的绳子，从牯岭脚下拉起，拉到山顶，那一定准确了。’静江说：‘这是斜的不是直的，还靠不住。’我说：‘既是这样，顶好由山顶打一个直洞打到山脚，那一定准确。’然而静江也说办不到，你想他是这么一个人，谁能和他讲理呢！”

组安先生说完之后，禁不住叹口气。因为谈到静江先生的问题，我们的谈锋便转到他私生活一方面去，谈到他在巴黎的浪漫，谈到他在上海的豪奢，我突然发一个奇问：

“静江先生是跛子，走路也要人抬，他怎样和他的姨太太睡觉？”

“静江虽然不能动弹，他的尊夫人就不能移樽就教吗？”谭先生像发现了一件奇迹，很乐。

“移樽就教”一个名词太语妙天下了，逗得我大笑起来，那夜紧张的谈话，就在轻松的空气中消散。

…………

赣汉对立的空气一天紧张过一天，在江西方面张静江先生依然倔强不让，而在汉口方面则孙哲生和徐季龙俨然掀起反蒋的大旗，这自然是共产党在其中曲尽了他们挑拨的能事。在蒋先生这边也知道反蒋的不止共产党，但他不好正面攻击，希望打击共产党即所以镇压反蒋的队伍；而在武汉方面，却也不直接攻蒋，藉口张静江做了中常会主席的缘故，高呼着请张静江交还党权给中央。我们劝蒋先生不妨再至武汉一行，或者藉此免得分裂。蒋先生终于一天到了武汉，那里自然也照例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但大会场中少不免有许多蒋先生所不满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末后蒋先生和鲍罗庭办过一次直接交涉，任翻译之责的是宋子文，他们争论了许久，鲍罗庭最后对蒋先生说：

“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鲍罗庭的说话太挖苦尽致了，蒋先生听了这段故事，遂决意要驱逐鲍罗庭。他回至江西，在路中上了牯岭，提出驱鲍问

题，当时张静江自然赞成，而戴季陶和邓择生都极力反对。戴季陶劝蒋先生不听，回到寓所大哭说："完了，完了。"而邓择生那夜也大喝其酒，借着酒醉，大哭了一夜，翌早赶回武汉，大约反蒋的决心也在那夜下了。这一段秘史也是谭组安告诉我，因为我那时正在南昌处理政务，不能分身到牯岭，虽然邓择生有过两次急电请我去。

那时南昌和武汉俨然是对峙着两个中央，在南昌有中央党部，而在武汉则有联席会议。刚巧照规定，每至三个月中央党部应该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因为北伐军事，第三次全体会议已延了很长的期，于是武汉方面遂请求召集三中全会，间接促成国府迁汉。蒋先生以反蒋空气浓厚，恐怕开会期中有不利于他的决议，坚持不开，而联席会议则更振振有词，说蒋先生挟持中央，违反党意，竟直不问江西的意思，打算直接在汉口召集。

时局真是紧张万分，蒋先生叫我一个人先往刺探武汉各人的意见。然而各人的意见哪里刺探起，邓择生是迷糊了，徐季龙是给共产党操纵了，我想还是先见宋子文、孙哲生和顾孟余罢。因为我想宋子文和我有相当交谊，或者这次肯说老实话。孙哲生是上海三民主义学会的后台人，自然不会和共党站在一条战线，而顾孟余呢，比较中立，也与共党积不相容。我的船一到汉口，我便到中央银行，一入门口，正见宋子文蒙着头出来坐汽车，他说正在发大热，要到法国医院医病。我和他一起到法国医院，我问他怎样意见，是不是国府不迁汉，党便要分裂。宋子文这位先生素来都难得说实话，只有他探听你意见，如果你要打听他的意见，他总含糊其词。而且

这天他正在病中，看他颜色，实在真正发热。他一到医院便睡在床上，趁看护士把探热针搁在他的舌底时，只是把头摇，连说："太坏了，太坏了 Too bad, too bad"。怎样坏法，怎样补救，他似乎没有意见，并且也表示不出意见。

我没有办法，跑去见孙哲生。

"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我开门见山的说。

"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孙哲生跟着滔滔不绝的发挥他的主张，说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示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

反共的大将也这样，大概真不是共党把持罢，于是我又找顾孟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说唯有国府迁汉，党才免得分裂，不过他又提起三月二十之变，说：

"蒋介石天天说要请汪先生回国，都不是诚意的。"

"这怎么说？"其实我在李家桥已知道蒋先生的真意，只是蒋先生后来对人说，等军事告一段落，即当迎汪。

"最近李石曾的侄子才告诉我的。介石以前对我说要请汪先生回国，我也信以为真。最近石曾的侄子告诉我，说介石打听汪先生在欧洲的住址，还托石曾设法阻止汪先生回国。"

我在汉虽然仅仅见过三个人，然而我到武汉的消息却早有人报告各机关了。入夜詹大悲和李汉俊跑来见我，并询问我的主张。大概这两个人多少有点偏袒共产党的，他们的言论又较孙哲生为激烈。我们争论了半夜，我终怀疑他们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据詹李的解释，则侈言他们的行动与共产党

无关。

“好！就是这样罢。如果你们不受共党所左右，纵使国府不迁汉，我也来汉口参加三中全会。”我作一个辩论终结的论断。

那夜我反复睡不着，不过我得到一个结论，国府迁汉，他们自然召集三中全会，国府不迁汉，他们也一样的召集三中全会。只是国府迁汉，召集全会是由中央主持，这样分裂或者可以稍迟，或者加些人力，可以弥缝罅隙，不至破裂。如果国府不迁汉，他们一集会即是立刻分家，在南京未下而先破坏革命的力量，这是我十分不愿意的。我当时还有一个痴想，以为蒋先生可以服从多数，不至自立中央，仗着我的诚意，或者可以劝他迁就环境。

回至南昌之时，未向蒋先生报告，我先见谭组安，我把武汉的情形和孙顾的谈话，以及我的判断统统告诉他。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样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或者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

“公博，你到底还是年纪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组安像已表

示听天由命，"你的打算怎样？"

"我的打算么！"我决心说，"我打算苦劝蒋先生服从多数，免得马上破裂，或者乃至于不分裂。如果蒋先生不听，我只有请求他把我扣起来，否则我一定到武汉。"

"我佩服你有这决心和勇气，我得帮忙你去劝蒋先生。"谭先生这时也鼓起少年时代的勇气。

夜里我们两个人去见蒋先生，那时廖夫人因病住在蒋先生的总司令部，我们都一齐加入讨论。其时武汉方面已经对蒋先生公开批评，我力陈国府迁汉可以免得马上分裂，待过了这个危机然后再想办法；我更劝蒋先生通电服从中央，免得反对者得以借口。经过长时期的讨论和苦劝！蒋先生叫我代他起草通电的文稿，并决定国府迁汉。

谭组安说蒋先生不肯认错是实在的，他于第二天夜里请我们食饭，说他虽然通电服从中央，但非他的本意。并且在南昌开了一个欢送国府迁汉大会，他出席演说，说国府不怕迁汉的；其实这种意气的话是没有多大理由，当时党的分裂，虽然有种种原因，可是那些不负责任和意气的说话和行动，也是促成分裂的因素。

自我离汉回赣之后，武汉的中央日报更登载了许多不满蒋先生的消息和文章，内中并有一段消息说是我的谈话，谓蒋先生近来对张静江已不信任。其实这段话是有的，不过只是私人的谈话，因为那夜詹大悲和李汉俊大骂蒋先生过信张静江，我为替蒋先生辩护，所以轻轻说这一句，他们便拿来登报。这一句话害得张静江先生在国府离赣那一天还在过江的船上质问我，弄得我没法答复，只是我专为排解而非为挑拨，

到今天我的心里还泰然，没有对不起张先生的地方。

蒋先生大概也知道许多人不便到武汉，把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叶楚伧换了李仲公，把代理组织部长陈果夫换了我，至于张静江先生自然是留赣不行，我之所以改任组织部，其间蒋先生也一半采纳了王乐平和路友于两位的建议。

…………

党的纠纷气息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在南昌还不觉得什么，我们到了九江，街上已遍挂白布标语，请蒋总司令交回党权。我当时实在有些气愤，以为我好好的已调解了一边，而那边又那样的过火。其实我当时确是热诚，也实在太傻，两方面都似乎听我的劝告，其实在内里大家已在动员。在蒋先生这面，大概还本着“我不要两湖了”的决心，极力经营着长江下游的军事，打算另创新局。在武汉那面，则设法拉拢军队，开始清除在汉的蒋系亲信人。独有我这个清白无瑕的傻瓜，还极力弥缝，希望党不破裂。

我们的船刚抵汉口，谭组安已被一群人在“欢迎谭主席”声中拥上岸去，我和廖夫人正待登岸，朱绍良先生已蹿上船来。朱先生是当时武汉行营而兼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

“陈真如在昨夜走了。”朱先生低声对廖夫人和我说。

“怎么一回事！”我看分裂已在临头。

“我也不大清楚。昨夜唐孟潇把真如请去，要他表示态度，否则立刻请他离武汉。他回家之后，连煮好的鸡粥都来不及食便上了一条船走了。”

“他走到那里？”我对真如很关心。

“我也不知道。”朱先生说毕也走了。

本来在我们离赣之前，恐赶不及会期，曾电请武汉延期开会，但我们到时，开会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了。那种分裂的形态已很显明，武汉方面以为照他们的办法，可一举而使天下大定。谭组安还沉着。大概这种情形早在他意料之中，而廖夫人呢，她既舍不得共产党，又舍不得蒋先生，一肚子牢骚，无可发泄，只有把陈其瑗出气。那位陈其瑗先生被举为大会的秘书长，他当日被目为属于孙哲生系统而接近共产党的，廖夫人在大会大哭且骂，说他是帝国主义走狗，不应做大会秘书长，硬生生把他扯下来，另外由大会举了我。至于我个人已经大不满意，但到了这个境地，还极力沉住了气，痴心还以为且耐着心等候，或者时间会告诉他们的错误，能尽我一分力量补救，终要设法补救。

三中全会在他们预定计划之下草草完成，我由组织部长跳到了工人部长，这又是共产党的计划。此外大会又通过一个土地委员会，那算是大会的结晶品。其间最无聊的要算增设了两部，第一个是实业部，任命了孔庸之，第二个是卫生部，任命了刘瑞恒，我问主席团为什么增设这些目前不需要的部。

"这是目前的需要啊！"孙夫人微笑而温婉的用英语答我。

经这次天翻地覆的风潮，我真有点冷然。在那次大彩排中唱大轴的，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他们真是兴高采烈，而我倒是心平气静。

那时候两广已酝酿着清党，武汉也开始了警戒。正在开会的期间，新任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李仲公突然被捕。李仲公原任总司令部的代理秘书长，被认为蒋先生的亲信，我虽然和李先生说不上友谊，但为打不平起见，向唐孟潇和邓择生提

出抗议，如果他们不释放李仲公，我即立刻离开汉口，经过两次的抗议，李先生算是开释了。

“汪先生就快回来了。”这一个消息在各人的耳边都模糊听见，然而并非公开的宣传。我也不知汪先生在于何时真回，及由何地而回，但鲍罗庭和邓择生诸人是知道的，因为汪先生是由法国经莫斯科回国；我那时大概被认为袒蒋，至少也是中立的，所以一般人对于我，不大通知他们认为重要的消息。

四月中汪先生真是到汉口了，他是由上海来的，坐了一只海关的差遣船。那天我们正在武昌的大较场开会，会毕出城到码头，汪先生的船刚开抵武昌，及至知道中央党部不在武昌而在汉口，原船又折回北岸。“汪主席回来了”的欢声立时传遍了武汉，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在那时正式成立。

在武汉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在白健生和何敬之指挥之下的军队已由浙江袭取了上海，江左军的李德邻和江右军的程颂云也联合了袭取了南京，蒋先生经由芜湖而至南京，而且到上海了。由汪先生带来的消息，说在上海已见过蒋介石和李白诸人，就是留守广州的李任潮和广西的黄季宽也都公开的或秘密的到了上海。蒋先生向汪先生的要求是要把国民政府迁南京，同时分共。而二李和白黄向汪先生的要求，是只要汪先生答应分共，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汪先生对于那时分共是犹豫，以为国民革命正在进展，不妨缓一步。对于请蒋下野，为表示他的大度，也不赞成。但他以为国民政府迁南京是应当的，这次由上海至汉口，是预备把这问题向中央提议，如果做不到，他准备在二十二日再到上海。

大概汪先生因不肯立刻分共，所以非想出一个调停办法

不可，因此和陈独秀联名发表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据汪先生后来对我说是奉中央的命令发表的，但我那时不是常务委员，事前并不知悉。这篇宣言一出，蒋先生和各将领均认汪先生袒共，如果国府搬至南京，那更麻烦，所以不待汪先生在中央提议和答复，提前在南京成立别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日也是有声有色的。先由监察委员会提出对于共产党的弹劾，说武汉完全由共党把持，弹劾文的领衔人自然是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几位老先生。南京接到这个弹劾文，遂依据以成立政府，胡展堂先生在上海被请出来当国府主席，而江、浙、皖、闽、川和两广，立刻举行清党。

南京既有了政府，所谓国府迁宁之说，汪先生已不能向中央提议了。武汉这面被这消息激动，大家都愤怒异常，照例又是孙哲生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自李任潮以下都有严重的处分。两方面都实行清党，可怜一般青年就这样有许多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所谓左倾和右倾的青年自然是横被屠杀，而中立的也披着莫名其妙的嫌疑。汪先生经过莫斯科之时，第三国际的当局告诉他回国之后，有三个人应该注意。那三个呢？就是顾孟余、甘乃光和我三个人。我不知共产党怎样作成我的罪状，但显然我在汉口是被注意和监视之一。

其时最苦闷的算是一般中立的人们。所谓中立，并不是不作左右袒和置身事外，实在对于两方的过火都看不过。平情而论，那时分裂，与其说是具有理由，还不如说是激于意气。蒋先生如果按着原议早把国府迁汉，必不至激起国民党内的反蒋风潮。及至蒋先生通电服从中央，如果武汉不迫走陈

真如，耐心几天等中央迁汉才开三中全会，也不至使南京方面马上清党。再则汪先生不和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各方将领还会耐着等候汪先生迁都南京的提议。而南京能够多等候两三日不成立政府，俟国府迁宁，那么分共也不使得党内自相摧残。那是历史的命运吧！我无以解释，只好那样感叹。

宁汉是正式分裂了，以后各人都在苦闷中度过无聊的时光。不过当时还算好的，两方都不相对用兵，南京正在取徐州，而武汉也出兵攻河南，后来宁汉能够复合，大约还靠这一点生机吧！

第 六 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

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武汉也分共清党了，这是宁汉合作一个好题目，也是宁汉合作一个好媒介。

武汉为什么也分共？综合起来有好几个原因，我想也象描述宁汉分裂一样，按着一段一段的理由写下去。

第一，共产党素来自称专用辩证法来分析事物的，可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始终没有找到它的真实性。三中全会的所谓土地委员会，就是中国共产党观察中国错误的一个结晶。在共产党以为中国革命应从土地革命起，成立这个委员会专用以为解决土地问题。宁汉分裂之后，武汉是以邓择生

为中心的，凑巧他去过一次德国，看了德国卑士麦所遗下的社会政策，他便把德国的土地法规和共产党的理论混为一谈，特别热心于土地问题，深想先在两湖来一个土地革命，取得农民的拥护，使南京不攻自倒。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谭组安先生，固然他不过是名义上的主任，但他对于各委员也未尝不发生些有力的影响。你想组安那样老练而懂世故，他虽然不用科学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他知道那个硬干办法在中国是走不通。这个有声有色的土地委员会虽然开了好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而这个委员会的俄国顾问呢，他刚从俄国来，对于中国情形也莫名其妙，要问那个土地委员会拿数字吗？可怜连闭门假做的数字也没有。以一个不肯负责的主任和一个不懂实情的顾问凑在一起，这个委员会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

土地委员会虽然没有结果，而各地的共产党倒扯起农民协会的大旗到处没收土地。这个行动的中间自然还夹杂了许多国民党的左派；这班先生自然不是共产党，但以为国民党要胜过共产党，应该更要比共产党来的凶。这个没收土地的风潮，到处蔓延，政府和社会都觉得岌岌不可终日。在邓择生一般人的意见，以为士兵最需要土地，没收土地最低限度士兵一定会赞成。但邓择生没有想到，两湖的军官都来自农家；中等阶级的农家都有土地的，他们天然的性格最反对激烈行动，尤其反对没收土地。至于士兵大多数是农村的游民，或者是长期的失业者，他们来当兵，不是为土地，而是为着别一种希望，至少为着脱离农村的苦生活。这次没收土地，那些土财主是没有力量反抗，而恶影响倒先及于军队。一般上下级的军官自然大不赞成，而邓择生所最希望的士兵也大反对。我

为着要明了实况起见，一次我到军队去找士兵谈话了。

“没收土地，你们赞成吗？”我发问。

“我们不赞成。” 大家都一致答复。

“你们是没有土地的，为什么不赞成？”

“我虽然没有土地，但我的叔叔的土地被没收了。”一个士兵说。

“我虽然没有土地，但我的表伯的土地被没收了。”另一个士兵答。

一连的士兵没有一个赞成没收土地的主张，或者因为他的伯伯叔叔的土地被没收，或者因为表伯表叔的土地被没收，甚而怨恨到他的表叔的表叔的土地被没收。只有一个士兵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我追问这个士兵的来历，他告诉我，他自从十四岁便离了乡村，和家内任何人没有通过信。

因为土地的没收，于是乎有长沙所谓马日事变了。那是夏天某一个月的二十一早，由长沙一个团长叫许克祥的首先发难，闭城搜捕共产党。这个消息传到武汉，当夜便开会研究对付办法。方法是什么呢？不过是抚剿两途，谭组安首先提出抚的方法，讨论结果，还派鲍罗庭、谭平山和我三个人去长沙一次，半说降，半调查。唐孟潇更以为此去须要一个和各将领相熟的人去说项，因此荐了从前的湖南教育厅长周鳌山和我们一起去。

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许先生仅是一个团长如何敢发难，当然背后还有人。如果他背后没有人，一团人有多大能力，只消一镇压便可以平复，何至于要用抚。许团是何芸樵先生的部下，何先生是著名复古的，恐怕何先生和其他将领都有

关系，唐孟潇也难保不同情；只是我在会议席上不好说，而且既派了我往长沙，倘使我不去时，大家必以为我胆怯，明知事无结果，只好跑一趟再说罢了。

二十二夜我们一行人由徐家棚上火车，刚抵湖南境，突然有几声枪声从田野飞来，车便轧然停止。我落车询问，说是放步哨的兵士要停车问话，我们的车从那里来？坐车者又是什么人？我心内明白，湖南全境已在戒严，我只告诉他们坐车的是我，不好说鲍罗庭和谭平山在车上。车走得那样慢，而又为了戒严耽搁，抵岳州时已夜里一时，看看难得赶长沙了，并且既到岳州，离长沙已近，也应该打听长沙的情形，才好前进。我向鲍罗庭提议，暂时我们宿岳州一宵，明日再动程，大约鲍先生心内也渐渐明白，不假犹豫的同意。

岳州情况还安静，虽然全城布满了哨兵。该地警备司令是一个旅长唤做周磐，我是不认识的，而周鳌山倒很相熟。半夜里找到周旅长，问问长沙情形，当夜便找了一个旅馆歇宿。大清早周旅长便来旅馆，说长沙连日开会，并且已成立一个清共委员会，看来这种情形，鲍罗庭是不好去的。但同时我们又得到一个报告，说就是周旅长也不时和长沙通电话，不要他们清共清到了我们。我是不要紧的，但鲍罗庭和谭平山两个人怎样处置？倘若发生了不测，我实在难对汪先生，虽然我对鲍罗庭也不满意，但既然同来，我也应负起他们安全之责。我想鲍罗庭还是回武汉为妙，一面不等他们同意，吩咐机师先将机头调北方，一面把我的意思告诉鲍罗庭，谁知他倒慨然允诺，并且立刻要走。我说那用不着，因为周旅长还要请夜饭，如果立刻离岳，太表示狼狈了。

食过了夜饭，鲍罗庭便和谭平山就由饭馆直接上车回武昌，我和周鳌山依旧留宿岳州，希望明日得到长沙的实况，再往前进。夜里周旅长又来，说长沙知道我们在此，曾打过几次军用电话来问，他的意思最好我们不要住旅馆，万一长沙方面真派兵来要人，他实在不好对付。我心内知道这位周先生不愿得罪任何一方，而且更替长沙一班先生对我们挡驾。周鳌山先生平素本来是志大言大的人，到了这时也有点张惶，周旅长走后，他对我说：

"公博先生，我们避开罢。"

"鳌山，请你不用着急，若周磐要拿我们，随时都可以拿，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只要我们不去长沙罢了。"

"不是这么说，我是湖南人，你是一个客。如果发生岔子，我实在对你不起。"鳌山象恳求的说。

我知道鳌山担代不起了，我只有听他的意见去住他的亲戚家中，鳌山是一个道地的岳州人，恐怕他的亲戚在岳州的就不少。岳州我是到过的，但我没有游过，更没有住过。那夜我倒尝尝湖南楠木大床的滋味，湖色的罗帐，垂穗的流苏，睡在那里，倒舒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更逛岳阳楼，那次北伐，仅是路经此地，站不住脚便走，到了此时，才有工夫一览洞庭君山之胜，更在岳阳楼上泡了一壶君山茶，我无聊起来，作了一首小诗：

"荡漾湖光映早晖，君山轻似片帆微，危楼缩尽烟波意，欲破浮云天外飞。"

下楼时周旅长又追踪而至，他说长沙的情形很混乱，似乎不可再去，劝我当日回汉口，如果我们同意的话，下午将有一

班火车从长沙开来，那么夜里可以回到武昌了。他的来意，我们早已明了，我们除了答应，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到了下午周旅长还诚诚恳恳的来送车，自此一别，我们直至二十四年才再在南京见面。这次调查长沙马日事变，就这样空手回武汉了。

凭那各地的农民暴动，已够使国共分家了，但共产党除了煽动农民之外，还正在用全力煽动工人。武汉的总工会照例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奉命拥有自卫的枪械、步枪、驳壳枪、手枪，色色俱备；罢工不能解决，工人拿武器威胁雇主和监禁雇主更是常惯之事。武汉固然算是中国一个工业中心，但所谓中心者，不是工业集中于武汉的意思，而是地势上占在长江流域中心的意思。它的工业发展，自然比之上海和天津远甚，因此资本家的力量又连带的比之上海和天津远甚。工资加到工业不够成本，工厂慢慢都关门，更有强项而狡狯的资本家，把余资卷逃到上海各地，让工人占据了工厂自生自灭。

经济衰落的影响不止及于工厂，一直卷入中等商的店内，店员工会天天煽动店员和店东作对，所有店东宁愿停业也不愿开门；那时学徒也反起来，有一些不满意事情，便乘机对师傅和雇主报复。本来中国的店东对于学徒是苛刻惯的，但目前时代已倒转过来，学徒到工会控告店东和扭解店东之事，更是一件平凡而最普遍的事，这也使店东怀着人人自危的观念。

加以每一个星期都有游行和集会，而游行和集会每星期也不止一次。每逢开会全体店员都得参加，哪一家商店不派出店员的，便算是反革命。不但店员要出动，洋车夫也要停止

拉车去游行。洋车夫是没有店东给工资的，停了一天工，就是停了一天饭，纵使车主不要车租，而他的两顿饭就没有着落。每逢集会和游行，武汉大街上商店全关门，很象新年大家在休息。工人们慢慢对于这些革命行动有些疲倦了，甚至由疲倦而讨厌了，工资两方都呻吟于游行集会的革命行动，只是不敢嗑一嗑牙齿。

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国民党怎样办呢？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和共产党一起朝着失败的路走，第二条路只有分家了。

第二是军事。宁汉两方面起初都似乎有会心的谅解，虽然分裂，却不相互用兵。南京出兵攻徐州，而武汉则出兵攻河南，恰象兄弟分家，各奔前程的样子。但这个想法只是第一期的军事，说到第二期，那便大大不同。在武汉这面，自从汪先生归后，已筹划着北攻的军事，命唐孟潇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向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部担任正面和左翼的攻击，张部担任右翼的攻击。在河南的北方队伍，靳云鹗和国民革命军早有接洽，其余都是零星破碎，不堪一击，所剩下来，仅是张学良统率下的奉军。这次战事说烈不烈，说容易倒也不容易，经一翻苦战，才把奉军解决，取得了郑州和开封，黄河以南已没有奉军的足迹。张学良在郑州

退走之时，留下一封信交商会转我们，说他自己是打败了，他对于我们的俘虏很是优待，也希望我们对于他的俘虏也同样的优待，中国的事正是难说，我们将来都会见面的。我们见了张汉卿这封信，大家都禁不住叫一声“漂亮”，军事告了一个段落，便停止进攻。

自然我们的不进攻，不是为了张汉卿一封信，而是为了后方太空虚。那次会师郑州，冯焕章先生也早从俄国回来，带兵从陕甘越潼关到了河南了。中国的军队还脱不了个人的封建关系，谁的伤亡多少都要打算的，河南一役，张向华的损失是八千，唐孟潇的损失据说是八百，而冯焕章的损失是八十，这个计算自然是不实不尽，但因此惹起张向华对孟潇不满，而孟潇又对焕章不满。张向华的部队大部是广东人，河南既没有许多水给他们洗澡，天气又是每日沙尘蔽天，开郑既下，将士思归，唐孟潇自然不能独力占有陇海的长线，也只有撤兵南返。

为什么不继续北伐呢？实在为军事形势所不许。因为黄河以北还有直隶和山东，如果要继续北伐，须要徐州和郑州两面同时进兵，如果南京不向北攻，我们只由河南北进，不止犯孤军深入的危险，万一山东方面有一支敌军侧击，非大败不可。况且南京方面从前会心的谅解也靠不住了，在我们北伐河南的时候，四川杨森的军队曾从上游攻武汉，而夏斗寅的军队竟进袭到离武昌十多里的纸坊，没有叶挺带着军官学生挡住，我们已失了武昌城，这样进不可攻，那么不能不打算退可以守。这是为什么河南既得，不乘势进兵，而急求后撤的缘故。

我们把河南给冯焕章吧，在汪先生和谭组安一行人到了郑州劳军时已决定。我们一面陆续后撤，一面请冯先生派人填防，这次汪先生往郑州一行，使武汉和冯焕章两面都得不到好印象。武汉这班人比较摩登的，眼见着冯先生大布之衣，杂在士兵当中，有专车不坐而偏要坐货车，有好饭不食而偏要嗜粗粝，以为这是大矫乎常情。并且他治军也太奇怪了，对于下级军官常打军棍不用说，就是高级将领和僚属如张之江、薛笃弼等，除当面斥责不必论，往往在通电话时，一不合意，即在电话说"跪"，那接电话的人虽然没有见冯先生的影子，也不敢不立刻朝着电话跪下去。冯先生太不把人当人了，他迟早要失败的，这是武汉方面由郑州回来的人这样观察。至于冯先生呢，眼见着武汉这班先生，早上开会，晚上也开会，桌上茶哪，饼哪，也实在不配他老人家的胃口；这班都是傻子吧，冯先生也在那里想。因此河南既下，武汉以为冯先生垂手而得中央的大平原，一定会对武汉表示同情，而冯先生则以为武汉这班先生不一定能会成功，北伐无期，不能不另辟途径，由是不久便和蒋先生在徐州会见。蒋冯见面倒不是一件小事，无疑的要图武汉，这个谣言在汉口便流行了起来。而且冯先生当日或者因处境困难罢，就是他用的名义也有些矛盾和滑稽。南京方面原来任他是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汉方面任他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原先是国民军总司令，他终于想出一个圆通办法，打电到南京时，用西北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打电到武汉时，用第二集团军的名义，而自己在河南呢，还用国民军的名义。因为这个圆通办法，武汉对于冯先生更怀疑。这样北边有不稳的冯焕章，而东边有日夕俟机的蒋介石，

武汉除了东征，实在无自存之法。

武汉的军队也太庞大了，唐孟潇有三军，张向华有两军，谭组安有两军，朱益之有两军，程颂云有一军，这些所谓军，每军名义上都包含三个师，而实际上各人还有若干的独立师和独立旅。至于各军之外，湖北和湖南还有若干不称为军的队伍，单就军费而论，并非两湖收入所能支持，这样还是往下游发展罢，于是东征之论，遍布于武汉。

打南京是既定政策，但就是这样打么？如果政治没有主张，军事未必可以操胜算。什么是政治主张呢？倘使不能高调过于南京，也不能低调过于南京。武汉是共产政府，这是南京所宣传的，如果要南京不战解体，那么莫过于分共，于是分共遂成为东征的先决条件。

第三是经济。武汉的经济那时算是衰落极了。武汉政府表面拥有三省的地盘，除湖北之外，只有湖南和江西。湖南仿佛是唐孟潇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会解到中央的，江西也只能供给朱益之的军费，中央为着不能兼顾起见，似乎给了江西与朱益之，不够不管，有余也不要。那么这样庞大的军费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是拿中央银行变戏法。

以前就是北洋军阀拿了湖北，也括不上甚么地皮，所用以为无尽之藏，只靠一个特税，特税也者，即鸦片烟税之谓。我没到湖北之前，有人说湖北的特税每月可收一千万，也有人说只可收到五百万，但确实的数目只是在二百万以上，三百万以下。然而这还是靠上游川黔的来源，倘若上游鸦片来源缺乏，既无特货，自无特税。自宁汉分裂之后，南京对于汉口绝

对采用经济封锁办法，特货既难于东下，因此大减税收。

财政是什么呢？实质言之就是生产和消费两税，有生产而无消费，税不出来，有消费而无生产，也税不出来。湖北的粮食究竟是有限的，平日农产品的输入，多数还来自河南，所谓土地税的钱粮田赋，供给省政府还虑不足，中央自然没有希望可供利用。汉口地方又那样萧索，工厂多数停了工，商店又更愿自动关门，不要说生产，连消费也减少了。这样的情形，不要说办财政，只是财而不政，也是司农仰屋，束手无术。

宋子文先生经过几次向银行强借，银行也渐渐空虚，他和鲍罗庭商量之后，想出一个现金集中的计划。鲍罗庭那时也觉得无计可施，于是在俄国借出一笔款项，寄存于上海的俄国远东银行，在外扬言这是俄国工人们同情中国革命，捐助中国的款项。这个计划是怎样呢？先把汉口的各银行存款封存起来，一切汇兑都由中央银行经理。各商店如果要向上海买货，先须将所买的品类，经中央银行认可，然后把款项交给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发了一张支款单据，即由上海的远东银行划付。这个第一次法币政策就这样在武汉实行，那是中国第一次的集中现金，可惜不久便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中国各银行屈于势力之下，只好服从把现金封存起来，但在汉口租界的外国银行，便一律不听政府的命令。中央银行尽管办你汇兑，而外国银行也尽量办他们的汇兑。商人有些货物无法得中央银行许可，只有走外国银行的偏门，这么一来，在汉口便有两种不同的汇兑率。当日中央银行的许可，也太没有限制，既没有数目的规定，也没有品类的规定，于是许多商民便请托所谓要人，

以购买军需品为名，汇款至上海。纸币已贬值，而将纸币交到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掉现金，固然有些人是真买货物的，但有些人竟直是辗转代人汇款，一转手间，便获几倍的利润。可怜中央的政治委员会还郑重其事，派孙哲生和我两人在中央银行监督，更可怜的是孙哲生和我每隔一日花了半天时间去检视货单。这种政策在当日未尝不合理，但事实上有许多罅漏不可通，不久南京政府得了上海租界工务局的帮助，把远东银行封闭，连这不可通的政策也寿终正寝。

宋子文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上海取得之后，便东下筹备上海的中央银行，及至宁汉分裂，他定了法币政策再去上海时，更索性象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民国十七年他重任财政部长，就职之时还在南京发表演说，说汉口集中现金是共产政府计划，他极反对，所以辞职，他大约已忘记了这种政策还是他老先生手定的呢！

经济的衰落，和财政的支绌，使物价飞也似腾贵。军费固无法支持，人民也苦于无路生活。中央银行和各银行的纸币都用光了，就在汉口印刷罢，纸币没有了，就用金库券代替罢。汉口的金融混乱到无法收拾和整理，纸币的价格既和现金不同，而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也和中央银行的纸币价格不同，即金库券的价格也和中央银行纸币的价格不同，甚至中央银行新币的价格和中央银行旧币的价格也不同，物价的腾贵和纸币的膨涨，仿佛长途竞走着，绝无止境；各种货物的指数，我已记忆不清，我好抽纸烟的，本来一角钱一包的十枝烟，最后已涨至一元两角。财政这样奇困，如何得了，只有一条出路是东征了，而东征又须必先分共。

第四是外交。外交的形势，自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特别恶劣。其初国民政府在广州之时，外交政策是依据莫斯科的外交策略。当时莫斯科有一个幻想，以为英国是老大帝国主义，如果把英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其他帝国主义必定跟着一起瓦解。但单独对英，在国际上也当有一个联系，那个联系是什么？那是中、苏、德、日，四角同盟。苏俄为什么选中了德日两国？因为德国当日的共产党极有力量，在苏俄眼中，德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只是迟早问题。至于日本则迫近中苏，大战之后，英日同盟已为九国公约所消灭，若要反英，应该和日本联盟；它更有一个经济计划，即是以中苏的原料，换取德日的机器。所以自从北伐以后，中国对外的革命对象还是英国，而各国对于革命军的情感，也以日本为比较和缓。

在太平洋有关各国，美国是素来中立的，法国的远东政策是和英国表里的，在革命军攻取南京时，误杀几个外人，美国对于革命军有恶感了，日本领事馆被掠，因之日本也感觉不快了。蒋先生很是眼明手快，分共之后，首先和英国妥协，南京的事变也一干二净推在程颂云的军队和共产党徒。程颂云那时是附汉口的，而共产党又集中在汉口，不期然而然，各国的憎恨与仇怨都把焦点集中武汉的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的口号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和对内打倒军阀的，幼稚的共产党和愚直的工人，总不肯修正他们的主张，转变他们的策略，对于外国人在汉口所开的工厂，要求特别苛刻，而罢工也特别凶，占据外国人的工厂还不算，有时还包围外国人，甚至于施行封锁。各国借口保护他们的侨民生命和财产，纷纷调派兵舰驻在武汉的江边，由旧日的英租界起至日

本租界止，最多曾集中有三十六艘兵舰。鲍罗庭也知有一触即发之势，于是提出“革命退却”的方案，对外国人让步了，对资本家也让步了，因此发生不少共党中央的批评，当时竟有共产党说鲍罗庭反革命。

虽经许多解释，而工人还是不懂什么叫做策略的，对于外国工厂还是不断的罢工，于是鲍罗庭又提议在外交部组织一个委员会，专司调解外国工厂罢工纠纷的工作。这种风潮岂能只凭口舌调解的？案不止一宗，而一宗又不能即了，我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愤怒了，一次说：“工人太胡闹，政府为什么不斫了他们的头。”陈友仁先生是世上目为左倾的，而且武汉分共之后，曾随孙夫人住居莫斯科几年，他当时还愤怒到那样，我们闭目一想，可以了解武汉是怎样的情况。外交那样恶劣，不分共也是政治没有出路。

为着种种的理由和事势压迫着，武汉的分共已有“引满待发”之势。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渐渐改变了作风，孙哲生先生本来是武汉初期的台柱，言必称共党的，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徐季龙先生也同是武汉舞台上一颗明星，到了河南两次，受了冯先生的影响，最后一次索性不再回武汉，高卧鸡公山称病不下。当时孙夫人也着实不满意共党，是时在上海一个共党机关刚被破获，搜出通讯的密码，用“上等货”代表共产党，用“次等货”代表国民党，在一次会议席上，孙夫人坐在我的旁边，用英文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说：“共产党真可恶，他们竟当国民党是次等货。”我们相互笑了一笑也就罢了。

国共马上要分裂了，这是一般人所揣测的，但可不可以到

了北京才分家，又是国共两方比较缓和的人们所期望。鲍罗庭那时住在汉口租界里，轻易也不愿到中政会，他也感觉到国共即将分离，或者正在想设法来弥缝和退却。武汉还正酝酿，江西的朱益之已先动手了。第三军遍贴标语“请共产党同志回武汉”，军队把政治部的共产分子强迫着护送出境，许多共产同志们如朱克靖等都离开南昌。但朱益之只在军队清共，其余如农民协会、工会等，因武汉没有分共的明文，益之还是不敢轻举。他的处境似乎非常困难，打了一个电报给中政会，指明请我至南昌办善后。

中政会指派我往江西会朱益之，我到南昌之时，四面贴着标语，已由“请共党同志回至武汉”而进一步改为“驱逐共产党”和“打倒共产党”。那时省党部还没有一个委员是共产党，可是农民协会和工会皆为共产党所盘据。他们会不会暴动？这是益之所最耽心的。我到南昌，实在没有善后可言，不过朱益之请我来，说明他清共出境的苦衷，要我代达中央，希求谅解。我住南昌一星期多，接到孙夫人的来信，说武汉形势险恶，望我急回汉口。

我知武汉分共的时机已迫在眉睫了。江西情形自然是绝不安定，但我无法再留。焉知我回汉口之时，邓择生已于前一夜出走了。据一般报告，说择生改了装和政治部的俄国顾问铁罗尼北行，大概他们取道京汉路直往陕西而出兰州，越新疆以至俄国。武汉情形真是急转直下了，我想。

下午我到汪公馆，他们正在开会议，自谭组安以下诸人，孙哲生、唐孟潇、程颂云、陈友仁都在座。汪先生报告和第三国际代表路易交涉的经过。路易是一个印度人，是第三国际

的委员而为驻华的代表，这次奉莫斯科命令，向国民党提出国共合作的新办法，内里最重要的是加练农工军三万人，什么是农工军？当然就是正式的共产军。汪先生认这个条件是颠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阴谋，到了此时，分共应该刻不容缓。虽然路易的提议为汪先生所驳回，并向鲍罗庭抗议，因此路易也被第三国际召回，然而共产党步步迫紧，也非立时分共不可。不过我们虽然分共，并不想象南京残酷的清党，汪先生于报告之后，又加上这个温和的结论。

在座诸人除陈友仁先生表示怀疑之外，全体赞成了。夜里谭平山知道我回来，特派人约我至他的秘密寓所谈话。平山是我北京大学的老同学，并且同事很多年，深信我们有一度交换意见的必要。是时共产党本身自然另有图谋，而同时也感觉到危险，重要的人们已都迁了秘密的寓所。

“国共分裂，对于革命前途更有危险。公博你以为是不是？”平山试探我。

“不过目前除了这条路外，恐怕已没有其他办法。”我直爽的回答。

“我以为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即是把国共都解散了，而组织第三党，这样或者免去分裂的危险。”平山提议着。

“这样，共产党本身还有没有组织？”我问。

“自然共产党本身还不免有它的本身组织。”平山不假思索的解释。

“这样还不是和现在一样吗？那就是扯下国民党的招牌而换上第三党的招牌罢了。共产党一样有它的组织，一样有它的主张，而党员也一样的跨党，这个第三党又有什么好处？”

我想不出平山为什么有这样呆的思想。

我们讨论了半夜，终找不出一个结论，在平山当时未尝不是一个好意，以为两党都解散，而溶合为另一个党，既可以振奋既颓的局面，又可免去国共分裂的痕迹。然而共产党是受第三国际指挥，不能解散，这是平山不去想的，中国的国民革命，舍国民党外，更不能让第二个党去领导，平山也不去观察事实的。平山只为想敷衍目前，自然他的理论无法成立。

第二天发觉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她的理论很简单，她说容共是总理一种政策，现在要变更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成。孙夫人在平日和我谈话，极不满意于共产党，但到了真要分共时候，非常犹豫。第二个是陈友仁，他为解决罢工困难要斫去共产党的头的，但要分共，他终不同意。当时也有人批评陈先生，说他的外交，完全靠鲍罗庭供给情报，靠鲍罗庭颁发指示，鲍罗庭一走，外交遂失了指南针。其实那时纵使没有鲍罗庭的问题，友仁先生也难免一走，因为外交部长都有自己的方针，既然分共，那是变更政策，外交部长当然要让位。第三个是廖夫人，她的理由也和孙夫人一样，以为仲恺先生也是主张容共的，并且仲恺先生也因此而殉党国的，所以她也不赞成分共。夜里她去找我谈话，我给她解释种种情势，恐怕分共已是既成事实，无法避免。

“我总不赞成，虽然共产党也可恶，我对他们也极不满意。”廖夫人坚决地说。

“目前若再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产党跳水。”我只客观的补述我的结论。

“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廖夫人情感的不附任何理由。

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中央于是颁布明令分共，但为完成汪先生温和的结论起见，于分共之后再补一条明令保护共产党。武汉的分共，最初确是温和，既不严厉清党，也不捕拿首要，这或者是汪先生民主主张的一贯政策罢。分共的时候，鲍罗庭已准备离武汉，政府还替他预备许多汽车，使他得以从容由西北回苏俄，至于加伦将军则留在汉口，直等宁汉复合之后，才慢慢的由上海假海道归国，虽然有南昌贺叶之变，我们还是纪念他参加国民革命战役之功，还是对他一样优礼。

分共之后，武汉立刻准备东征。以唐孟潇为总司令，令何芸樵从江左岸进兵，令程颂芸和张向华从江右岸进兵。在江左岸何芸樵不久占了安庆，而江右岸则张向华军队发生了南昌贺叶之变。张向华先生是我老友，而北伐时期他的战功也最多，但他许多弱点之中，有一个弱点是最爱人恭维，于是共产党认定他是一个目标，在武汉时候整日对他恭维和称颂。邓择生是最长于理论讲演的，而且也最长于拉拢的，在武汉之时，无日不见向华，也无一次会议不拉向华，由是向华自己以为他并不是被共党包围，倒以为他可以绝对指挥共产党。他的第二方面军是合原来他的第四军和陈真如的第十一军而成，他命黄琪翔为第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长。他底下的六个师，一个是缪培南，一个是许志锐，一个是李汉魂，一个是蔡廷锴，一个是叶挺，一个是富双英。缪许李这三个师他是把握得住的。蔡廷锴原是陈真如的旧部，叶挺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富双英是在河南临颍之役才由张学良那边投降过来，但张向华以为这三个师也绝无问题。因为蔡廷锴曾向

向华表示过忠诚，有一次陈真如派人至武昌运动蔡部，给蔡廷锴枪毙了，所以赢得向华深信；叶挺虽然是共产党，然而向华以为叶挺忠于他的程度，较忠于共产党的程度为尤深；富双英更是降将，向华在南方称为铁军，富双英在奉军也有铁军之名，北方的好汉是不会改变的。

向华对于分共的确是烦闷。他素来对于他的军中共党分子作战都异常称诩的，如果不遵令分共，他到底是国民党的一员，如果遵令分共，对于他每天所听的理论的确有些矛盾，而且许多共党还是多年的袍泽。向华于是便有点妙想天开了，他想以共党护法自居，把一切共党都搜罗在军中，企图带至安全地带，而同时更希望一班共党都歙然的听他命令，对他拥护到底。因此他对于东征是不大赞成，为的是就占了南京，还不是他们的出路；碰巧李任潮先生也不愿鹬蚌相持，暗地里派人至武昌和九江，劝张向华带兵回广东休养。

从各方面的酝酿，回粤又正中向华的下怀，他的部队刚到了九江，向华遂正式要求带兵回粤。在当时这种举动自然是拆台，但武汉的国民政府岂能不倒过来服从张向华的意旨？

不止如此，张向华要求留在南湖学校的军官学生都编作他的教导团，以备带回广东，汪先生也答应了。我派余恺湛做他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向华也拒绝接受了。虽然向华中途脱离武汉回至广东，而东征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江右岸的军事，只好找程颂云担任了，我正在要在汉口率领政治部人员东下，南昌的贺叶叛变，突然发生。

事实是这样，在向华以为率领他的军队回广东，可以在南方休养，或者另创一个新局，而在共产党的朋友，则以为跟着

向华还不是出路，大有急不及待之势，等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到达南昌之后，即发动"贺叶叛变"。南昌突然成立一个号称国民党的特别行动委员会，中间夹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一夜之间抢掠了省政府各机关，朱益之的教导团长朱德还带了一些滇军和贺叶会合。但南昌只能作一个发动地方，而不能作一个革命根据地，于是贺叶便率兵向着他们所认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海丰县和陆丰县进发了。贺叶临走，不止挟持了这班行动委员会的首要，而且把江西建设厅长好好先生的姜济寰和省政府委员好发议论的萧炳章也拖着走了。

向华对于共产党庇护是愿意的，但离开他的军队再非他所能容忍，他闻得消息之后，由九江乘火车奔往南昌，希望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势，把他们镇压住。但火车至到德安不能前进了，前面有他自己的军队堵住，不肯让火车通过。向华气极了，亲自下车，喝道："我是张总指挥。"堵住火车的兵士说："我不认识张总指挥，只认识我们同志。"向华再想说话，那边要开机关枪。到了这时向华才知自己也掌握不住军队，只有往后退。叶挺全师叛变了，蔡廷锴乘着乱哄哄的机会，拖了他一师人——还兼并了其他师的两团——向着福建走，等陈真如的后命了。富双英据说也受了唐孟潇的运动，不肯随行，朱晖日先生见了两次富双英，均无效果，他索性连第十一军长也不做，在九江乘船至上海，迳自先返香港了。余下了残破的三师，由黄琪翔用代理总指挥的名义带着，还浩浩荡荡的朝着广东的南雄前进，而向华也意态索然的离了军队一个人乘船回广东。

向华这样自由进退，实使武汉的东征计划受一个严重的

打击。凭唐孟潇、程颂云、鲁涤平的军队，未必就能打下南京的，纵能打下南京，以后党的善后又怎样？两广的问题又怎样？不过不东征就是死路，断不能困守两湖听天由命，束手待毙。天下事不得了的时候就了，这是谭组安先生的哲学，那时真是灵验了。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从北方反攻过来，徐州失陷，埔口也受了压迫，李德邻和白健生在南京提议，武汉既已分共，南京应当欢迎，这个提议不啻压迫蒋先生，于是蒋先生通电下野，而南京的国府主席胡展堂也发了一个"一了百了"的通电，翩然回居上海。

我们一行人那时都齐集在九江，汪先生以下诸人皆在牯岭，李德邻乘着军舰往上游来，一半是欢迎武汉同志东下，而一半是搬取救兵以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我们欢迎着李德邻住在宋子文岳父的张宅，我们一行人由牯岭下来和德邻开善后会议。德邻先生表示来意之后，欢迎一节自然是客套，我们没有多大讨论，而最要紧则为怎样出兵援助南京同志堵住孙传芳。这个问题不讨论倒还罢了，一讨论李德邻便和唐孟潇起了争执。在德邻之意希望武汉的军队不要到芜湖，即由安庆斜出合肥腰击北来的队伍。而在孟潇之意，以为军队不到芜湖是集中不来，在战略上实没有这种打法。两个人坚持不下，程颂云便插科了：

"孟潇是对的，军队非到芜湖，不能集中。而且军队可以食泥沙的话，也可以不到芜湖。但军队是要食饭的，不到芜湖，那里找给养？"颂云先生又肯定的而且从给养打算。

我虽然参加了军队工作许多年，但到底不是一个军事家，不能插嘴，汪谭两先生也对军事不了了，我们只好休息一

天，明天再谈。当夜我们都宿在张家，汪先生、组安、哲生、德邻，睡在楼上，我因没有地方，只好睡在客厅的梳化。德邻在北伐时候也是和我常在一起的，宁汉分裂时候也都是不愿意而为事实压迫才分开的，久别之后，都愿作一长谈，大家上了楼睡觉，我们还在客厅抽烟卷，讲别后的故事。

"孟潇的军队不下去，你们到底挡得住挡不得住孙传芳？"我诚恳问。

"那倒很难，因为我们军队力量太薄。"德邻也不隐讳。

"你们即要孟潇军队下去，而又不让他到芜湖怎可以？刚才颂云不说军队如果可以食泥沙的话，才可以不到芜湖吗？"我郑重的复述程颂云的话。

"那里有这事？刚才散会之后，我去找颂云，颂云也不主张孟潇的军队到芜湖。"德邻有点愤懑。

"那么他为什么那样说？"我很惊诧。

"他说因为他在孟潇之前，只好这样主张。"德邻又沉默下去。

那不是挑拨离间吗？程颂云真可恨，刚在宁汉合作之时，又耍这套把戏，我心里真不自然。我们又抽一阵烟卷，我陡然想起了一个办法，我跳起身：

"德邻，你不过不相信孟潇，怕他占安徽，威胁南京罢了。但你不相信孟潇，难道也不相信我们？我提议一个折衷方法，你尽管让他到芜湖，而我们明日都和你去南京，我真不相信孟潇连我们都打。如果他不恤公意，我也和你们合起来打他。这样你总可以相信了吧？我们都到南京是先相信你，如果孟潇打南京的话，那么你可以把我们宰，把我们杀！"

“好，就这么办！明日请你对汪先生说，但我坐来的船太小，恐怕大家全去坐不下。”德邻很高兴的下决心。

孟潇第二天大清早又来，谈到军事又和德邻争执。

“德邻，我们将来不在桌子上见面，就在战场上见面。”孟潇很盛气而骄矜的说，德邻面上显出不自然。

我向汪先生提出我昨夜所想的计划，大家都赞成。因为德邻所乘的船太小，我们公推谭组安和孙哲生同李德邻先去，而德邻电南京改派一艘较大的运输舰来迎汪先生及我们到南京。我们一面打电汉口，请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准备，我个人则乘商船先回武汉，向留汉各中委报告。

牯岭在那时真是冠盖云集了，宋子文、伍梯云，都及时赶来了。那时已有人提议汪蒋合作，因为我既赶回武汉准备迁宁，所以事后才知。没有几天南京的军舰已驶了上来，我们分别在汉口和九江登船下驶。经过芜湖，陈调元上来谒见汪先生，那时已知孙传芳军队竟偷渡长江来袭，已被白健生指挥着他的第七军把孙军歼灭，这所谓有名的“龙潭之役”。孙传芳经过这次大败之后，溃不成军，军事既告一个段落，我们到了南京，遂不再谈军事，而谈党务和政治了。

我们到南京约比组安迟了一星期，那时龙潭之役算已完了，组安和哲生且已去过上海一次了，据说他们是到上海和居沪的中委接洽，至于什么来由和结果，我也没有深问。南京算是一座空城，蒋先生下野而胡先生又走，政治和军事都由德邻和健生主持，而何敬之因为牙痛住在医院里。他们预备了财政部的地址丁家花园给我们住居，入夜陶冶公奉健生之命来

见我，问我几时接收政治部。那时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还没有搬来，我也不知道是否还主持政治部，只好嘱他预备，等过几天再说。

一宿无话，第二天中午汪先生一班人还去汤山游玩，顺便讨论些政治，夜里无事，我又找组安夜谈。

“你们到上海见过什么人？”我问。

“人倒见了不少，连西山会议各人也见过了。”组安答。

“这班人有什么意见？”

“他们意见很多了，我主张汪先生应该到上海一次和他们见见面，就是胡展堂也应该见见。”组安似乎有了主张。

“恐怕谈不拢罢！”我不经意的提出疑问。

“我们都分共了，说到反共，他们还是老前辈呢。我以为趁此机会大家就团结起来罢。”组安笑着，似乎很正经的，又似乎带点玩笑。

我这人根本就不会怀疑组安已另有计划，我也不愿表示特殊的意见：

“上海还有什么好听的新闻吗？”我自从十一年赴美经过上海以后，再没有去过，忍不住好奇的刺探，自然我所谓好听的新闻是指社会一般的。

“唉，有一个新闻。”组安这时笑了：“我到上海时候，去拜访宋老太。我正在客厅看报纸，等候她老人家，突然见面前站着一个人，我以为是宋老太，急得站起来，谁知是宋美龄。美龄说：‘三哥，我爱介石是你知道的，我要嫁他而子文不赞成。子文定婚何尝得我们的同意，今天我要嫁人，他倒要干涉我，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美龄向我诉苦，真使我难于答复，

幸而宋老太太这时已下楼，这才把我救了！”

“这件事本来传闻了许久，这样恐怕快要成事实了。”

“可不是吗？”

我和组安的谈锋又转到别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丁家花园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推汪先生、组安、哲生和益之往上海和一班中委接洽，李德邻也同行，汪先生等算是代表武汉的，李德邻算是代表南京的。本来这种办法有点滑稽，即同是中委，又已合作，何必按着地方作代表？但我不好说话，因为刚刚在合作，未便发表许多意见。我和璧君、孟余也同去，那是私人的行动，算不得代表。第二天同车的人很多，于右任、孔庸之、宋子文等都赴上海，一半是趁热闹，一半是找休息，至于我个人则有些观光的意思，也不想参加他们的会议。

到了上海翌日，他们代表开了一天会，夜里孔庸之在他福开森路的家里请我们食饭，在座的人们多数是所谓汉方。我还记得除了主人以外，有汪先生、谭组安、朱益之、顾孟余、宋子文、孙哲生和我几个人。席间汪先生报告会议的经过，说本日会议，他们提出宁汉沪三方面合作，每方将来举出六个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以代替中央党部。我问汪先生答应了没有，汪先生说他还没有答应，我立刻觉得这个办法不但是大不妥，而且是违法，我也不和汪先生商议，即席提出反对的理由，说：

“今日谈到合作，不止宁汉，即更加几方面，我也赞同。不过无论如何合作，均不能违背法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全国代表大会举出来的，现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即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员会。我以为取消执行委员会，只有代表大会才有此种权力，中执会没有这种权力，何况又是在沪几个代表，那当

然更没有这种权力。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三十六人，这都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根据这个办法，汉方选出六人，宁方选出六人，合计也只十二个人，除此尚余二十四人对于党务不能过问，即无异乎把他们资格取消，试问我们凭何种权力可以取消他们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不止如此，除了中执委员会，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我们只取消中执会而不取消中监会，那是非驴非马，若取消了中监会，我们更没有这种权力。倘使中执委员或是中监委员提出质问或弹劾我们违法，我们将何词以对？又倘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质问或弹劾我们违法，我们又将何词以对？蒋先生虽然下野，他若起而以此为号召，那么我们必定立刻塌台了。”

汪先生恍然大悟，在座几个人都默不作声。是夜的宴会虽然是照常载笑载言，各人都各有各的心事。席散之后，组安说：“公博先生，我们须要承认事实，不必再谈法统了。”我说：“组安先生，刚才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还不完全站在法统立场，无论任何中央执监委员及代表向我们质问，我们均无法应付。”汪先生离席之后，拉我至人散尽后的饭厅，闭了门说：“你所说的都对，我今天实在没有答应，但谭孙似乎和他们早有成约，这怎么办呢？我们到你家再谈吧。”

汪先生夫妇和顾孟余到了东西华德路我的寓所商量，讨论的结果，以为赞成这个特别委员会是不可以的，而反对又反对不来，似此只好置身事外再说。但我们终不能住在上海让他们胡闹下去，这样只好回武汉了。汪先生打算到牯岭暂居，而我呢则愿意回广东看看，或者李任潮比较明白些，我们能够设法维持第二届的法统，或者不至于惹起天下的大乱。

第二天早上我还想尽最后一份力量，跑往戈登路伍梯云家中看李德邻，入门之后，见那圆厅上已坐满了人，张静江、李石曾，一群老先生都在内。我和德邻在旁边一个小书房谈话，我反覆譬陈利害，德邻似乎成见甚深，绝不为动，只有说："算了吧！一班老先生都赞成，而且汪先生也赞成了。"我说汪先生不会赞成的，而德邻总不相信，我知道此事已经无望，那天汪先生还和他们鬼混，夜里宿在我的临时家中，我让汪先生夫妇睡在我的卧床，我睡在厅上的地板，第二天绝早汪先生夫妇坐了一只商船到牯岭，我则悄然离沪回香港。我们走后，特别委员会遂不顾一切的成立，搬至南京，代行中央党部的职权。末后为了此事，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汪先生说始终没有赞成这种组织，而吴稚晖先生他们则一口咬定汪先生实在当日已经同意，不过同意之后才反悔的。这是一宗历史上的争论，这是宁汉合作后特别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我回广东之后，便首先举起大旗反对这个非法的组织。

第 七 章

广州驱李之役

十六年年底广州驱李之役，是"陈公博应当完全负责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一般人这样说，蒋先生也是这样说。当我十七年在上海办《革命评论》的时候，为着出席和不出席五中全会问题，和吴老先生稚晖打了一场大而且长的笔墨官司（全文

载在《革命评论》和上海各日报），打到难解难分之时，吴老先生看看输了，蒋先生为着排难解纷起见，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谈话，赞扬吴老先生是“国之瑰宝”，而说最小限度引起广州共党之乱，应由我负责。所谓引起共党之乱自然由于驱李之役而起，蒋先生为使吴老先生气平，非把我抑住不可。敬老慈幼的大道理我是懂得的，我想就是我负责罢，又有什么了不起？因此我在报纸也来一段谈话，说当时驱李，中央委员通通不在广州，张向华和黄琪翔都不是中委，以中委资格而担负驱李之役，只有我一人，所以我应该完全负责。

这段谈话发布之后，倒惹起不少看热闹的人鼓掌，说我有担当，有勇气，是英雄的本色。其实那是我少年的豪气，只求自谅，不求人谅的老脾气，广州驱李之役，应该负全责的还是责我应负全责的蒋先生。我这些说话是不是洗刷呢？当然不是。大凡官司打得正急的时候，要洗刷应该在那时洗刷，断没有打官司的时候不洗刷，而在官司打赢之后才来洗刷的。那时在我们掀动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大旗，李任潮先生是被驱逐了，过了些时桂系也倒了，我想起来，今后叙述这一段内幕，我还深深的对桂系一班老朋友抱歉。

“新桂系”一个奇异的名词，也是当时驱李的时候张向华他们发明的。实在桂系当时并没有成系，在广州主持政治分会的是李任潮，在广西主持省政的是黄季宽，在南京主持大计的是李德邻和白健生。他们都是广西人，互通声气自然是有的，不过都是带兵的将领，对于党务和政治在其时还没有很大的欲望。“桂系”两个字太讨人厌了，广东人对于桂系一个名词尤其有深刻的恶印象。在民国五年陆荣廷带兵东下之

时，兼并了广东，与政学系互相表里，压抑到国民党不能喘气，其初广东督军任了陈炳琨，再而任了谭浩明，终而任了莫荣新，这三个都是广西将领，直至民九粤军回粤之时，才算把桂系驱走，民十陈炯明带兵占了广西，才把桂系消灭。这个桂系名词真太讨厌，故而张向华他们发明这个旧名新用的宣传，加在李任潮等头上。

我对李黄白他们都有相当好感的，我很赞美李任潮的沉着，李德邻的宽厚，白健生的谋略，黄季宽的机智，而且在北伐的战役中，我和德邻、健生共同相处也很久，他们或者还不了解我，而我倒很了解他们，不过在宁汉合作之时，李德邻已没有从前的谦虚，白健生也有些自大。譬如我苦劝德邻对于特别委员会应当考虑，他毫不思索，以为总没有问题。而白健生呢，更予智自雄，以为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在宁汉合作时期，我在南京停留两天，曾有一次和他讨论今后军队的政治工作。

"我看今后政治部少做民众运动的工作罢。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白健生很自负的说。

"这样何不就撤销了政治部?"我提出抗议。

"贴标语，叫口号，总该有人罢!"健生大约以为贴标语和叫口号就是政治部的唯一能事了。

经过这一度谈话，我自然对李白有些失望，但我依然维持原有的友谊，换一句话，我对李黄白感情都不错，想不到后来凶终隙末，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又有几次。

我于九月二十后回至香港，住了几天，至广州会见了李任潮一次。任潮见我南归，倒很欢迎，立即派人至香港，征求我

的同意任广东的民政厅长。但当我住在香港的几天，宁汉的军事终于爆发了。

在香港小住的时期，只知道汪先生夫妇和顾孟余到了牯岭，但报纸传来的消息，说汪先生曾有一度至汉口，并且在武汉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我很替汪先生耽心，因为宁汉军事爆发，我判断唐孟潇是不能支持的。

唐孟潇的为人，我不愿意加许多批评，当时一般人们的心中，都以为这个人是极可怕而难于做朋友。大概这种心理由唐孟潇在湖南时合并刘铏一师所酿成。孟潇在未加入国民革命军以前，在湖南是赵恒惕底下的第四师师长，除了他一师以外，还有三个师，那是叶开鑫、贺耀祖和刘铏。他一次要火并刘师，在宴会上便把刘铏扣留了，后来刘铏死了。他的死因，至今不明，有说他是自缢的，有说他是被杀的，但无论如何，刘铏是死实了，而且死在被唐孟潇扣留的期间。这一种传说，遂使保定的军官同学们都怀有唐孟潇靠不住的心理。

在武汉将下之时，唐孟潇扩军心太切，想把三师扩为三军。邓择生对这种举动十分不赞成，因择生是一个广东人，心想先扩充广东的有功军队再议其他，而孟潇的扩军欲倒想先陈真如和张向华而成三军，这也使择生不断对蒋先生说话的缘故。我在李家桥一次见到蒋先生，他很愤慨的说："我们不要两湖了。"这无疑的是择生多说孟潇坏话的结果。择生当时不止对蒋先生如此说，对各将领也如此说，后来虽然择生利用孟潇支持武汉的局面，宣传他是如何如何的革命，但那些先人为主的成见，没有一个人能忘。

"孟潇恐怕靠不住吧！"这句话差不多深深透人各人的心

坎。因此他的举动是有可疑的，固然使人感觉不安，就是绝无可疑的，人家也会有不惜的推测。我还记得在东征时候，我们都在九江。朱益之那时的军队没有参加，对于唐孟潇军队也有相当的警戒。

"公博先生，你看孟潇会不会假东征为名来抢江西？"益之终于忍不住问我。宁汉分裂以后，我和益之比其他将领都熟，他坦白的陈述他的恐怖。

"我虽然不能保证，但我相信孟潇没有那样蠢。我看他无论怎样枭雄，政治上终要找一个领导者。现在北方已崩溃了，他绝不会投北的。南京正在对峙，他也不会附宁方。这样他如果要夺江西，最少也要得中央的同意，你看我们能让他这样胡干吗？他一个人敢这样胡干吗？"我把客观形势分析给益之。

到了今天，我还敢保证孟潇没有这样心思，但一个老实的朱益之，竟会疑心到孟潇抢江西，孟潇之不为人信任，我们已大略可以想见了。

在北伐之时，孟潇也种下许多祸胎。北伐出发之师，在广东原本编有几军，第四军两师和一独立团，由陈可钰领之。第一军两师由王柏龄领之。第二军三师由鲁涤平领之。第六军两师由程颂云领之。照道理说鲁程两军都是湖南人，应该入湖作战，但孟潇恐怕谭组安和程颂云抢湖南的地盘，极力拒绝而使他们逾梅岭入江西，这也是谭程不满于孟潇的原因。

东征的前夕，孟潇也太开玩笑了。当时定东征总司令之时，他的参谋长龚孟希把系统表向军事委员会呈核，把谭组安列在孟潇指挥之下。"哈，哈，这使不得。"孟潇笑起来把笔

勾了谭组安的大名，那时大量和圆通的组安，一时也面红过耳，大家都见到而替他难受。后来组安还对人说："今天会议没有什么，只是我们又得一个新上司罢了。"

根据种种的原因，孟潇真是专走自取其祸之路。他更在宁汉合作期中，一定坚持要派兵下芜湖，在九江一夕辩论之中，谭程两位老先生已看出德邻不满的心事。他们在驶南京的船上，早定了讨唐计划，只是汪先生和我们还蒙在鼓里罢了。至到汪先生到京之时，程颂云才把这事通知汪先生，要求汪先生同意；你想当时北京未下，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还虎踞徐州，汪先生怎样能答应这个操刀自割的计划呢？这又是我们和李白反脸，甚至和谭组安反脸的来由了。

李白讨唐之役很快便结束，谭组安和程颂云都曾任过湖南的都督，许多旧部的将领任职于孟潇军中，还有广西籍的将领李品仙和叶琪早已和李白有默契。谭程一掀反唐的大波，新兴的唐孟潇自然象冰山般瓦解。孟潇见大事已去，临走之时还把一个通敌的师长张国威勒死在他的浴室中，才踏上一艘日本兵舰逃日本。我于民国十七年在上海重见孟潇，问他为什么失败那样快。他说："何芸樵是久怀异志，李鹤龄好货太甚，所能靠的军长只有刘铁夫一人，怎么会不快失败！"孟潇果然有事后先见之明，然而可惜太明白于事后罢了。

…………

无论怎样，孟潇到底对于北伐有功，在大敌未灭之前，国民革命军自相火并，实为北伐以来的第一次，这实在使我们不能同意。因着孟潇的失败，武汉的政治分会自然也随着冰消瓦解，南京的特别委员会似乎更稳固了。

李任潮的态度怎样呢？他对于特别委员会，为着李白支持的关系，早已表示赞成，我到广东第一次见他之时，广州已四面搭起牌楼，预备于十月十日庆祝特别委员会成立。我历陈我反对特别委员会的理由，任潮也以为我很有法理和事实的根据，但沉着的李任潮，似乎依然不很大方。

“武汉不是开除过我的党籍吗？”任潮表示着不满意。

“这些旧账，我以为可以不必再算了。武汉许多人何尝不给南京开除党籍？何况在宁汉复合时候，武汉把一切被开除党籍的人们都恢复党籍了。”我只好安慰他。

任潮的态度变了模棱，他要黄季宽来粤才确立他的主意。这时张向华早已到香港，起初躲在邹敏初家里，不愿意见客，甚至乎连我也不愿见面。有一天他急了，叫余恺湛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任潮给了他五万元港币，要迫他出洋。军人离开了军队就等于丧失生命，他这时只好设法找到我商议。

黄琪翔那时正率领第四军部队渡梅岭南归，李任潮一面派人欢迎，而一面又感觉卧榻之侧有人鼾睡的威胁。四军初抵广东，提出无数的要求，财政厅长要任邹敏初，军事厅长要任朱晖日。朱步云是我认识的，邹先生是什么人，倒似不见经传。一天财政厅长冯祝万先生来见我了。

“我以为公博先生应该做财政厅，怎么找起邹敏初来？”冯先生很愤慨的提出异议。

“我做过武汉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我发誓再不干财政的事情。邹敏初先生到底谁荐的，而又是什么人？”我笑起来璧谢冯先生的建议。

"邹敏初呵！他只是一个捐棍。他是向华要求的，因为他和四军中人都有捐务的关系。他为什么和四军熟呢？他每逢承包了一个地方的捐税，便邀驻防的军官们入股份。但这是不过一句话，你入股与否倒无关系，每逢节日，他照例按着股份送上利钱，听说向华当团长时就有经济的关系。"冯先生又愤慨的叙述邹先生的历史。

向华对于任潮怎样要求，我是不管的，我所管的只是要反对南京违法的特别委员会。任潮当日虽然很委屈的接受向华的要求，但卸任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和卸任的军事厅长徐景唐全是他最亲信的左右，这时任潮已感觉极端威胁了。任潮先生虽然镇静而沉着，但威胁是必须排除的，他于是恃着老长官的资格，迫着向华出国游历。他又恐四军恃着新胜凯旋之势，难于驾驭，又请驻在福建蔡廷锴的军队回粤休养，并指定潮汕为蔡部驻防之地。蔡部自从在南昌脱离张向华之后，已请陈真如重回军中，并且把军队拖至福州之后，又缴了第四师谭曙卿全师的枪械，立刻恢复十一军的番号，而由真如重任军长。这个十一军经过向华兼并之后，积不相容，任潮就用这种手法，来压抑向华的气焰。

这种手法一来，轮到向华受威胁了，任潮迫他出洋，他已经十分不愿意，何况陈真如回粤，那更激起第四军全军的反感。要不出洋，更要防止陈真如回粤，张向华只有反对李任潮。用什么名义反对李任潮呢？惟有煽起反对特委会的口号，才能得天下的同情，这时向华的主张渐渐和我的主张接近了。但我们当中有不同之点，我是主张拉着任潮反对特委会的，向华和他的将领是主张驱逐任潮反对特委会的，这个不

同的论点，直至汪先生回粤之后才统一。

武汉差不多被李白攻陷时候，汪先生实在再不能住居牯岭了。我和任潮、向华商量，请汪先生回粤再商大计。这个提议黄季宽首先赞成，于是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汪先生，而汪先生也就回至广州，并且请了顾孟余、何香凝、王法勤、陈树人、甘乃光、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至粤，这是后来所谓粤方委员，这是南京一班特委会的先生们替我们上的尊号。

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可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张向华既想驱李，而蒋先生又要求驱李，那么我的和平论自然失了支持，于是驱逐李遂为既定的政策。我当时实是不愿意，但我素来是服从多数的，也就那样办罢！

汪先生最初主张在粤挂起中央党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黄季宽都不赞成，只同意和李白磋商，把特委会撤废而重开第二届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算被李白所赞成，汪先生遂禾任潮一同至上海开预备会，而我们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动手驱李。

我们为什么不在任潮在粤时候动手呢？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实在当时的友谊，各人还愿意保存着，虽然政治意见不合，友谊还应好好的顾全；这或者是东方一种道德，而为主张彻底的人们所不了解。

汪先生未离粤之前，宋子文先生先到过日本，并且由日本赶来了广州。他并说蒋先生来粤，他也来粤，不过他宣称不任

财政，托我先向四军声明。所以当日如果驱李之后，没有共党暴动的话，蒋宋都会南来，如果广州另行创立一个新的局势，恐怕今日的历史又需要另一种写法。

驱李之役很简单，本来任潮已不在广州，实在不驱也早已离粤。所谓驱李，只是出了一张布告，由黄琪翔用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李福林用第五军的名义，我用政治部的名义，会同署个名，再则派了些军队搜查李任潮的公馆，戒了一夜的严，算是了事。当时所苦的只是黄季宽，他那时到粤送汪先生和李任潮之行，任潮留他主持军政。驱李之役，倒是一人不伤，不止黄季宽及时而逃，连冯祝万等都闻风先走，大概四军中人都是旧日袍泽，没有发动，就通知他们预早避开了。

加入驱李之役的，还有新编第二师薛岳，和独立团黄镇球。薛伯陵因不满于　党，刚刚占领上海，便向汪先生辞职，回粤之后，任潮命他为新编第二师。至黄剑陵则为朱步云的连襟，这也是为向义而来，加入了这个新团体。

…………

不幸得很，驱李之后，共产党便暴动了。本来向华在武汉分共时候，以共党护法自居，虽然为着南昌贺叶之变，向华才被这一激转而分共，然而共产党潜伏于四军之中的还不少，他的参谋长叶剑英先生就是一个共党的要人。叶剑英不止是参谋长，还兼领了一个教导团，就是四军的警卫团团长也是一个共产党。碰着代理总指挥的黄琪翔先生又是一个刻意要做左派的一个人，四军回粤之时，沿途张贴标语，就有“清党就是亡党”的口号。我最初之不赞成驱李，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原因。

朱步云先生当时是军事厅长而兼公安局，他倒是对于搜捕共党不遗余力。他对于黄琪翔是不满意的，一个对于共党是严厉，一个对于共党是纵容，这不独四军中人知道这些冲突，连一般社会也知道这些冲突。一次朱步云捉了几个共党，把他们关起来，后来因为他们病了，送到市立医院疗治，竟直被几个武装兵士乘一驾汽车从医院里抢出放走。这些消息，不只传遍广州，大家已象大祸临头，知道共党终有爆发的一日。

果然十一月十三日共产党在广州暴动了，主持暴动的就是叶剑英，而参加暴动的也就是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关于这事我已在《军中瑣记》描写过，不再赘述。自从共产党暴动之后，四军大失人望，连带军心也动摇起来，在会议席中竟直有人主张欢迎任潮回粤，向华看看已有点掌握不住自己的军队。奇怪得很，向华自回粤之后，自己早失了信心；驱李时候，他住在香港，不肯露脸，而驱李之后，许久都不见回省。我忍不住命余恺湛到港找他，据余恺湛的报告，说向华怕黄琪翔不欢迎，故不敢上省。真奇怪，我只有亲自至港见向华了。

"为什么你怕黄琪翔拒绝你？"我表示惊诧。

"琪翔曾派人来，说总指挥不必上省，等事情平定之后再请你回来主持。显然琪翔要抵制我了。"向华很苦闷的诉说。

"岂有此理？我终不信你的推测。你四军里难道都不服从你，而服从黄琪翔。回去罢，有岔子，我替你担保。"其实四军的事，向华比我知得详细，但我不能不放胆提出大胆的空口保证。

向华当时已缺乏了信心，回粤之后，也只当了一个军事委

员会分会的常务委员，不肯直接指挥军队，到了共党暴动之后，连他自己也摇动了。那时上海正在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汪先生直接提出蒋先生复职总司令。蒋先生复职，固然李白大反对，组安也不大赞成。他们无法否决这个提案，遂把驱李和共党暴动混为一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的身上。李任潮和德邻、健生，因为我们驱李，自然恨极我们，而孙哲生则因为我们反对特别委员会，也不顾事实的对我们深文周纳。我们在广州费了三天之力才把暴动的共党肃清，而京沪的宣传都说我们实在就是共产党，而我们也实在是暴动的主力，京沪的广东同乡会在李任潮和孙哲生指挥之下，大开会议，向国府请愿讨伐我们了，并且请李任潮回粤平乱了。

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罢。"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罢。"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去；法国当局于是劝汪先生离沪，蒋先生也劝汪先生出洋，汪先生终于离沪出国往欧洲了。

广州自经共党一度焚烧之后，虽然损失不大，我们确实难以支持。军心那样的动摇，而民情又那样的责难，陈真如和陈伯南由东江向广州进攻，黄季宽又带兵从梧州西下，看看我们只有放弃广州了。蒋先生有电来叫我们退守韶关，宋子文更派林子峰持手函来，叫我们把中央银行迁北江，但经我们一度讨论之后，认为过于危险，因为那时的滇军范石生一师是驻防北江马溅一带的，范石生本来已不甚可靠，而那时他又容

纳了从南昌暴动失败下来的朱德一团人，万一范部来一腰击，岂不是四军要全部覆没？

四军还很勇敢，也太乐观，经过几次会议之后，决意不守广州，决定不受东西的夹攻，打算全军向东江出击，等到打胜了陈真如和陈伯南之后，再回师打黄季宽。经过共党的事变，黄琪翔已不为四军所信任，把各军队重编之后，分作四个师，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许志锐，任了师长，而以缪培南为四军的军长，薛伯陵任副军长。当时计划是请李福林的第五军守广州，前哨放至三水，希望他把广西军队挡住一个或两个星期，东江之师自然可以从容灭敌，而且可以从容回师救援。

中央银行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不可留以资敌。第四军发了两个月饷，第五军也发了两个月饷，还剩下五十万元的现银，拿到沙面汇丰银行汇给蒋先生，作总司令复职的军费，以表示汪蒋合作之意。这样广州还不是在唱空城计，因为还有第五军留守后方，他们既有一军的实力，大可以抵抗黄季宽的军队。

但计划都不能当如意算盘的，第五军的战斗力本就很差，而且李福林先生是一个老实人，心想保存他辛苦经营的第五军，遂自动辞职，而找邓彦华先生继任。邓先生原本和任潮有相当深切关系的，拿了这个第五军，他那里肯抵抗黄季宽，就是李福林先生的本人，也不见得要抵抗广西军队。

四军最后部队刚离广州第四天，广西部队已到三水，第五军见广西军队到达，一撤便直撤到西南。广州是不可以再留的，向华和我仅在广西部队到达广州的头一天，乘了谭礼庭先生的煤炭船，连夜往香港。我和向华是在十二月二十二夜

到香港的，在那里足足住了一个多月，为的是等第四军在东江的捷报。但　西的部队也很迅速，到了广州之后，一刻不停便往东追。四军在东江打了两次胜仗，一次几乎捉获了蔡廷锴，但在前的大敌未除，广西部队已从后追到。这样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四军支持了几天，迫得依照蒋先生的原议，往江西撤退，还幸朱益之和我们有交谊的，对于四军粮秣给养，还尽力维持，在江西休养些时，便调往江北，参加第二度北伐战役，进攻山东了。

回广州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往上海罢。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先向华往上海，而广州则大吹大擂，还替我们立一个共祸纪念碑，说这次共祸是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党，焚杀广州，这一座丰碑直至广州非常会议之时，为着欢迎汪先生上省，才连夜拔去。

至上海以后，知道我们汇蒋先生的五十万元，汇丰银行并没有汇去，大约李任潮回粤已和汇丰银行商好，把这笔款扣留。英国人这样做法，当然示好于粤，是为后来港粤交欢的张本。但最使我吃惊的，广州驱李之役，蒋先生是一个有力的主动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粤打我们时，蒋先生又给了他三十万元作打倒我们的军费。唉！蒋先生太聪明，太现实了，你为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评，但政治道德毕竟是这样的吗？

驱李之役还有点尾声，就是事后薛伯陵对于张向华异常不满。四军参加第二度北伐成功之后，许多将领都由前方请假回至上海玩，我一夜在东亚酒店碰见了他们，室内烟雾熏腾，人声喧杂，我跑到阳台，倚着铁栏看看马路上的人海，望着

天空的星河，吸些新空气。

“我和你都上当了。”背后忽然有人对我说。

“怎么说？”我回首见薛伯陵站在我的身后，他不知何时踱出了阳台。

“向华回粤时对我说，他有三个师的实力，我出发东江时，才发现他的三个师非常残破，合起他的三个师还没有我新二师那么多枪枝。倘我早知如此，也不跟着他们瞎干。”伯陵表示他的懊悔，很怨恨向华。

“那也不必再提了，向华一生就不肯说老实话！”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对于此事绝不后悔的，要不干早就不干，既干了那又何苦去追悔。末后在民十七我和向华同住在上海时，中间经邹敏初的介绍，朱步云先和李任潮见面，张向华继之，他们是否言归于好，我不得而知，但我有我的立场，始终不肯和任潮见面，等到他自汤山释放出来之时，才在南京的会场上相见。

呵！邹敏初先生可以作他们晤面的介绍人，我又明白了邹敏初不止和向华他们有经济的关系，他和任潮也有经济的关系，当日冯祝万先生对我批评邹敏初，实在只告诉我一半的事实。

第 八 章

《革命评论》时代

《革命评论》的确是一个革命低潮时涌起巨浪的一个刊物，但我初到上海之时，我始终没有这个大计划，今日事后回想，那也不过是偶然的一回事罢。

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我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三月二十之变，本来不必走的，汪先生走了。五中全会的时候，实在汪先生也不必走的，他也走了。我既然不喜欢汪先生走，我自己为什么要走？第二，人家以为一个留学生，一定欢喜往外国跑，然而我这一个留学生是特殊的，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斗士，要做斗士，当然要有好的斗场，放在中国现成一个最好的斗场，四方八面任我斗，为什么要畏畏缩缩的跑到外国？第三，我的人生哲学和汪先生夫妇不同，汪先生夫妇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但我呢！以为汪先生这种见解，只能说是"有古大臣风"，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负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所以一次我和汪夫人辩论；我说："我的哲学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现在我往上海，明知也有危险的，可是我要实行"不合则打"的原则，择定上海为一个斗争的场所。第四，我从十四年回国之后，始终在军队生活，当代的人物，无法接触，上海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就为访求名师益

友起见，也应往上海一行。何况汪先生提出汪蒋合作的口号，我倒看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上海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心里很模糊。民六、民七、民九和民十，我都曾路经该地，但逗留最短是五六天，最长也不过两星期，我所得上海的印象，仅是《九尾龟》和《上海繁华梦》的描写。只是上海报纸总比广东办得好，因此人才必会比较的集中，这是我个人对于上海仅有的好幻想而已。

我初到上海之时，绝不希望办什么刊物，只想借人家酒杯，浇自己块磊。恰好在武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先生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唤做《贡献》，我无聊之极，遂在《贡献》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唤做《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同时在武汉分共时候，写过一本没有出版的小册子，唤做《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头一篇登在《贡献》，而第二篇却出了单行本。我万想不到，这两篇文章一出，倒哄动一时，虽然说不上洛阳纸贵那套肉麻话，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册。

清党以后，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一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又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中央党部把孙先生抬起来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他们也是怀疑的。尤其国民党的青年，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但分共之后而致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我这两篇文章一出，差不多京沪和各省都震动了。事后我翻开我的旧著，实在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方，只是肯就客观批评和建议，肯说老实话，除此之外，别无长处；然而就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肯说话而我胆敢说出来，

所以这两本小东西就哄动了全国。

为什么不办一个刊物？这是一般青年们向我质问的说法，也是当时所谓粤方委员商量的说法。但办刊物岂是一件容易事？头一件事便需要钱，而且说到办刊物，我真酸咸苦辣备尝之矣。中国开书店的老板照例是卖出刊物而不给你钱，就是给钱罢，一定要一年两节计算，在这一年两节中间，你就难得支撑，张罗补缀，也不容易。外国办杂志，所靠的是广告，中国商业还是停滞，而教育程度又那样低，发行不广，自然广告不值钱，这样亏本生意，又哪能继续。

"现在不是汪蒋合作吗？为什么不找宋子文商量？"这是粤方委员替我出的主意，而且他们也正在要办刊物。我们既同是粤方委员，为什么要分开办刊物？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原因，我和顾孟余商量之时，他主张作文章不署名，而我则以为不署名等于不负责。末后我们提出一个折衷办法，我办《革命评论》，所有文章都署名，他们办《前进》，文章署名与不署名随各人的自便。这个办法决定之后，我便找宋子文，他是为着汪蒋合作的缘故呢？还是为着鬼有所归则不为厉的宗旨呢？我不知道，但他是终于答应了。他答应每月补助我们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办《革命评论》，而一千五百元是办《前进》，其实他当时不允补助，我们也是一样办的，不过经费没有那样宽裕罢了。

办杂志也是要班底的，否则文章不容易继续，恰巧那时许德珩、施传统、刘侃元、萧淑宇，都聚在上海。许德珩是我北大的同学，施传统也是我的旧朋友，萧淑宇初从江西解去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东来，算是我一个旧属，而刘侃元则虽然新识不

久，却也谈得来。这样有班底，有经济，于是大吹大擂起来，头一期只印三千份，末后为着要求，更不断的翻版。

《革命评论》仅出了十八期便夭折了，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时间计算，只出了四个半月，为什么停版呢？容后再说。《革命评论》虽然说是风行一时，但实在最多每期只出一万五千册。不过确是震撼一时，不止中国各地受了影响，连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在华机关报《字林西报》还特地为着《革命评论》做了一篇头版的记载，说《革命评论》每期出版三万五千册，中国人看杂志，大概平均五个人看一份，这样看《革命评论》的青年总在十八万人左右。路透社更根据这个记载，打了一封长电到伦敦，伦敦的《泰晤士报》更郑重其事的登载，这样的风起云涌，南京感受极端的威胁了。

《革命评论》掀起了思想的巨潮，各地的刊物遂应运而起，只在上海就有声应气求的刊物十几二十种，真是洛山东崩，铜钟西应，慢慢各地因着思想的相同，遂发生自动的组织了。所以当时纵使没有别的意外，《革命评论》之寿也不会长，何况不久便发生三件大事。

那三件大事呢？第一件是五中全会要开会，我本来没有打算出席，因为有新闻记者来问，我随便答说要去南京。这种谈话本来不关宏旨，但惹起吴稚晖老先生大动肝火。吴老先生当时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定要单独找我对垒，以他老人家的地位，就要对付我，也大可以不必亲自出马。大约吴老先生以为他一发表文章，我必定要本敬老之旨，不会还拳，不过我当时实在还是少年气盛，正在没有好气时候，刚刚吴老先生找上门，我不禁搔着痒处，乐得试下身手。这样“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文章往来了好几个回合，毕竟吴老先生能忍耐，就此鸦雀无声，而让蒋先生出头。蒋先生也捉不住我的痛脚，只在报纸来一段谈话，说广州事变，我应该负责。这一段谈话自然意在排难解纷，但以我一个不知名之士而居然"摇笔国中"，到底非老先生们所能忍受，因此《革命评论》不得不短命。

第二件大事就是济南的事变，当《革命评论》出版至第二期，日本军队即攻济南，蒋先生连夜混出了城，我们军队直撤到韩庄的南面。本来这件事是无可批评的，但我当时实在痛恨黄郛。因为黄膺白表示，南京北伐，必要攻济南，日本田中或者要出兵山东，以阻北伐之路。所以北伐必须先要打通日本一条路，而打通日本又非他出马不可，这是他攫取外交部长的终南捷径。但黄膺白虽然做了外交部长，田中还要出兵，黄膺白说了大话不算数，在济南日军攻打城门之时，还在威胁之下，签字承认是由我方启衅。这种外交实在太丢脸了。《革命评论》焉可以不攻击？膺白先生是蒋先生的把兄，而又是蒋先生的亲信，我们的言论攻击政府已经是了不起，若攻击黄膺白更是了不起；这更使《革命评论》早日夭折了。

第三件大事不止使《革命评论》无疾而终，尤其促成汪蒋合作的破裂。五中全会开会不久，胡先生已动程由海外归来。胡先生之出国是在四中全会开会之后，同行的还有孙哲生多人，胡先生这次归来，蒋先生感觉十二分的恐怖。有一天宋子文先生打一个电话来：

"蒋先生今早由南京到上海，说立刻来看你，请你不要出门。"子文先生的声音很迫急。

"我去见蒋先生罢，我的地方太小。"我推辞着，因为蒋先

生那时每次来上海都约我在孔庸之家会面，而我的地方太隘，确不敢屈尊。

"蒋先生是必要来，就让他来好了。"子文已经挂起电话。

不一刻蒋先生果然和子文同来了，蒋先生照例问"你还好吗"之后，说：

"胡展堂就要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不过从报纸得些消息，还不知详细情形。"我莫名其妙。

"你觉得他回来会怎样？"蒋先生询问我的意见。

"我看也没有什么罢。"的确我看不出什么。

"唔！他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蒋先生突然的说。

"胡先生回来也不见得有办法，我看不用兵还是不用兵好……"我还摸不着头脑。

"你认识刘铁夫吗？"蒋先生又转过别一个题目。

"我认识他的。"我知道这和军事有关。

"那很好，请你下午三点钟到西摩路子文家里再谈。"蒋先生再闲谈了一阵便走了。

下午三点钟到西摩路，蒋先生让我坐在饭厅，那时刘峙也到了，我们只是四个人谈话。

"你立刻回去，把你的军队预备好，等命令。"蒋先生对刘经符说。

"是。"刘经符便起身辞退，大约他们已经在早上谈过话了。

"请你把刘铁夫找到，叫他秘密到天津塘沽把白健生的军

队抢过来。"蒋先生向我说，他知道塘沽的军队是唐孟潇的旧部。

"这样，我要通知唐孟潇不要？"我问，因为刘铁夫是孟潇的部将，似乎非通知孟潇不行。

"暂时不要告诉孟潇，你告诉铁夫，如果可以把健生捉住，便杀了他。"蒋先生有点紧张神气；"你们要赶快作宣传工作，所需经费多少，找子文商量罢了。"

我们又谈了一阵便散去，蒋先生当夜回南京，我回家打了一个电报给巴黎的汪先生，并且把上项消息告诉了孟余和励斋各位。然而聪明的胡先生这次回来倒不是为用兵而是上尊号的；他知道不能和蒋争，只想在南京分尝一脔的滋味。他在欧洲已起草了一个改革国府的方案，上设主席，而下设五院，藉名是实行建国大纲，而对于大纲所规定的条件，倒不注意它是否已成立。胡先生所要的仅是立法院，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这个方案是蒋先生所需要的，蒋胡既已合作，所谓动兵固然不成问题，蒋先生要表示示好于胡，自然对于《革命评论》要它立刻停版了。

《革命评论》和《前进》的补助费于无缘无故中突然中止，在蒋先生或宋先生的意思，以为两个刊物没有资源，一定要自动停版，然而这两个刊物决不会因为中止补助费就会停刊的。即以《革命评论》而言，每期销售一万五千本，每本卖价是一角，而批发是五分，如果能收足的话，每月也有三千多元，我们的基本执笔者只是每月支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似这样努力维持下去，实在毋须乎停版。

《革命评论》停止了补助费还在出版么？蒋先生有些气

了。于是由军警机关警告承印的印刷馆，如果再代我们印《革命评论》的话，一律封闭。更恐有人贪利秘密印刷，于是再来警告承销《革命评论》的书坊，见有卖《革命评论》的，便指挥流氓拿石块击坏书店的玻璃窗。你想书店的大玻璃窗每块都值十几二十元，而卖《革命评论》的利益，每本仅赚五分的微利，会打算和胆小的书店老板们，自然见着《革命评论》，都敬鬼神而远之，一律婉词谢绝了。我们见书店不肯代卖，又散发给马路的书摊，在南京指挥下的流氓，见摆有《革命评论》的书摊，逐一捣乱，把报贩和书贩大打一顿，这班可怜的书贩报贩，所得《革命评论》的余利，实在不够医药和养伤，于是对于我们也只好抱歉，避之则吉了。南京的手段还不止此，以政府的命令通告上海邮政局，扣留《革命评论》，这样，我们风行一时的周刊半本也寄不出上海以外。在这次雷厉风行的命令之下，只有一个人得到最大的利益，那就是上海市党部的厨子。因为那位厨子先生是管包饭的，他的消耗自然以煤柴为大宗，邮局把扣留的《革命评论》都抬到市党部，除极少数给党老爷无偿的过瘾之外，都由厨子拿去作煮饭之用，省却了一笔煤柴费。那位厨子先生是否对我私衷感激，不得而知，但在这次风潮动荡之中，他确实受其益的。

《革命评论》不能印，不能寄，不能卖，南京更来了一个利诱方法。一天宋子文先生找我谈话，说蒋先生希望我出洋。那时上海大概我已不能安居，而汪先生又来电叫我到巴黎跑一趟，商议今后的计划，我顺风扯帆答应宋子文，但我声明决不受蒋先生一个烂钱，如果宋先生以朋友资格助我旅费，我还接受。我迁延了两三个月，才于十八年一月二十四

日，乘一艘德国货船离上海，宋子文送来旅费二万元，他声明是他的钱而不是蒋的钱，他怎样开账，我不得而知，我写至此地，还禁不住向宋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

不过我似乎应该补一笔说说大陆大学。我自办《革命评论》之后，有许多青年都写信要求我办大学，这事使我很踌躇，办学我固然很愿意，但徒然开一所野鸡大学则与本怀大悖。末后禁不起大家的要求，又承李福林先生捐了一万五千元的开办费，才在戈登路租了一所房屋作校址。

当日在一般称颂大陆大学的，都叫它做革命大学，但我今日于此声明，那个大学并不是一个革命机关，而是一个学术团体。入学试验是非常严格的，入学之后的学科教授也非常认真的。我自信倘若能赓续办理下去，未尝不可以养育些人才，但大陆大学那时处境，真是在夹攻奋斗之中，在南京以为这个大学是一所反政府的机关，而共产党又想出全力破坏，不断对这个大学入寇。大学是要在教育部立案的，你想那时南京的教育部怎样肯承认大陆大学成立？然而奇怪得很，一般学生都不以大学不能立案为忧，倒为日孳孳，埋头研究学问。共产党也在我们大学里成立一个小组，意图破坏，有一次竟想放火焚烧大学，幸而事先防备得法，才防患于未然。在双十节的那天，大陆的学生很高兴的要成立一个庆祝会，借上海总商会地址的天后宫演戏。那天市政府和共产党一起象不谋而合的向我们进攻，公安局派了一个警官和许多暗探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发现了一张“改组国民党”的标语，强迫学生们撤除，并说不服命令，即停止集会。入夜共产党更派人散布反

对我们的传单，我知道那夜一定有事的，事前分派忠实的学生，分布要道，共产党正待动手暴动，我们立刻捉住了两个人，其余的因监视过严，也只好缩手知难而退。最奇怪的，我们捉了共产党，并且没收了许多传单，而看戏的来宾，倒一点不知，还兴高采烈的看戏，这真是办理得宜，我们教职员和学生们倒真“处置大事，一如平时”，其沉着迅速，的确似乎训练有素的。

我赴欧的途中，大陆大学便被封闭了。南京以大陆大学未曾立案为理由，照会租界当局封闭。我们大学的后任者王乐平先生是一个笃实人，他还请了一位外国律师打官司。但这位律师是什么人呢？是上海有名的费信惇先生，他就是工务局的主席，而最痛恶左派的。那时我已到巴黎，接到上海的电报，心内想：“这次真完了，请了费先生做律师，不是刚刚与虎谋皮吗？”果然费先生也认定这个大学是共产党机关，他也是律师，他也就是租界当局，这样大陆大学遂在无抵抗之下，关门大吉，而大陆大学为着打官司，还花了讼费三千余元。

说到此地，我还应该叙述几个患难的朋友。办《革命评论》和办大陆大学的同志们，真可以算是患难之交。许德珩、施传统、刘侃元和萧淑宇，都是我当时有声有色的班底。许施两个人的思想行动都相同，他们两位使我今天还不明白，他们都不肯做共产党（施传统加入了，后来也退出），也同时死也不敢反对共产党。在共产党捣乱大学未成的时候，我召集学生训话，批评共产党一顿，施先生死也不肯上台演讲，及至我大骂共产党，他倒变色先跑了。他们还有一种古怪的脾气，每天都要找我长谈，很象革命之成功在于“谈”，如果我没有工夫和他谈，或谈得很短，他们便怫然杜门不出，非行那三顾草

庐，不肯轻出隆中的样子。大概他们一定熟读《三国演义》，无形中以诸葛孔明自期，但我有何才何德，敢以刘备自况，唉，难道革命也要人时时请驾的吗？所以在我未离上海之时，倒有些意合而情不投了。侃元先生则我至今还惦着他，刘先生自然也是一个心志高傲，而且目空一切的人，但他的脾气倒很爽直，没有许先生他们那样难于招待。萧先生后来也离我而去，其中原因也有我对不起他的地方，也有他对我不起的地方。汪先生于十八年回国之时，曾说萧先生有些招摇而且太不守秘密，所以我不敢向汪先生极力推荐；而萧先生呢，在扩大会议之时，已有人告诉我，他时常在北平和南京孙哲生通讯，当中自然也有许多消息漏给南京的人们，果然扩大会议失败之后，萧先生得了孙哲生的资助赴德留学去了。及二十一年回国，萧先生来见我，初则要求实业部的司长，继则要我介绍他当立法委员。他当日委实来得太迟，实业部的司长没有空缺，而立法委员呢，我确实向覃代院长理鸣先生推荐过，而覃先生未允。末后我送他几百元作生活费，请他等等，他终于一气而走上海，恰当其时孙哲生卸任行政院长，没有好气，遂请萧先生替他办杂志，萧先生鼓其愤激之气，在第一二三期大骂我和汪先生，直至孙先生再回南京做了立法院长，萧先生也偿其所愿的做了立法委员，这才静默下去不再谩骂。这几位朋友，除了施传统以外，后来我都见过，我们还保持着友谊；后来许先生，刘先生，在北平教书之时，大约因为人民阵线关系，给宋哲元逮捕，我还尽了做朋友应尽之力，四面直接和间接去出力营救。这几位先生都是从《革命评论》战阵中打出来的，而末后不能共同做一番事业，这真使我惭愧而引以为

憾的。

…………

十六年底，我离上海之前，改组同志会已宣告成立。改组同志会为什么会组织呢？这也是在我计划以外的。我在前文不是说各地因着思想相同，遂发生自动的组织吗？其原因是在清党以后，中央慢慢开倒车，政府为着稳定政局起见，一面和帝国主义妥协，一面更和军阀妥协。国民党的政纲不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吗？因此党内的青年感觉无限的右倾，国民革命恐怕就要崩溃。而且在反共之时，各地国民党的青年已成立不少组织，例如丁维汾先生领导下的反共大同盟，萧忠贞领导下的实践社，童冠贤领导下的新中会，他们一方面要反共，而一方面要防止右倾。不过他们仅有行动，而没有理论，各地的青年都在徘徊瞻顾罢了。

《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改组同志会实在没有什么，在当日发起之时，理论既不统一，组织又不健全。为什么理论不统一呢？《革命评论》和《前进》之分办，其起因本来很微，只是为着文章署名和不署名的关系。可是到了后来，理论真显然不同，在《革命评论》的主张着重于民生革命，而在《前进》的主张则着重于民主政治。在

改组同志会成立前夕，我和孟余辩论了一大场，我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而孟余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因为这样，他最不赞成我农工小资产阶级之说。此事又经过王法勤、王乐平和潘云超的调停，才电巴黎汪先生请示，把小资产阶级的名词改了一个“小市民”。汪先生在他的心中也反对小资产阶级一个名词的，一次他对我引用吴稚晖先生的批评，说“小资产阶级的小，不知是卵子小，还是肾囊小”，所以改组同志会的理论，自始就没有统一。至说到组织不健全，则在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时已没有方法选举执行委员，经过几次讨论，到底还是以粤方委员为中央，竟直没有选出一个青年之士。这个办法算是一个不得已的调停，但粤方委员到底没有几个人！王励斋先生老了，满腔热诚而少方法。朱霁青先生人是勇敢，只是不善于远虑深思；潘云超先生是长于批评，同时也短于建设。这样剩下来只有一个王乐平，王先生毕竟是一个行动人，办法有时过于粗率，而措施又往往近乎矛盾。我是要去欧洲了，孟余先生说明他身弱多病，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而不是一个司 官。改组同志会之组织如此，别人当时或者还很乐观，而我则自知甚明，预料前途黯淡。只是事已如此，也只好拼命干去，徐图改善而已。

改组同志会刚在成立，南京早得报告了。平津既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蒋先生立刻到北平。大概当时国民党的青年都以为蒋先生是开倒车的领袖罢，蒋先生初到平津之时，没有一个欢迎的口号，也没有一张欢迎的标语，并且平津党部也没有人整队到车站恭迎如仪。蒋先生实在气极了，以为改组

同志会在干他了，于是在北平的一次大演讲中大骂改组派，为避免骂汪先生起见，说改组派是汪先生不知道的，通是顾孟余和陈公博干的。蒋先生这一骂不要紧，倒把改组派骂得抬起头来。从前人们都不知有改组派，现在天下全知了，不满意于南京的人们通集中于改组派的旗下了，改组派的名词便由此而生，以后掀起几年来中国的战祸，皆基于蒋先生的一骂。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两日，萧淑宇先生赶来见我，劝我暂时再观变，因为他的同乡熊天翼先生知道蒋先生将于三全大会前后打桂系。熊天翼先生是上海的警备司令，又是蒋先生的亲信人，他的消息是不会假的，而且熊先生正在献议蒋先生劝他挽留我不必出国。

萧先生固然傻，熊先生也是傻，蒋先生除非不打桂系则已，要打桂系，反正要排除汪先生。因为桂系的大本营还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勷勤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因此倒桂必须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须要排汪，其中微妙的消息，并非熊萧两先生所能体会的。我对于萧先生的报告，一点也不动摇，只按着原来步骤，于十八年一月廿四日离沪。这是《革命评论》时代一个划一的段落，也是我第二次流浪生活的开始。

第九章

护党救国军

我离上海赴巴黎之前，蒋先生一面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一面却积极筹备打桂系。他打不打桂系，我们倒不很注意；不过改组同志会也有些短视的人们，以为蒋先生打桂系，我们或者会有出路，最少可以喘一口气，因为桂系给我们的压迫太甚了。我当时认识很清，桂系只有地方的力量，而没有控制中央的力量，而且只有军事的行动，没有政治的背景，我们受桂系压迫，虽然很讨厌，但我们若受南京的压迫，则更是无法抬头。

我们为什么注意三全大会而不注意桂系呢？那时三全大会，蒋先生决定用高压手段，所有代表都由南京一手指派而不采用选举制，后来我分析三全大会的代表，指派者占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我曾著了一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价值的估量》，纯粹站在客观去批评，也纯粹就事实来分析，这个大会实在算不得什么代表大会，只配说蒋先生个人的御用会议。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的精神可以算寿终正寝，终蒋先生之世，也没法把党弄健全。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我以为要把中国弄得好，先须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的党，国民党的忧乐须变为全国国民的忧乐，国民党的休戚，也须使它变为全国民的休戚。我们如果要达

到这个目的，须使有志和有识之士都加入了国民党，共同奋斗。如果代表是指派的，则南京所欢喜的人才有被派的资格，南京所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被排斥。这所谓凭一己之好恶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从前帝皇时候，单凭着一己喜怒以治天下，还有亡国之忧，何况民国成立，民智已渐开明；又何况国民经几次反专制的奋斗，若果代表不采选举方法，有志和有识之士怎肯参加，所以这次大会光是指派代表，实是软性和慢性亡党一个方法。国民党倘若不是执政的党，与民生国计无关，谁也不去措意，但国民党是一个当时专政的党，这样独裁武断，必使中国再复陷入专制时期，我们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真是非常忧虑和惶惑的。

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指派，那各地党部当然更是指派了。各地党部的作用，是跑人民众的核心，指导人民，辅翼政府，如果党部是选举的，则负党的责任的，第一要顾到民众的利益，否则地方的感情和人望失坠，他必不能当选。第二要顾到党员的意见，必定他自己比其他党员努力，比其他党员活动，才有当选的希望。倘若指派，则负党部责任的只顾到中央个人的好恶，不复顾虑到党员，至于人民利益，更非他们所屑措意了。由此类推，中央委员只顾揣摩蒋先生的好恶，不必需要对党对国的忠诚，而地方党部又只顾揣摩和逢迎蒋先生和他亲信的意旨，不必浪费时间来体察人民的利益！这所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整个党的前途，遂决意反对这个非法的三全大会。

我离上海之后，还在赴欧的途中，蒋先生知道我们反对，派邵力子先生来上海见王励斋先生，要求我们维持缄默态

度，而提供保证说可以令我们当选为三届的中委。然而联任中委仅是个人的利益，而维持国民党的法纪倒是我们责任和义务。上海的所谓粤方委员，对于蒋先生给我们的交易，毫不动摇，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终于在京沪大发传单，公开反对，因此博得这次的所谓三全大会通过决议，一警告汪先生，二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三永远开除甘乃光和我两人的党籍。其实开除我的党籍是应该的，差不多反对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个人煽起飓风，但开除甘乃光先生却未免过于冤枉，我私下替他抱不值。甘乃光既不是一个改组派，更于国内的煽动无关，自从广州复陷于李任潮之手，甘乃光已遨游海外，对于我们的举动，毫不知情，大概南京还根据着十四年广州时候"甘陈相提并论"的往事，胡先生极力主张来这个无证据的缺席裁判罢了。

我是于民国十七年三月一日至法国的马赛的，汪先生派了曾仲鸣先生至马赛接我，并且告诉我一件新闻消息，说接到国内电讯，李任潮被骗至南京，给蒋先生幽禁在汤山。去上海请李先生人京的是吴稚晖先生，因此吴先生为着营救无方，觉得有负朋友，在蒋先生面前，自己碰壁而死。国内的内战爆发是我所预期，但吴先生自尽倒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看吴先生的文章，在纸上活灵活现显出一副嘻笑面皮，以惯于嘻笑之人而忽有慷慨轻生之事，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上海虽然和吴先生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但我对吴先生老当益壮的勇气，倒是诚心诚意的佩服。我听见吴先生自尽，不禁长叹一声，非常痛悼。

巴黎终于第二日早上到了，这次算是我第二次的重游，风

景不殊，河山无恙，下午见了汪先生夫妇之后，我倒想在法国作一个一两年寓公之计。那时我住在城里，而汪先生却住在乡村，一星期中，我们也不过见一两次面。那时法国的改组同志会分会经已成立，人选是由汪先生打电报至上海总部介绍的，当中的委员我只认识龙膺兴和颜继金两人，他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是邹海滨指定出洋留学，而俟我接任之后，才正式遣派的。汪先生又打电至柏林约王东丞到法国和我相会；王东丞先生是我素识，他在广州原任党军第二师，后来蒋先生说他勾结共产党，一朝便把他扣留起来，硬送他三千元，迫他即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后来汪先生至海外，蒋先生曾给汪先生一封信，说汪先生不合勾结了王东丞倒他。这个罪案当然也是三月二十之变以前的整套戏法，同一为蒋先生神经过敏的举动。我们相见之后，知道东丞到过莫斯科，到了柏林也将近两年，现在正研究军事学，他已由一个豪悍的军人，变为恬静的研究者了。

我居住巴黎一个月，自然无事游游凡尔赛宫和枫兴旧露宫，间中逛逛鲁佛博物院，欣赏历代有名画家的杰作。至到四月为着英国工党竞争选举，又到了一次伦敦，那时麦当奴正往乡村演说，我只和几个工党当事人交换些意见，据他们说依着新选举法，有一百多万的妇女做了新投票人，这班妇女是否同情工党，绝无把握。他们的确有些悲观，焉知那就是工党第一次登台的机运呢？我只住居伦敦两星期，又重回巴黎，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作比较久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久居外国。怎么

以你这样年轻的人也打算长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

"不长住又怎么办？"我实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

"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

"你怎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的！"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样干，真一点把握也没有。

"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的保证。

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动程，我遂于五月十二离马赛归国。

那时我们已陆续接到报告，李任潮先生的确已囚在汤山，而吴稚晖先生的确并未有死，而且根本没有试过要死那回事。为着三全大会开会，李任潮先生由广东赶到南京，一至上海已知大事不好，逗留不进。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几位老先生苦劝他入京，李任潮不允，吴先生甚至下跪痛哭，以他的老命担保。任潮对于蒋先生是不相信的，但他却相信这几位老先生，一至南京，蒋先生遂立即送他至汤山的温泉俱乐部安置。任潮至此也只好天天下围棋，高吟古诗"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的名句了。任潮被囚，广东陈真如和陈伯南，宣言

归命中央，唐孟潇秘密上天津，号召旧部，一下便夺了塘沽李鹤龄的军队，白健生只身由天津脱逃至香港。张向华为朱益之推荐，起用任为进攻武汉的江右岸的左翼总指挥。广西旧将俞作柏运动了他的表弟李明瑞（那时李任桂军的旅长，受胡宗铎指挥，开赴前线抵御南京西征的部队），倒戈相应，武汉的桂系部遂不战而溃，而且俞作柏已奉命带着李明瑞回广西作他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却由旅长一跃而为总指挥，至此长江流域的桂系算是完全崩溃了。

桂系自然是崩溃，而护党救国的运动也非常悲观，因为我们内在的矛盾，充塞于每个人利害之间。第一是汪先生始终站在改组同志会范围以外；大概他受了别人的贡献，说与其做改组同志会的领袖，不如做全党甚或全国的领袖，所以对外发表谈话，说他对于改组同志会是同情的，但他本人不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汪先生既然不是改组派，那么张向华他们自然不加入这个无领袖的同志会了，因之汪先生底下，形成了三派，一派是改组派，那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一派是汪派，那是他左右的亲信；一派是左派，那是信奉汪先生的主张，而不属于以上两者的。这三派的分野虽然大方明了，内部却着实有些倾轧的痕迹。第二是信奉汪先生主张的，各有利害的不同，在文人一方面，只求达到推倒南京和恢复法统的目的，什么也不计，此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在军人则各有本身的利害不同，唐孟潇所要的是抓回白健生夺去他的队伍，张向华所要的是希望早日回至第四军，至俞作柏更是和李白黄有不解的宿仇，他们以为三全大会固然是非法，但无妨先倒桂系，后谈法统。第三是上海总部的老先生太

迁就事实，他们看看有些把握不住军人，也只好由他们自由发展，不只唐张不服商量，连改组会的下层也分途干自己的买卖。其最著的，广东黄鸣一、阮若梅等专跟俞作柏走，而且还替蒋先生秘密送信和送款至李明瑞的军中。这样一来，桂系固然是倒，而改组同志会的步骤也同时起了混乱，实在不必等汪先生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解散，改组同志会的精神早就消灭了。

我到达香港已是六月下旬，余恺湛来报告，说俞作柏已回至广西任主席，他们和俞作柏由上海回来时，同船的还有薛伯陵和李朗如，在上海动兵之先，唐孟潇、张向华、俞作柏都曾和总部接过头，说等他们覆灭桂系之后，大家立刻都反蒋。后来俞作柏的军队至广州，薛李两人劝他乘机占广东，俞作柏不肯答应，及俞作柏回至梧州，他们又劝他宣布独立，俞作柏也犹豫，他的借口是要在广西整顿军队，等到实力充足以后，再行反蒋。我只好苦笑一下，上海总部的先生们也太老实了。其实我们的军人起始就不应帮蒋先生打桂系，桂系覆灭，蒋力必增，这个各个击破的形势已在那时形成，但怎样办呢？我们就不声讨南京的非法会议吗？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的势了。

上海总部的主张，要成立护党救国军，说冯焕章和阎百川都有代表和我们接头，其余石友三、方振武、何芸樵，都有向义的表示，北方及长江中部已没有多大顾虑，只等着南方首先发难罢了。各方的表示，以为张向华是汪先生嫡系部队，须要张向华先动，然后各方才可放心响应。华北华中既已有总部主持，他们留我在香港策动华南的军事。这个计划，我详细电告汪先生，并请他立刻归国主持，因他若徘徊海外，终难得一个

有力的号召。汪先生复电他已准备动程，对于计划也分别认可。我得了汪先生的复电，遂打了三个电报，一个给孟潇，一个给益之，一个给向华，请他们发动，并且告诉他们广西已准备独立。

桂系失败的将领那时都避居在香港，李德邻、黄季宽、胡今予、陶子今、徐赓陶、邓益能、夏煦苍差不多全体都在那里作寓公，只有一个白健生还是蛰居安南的河内。汪先生在巴黎时，由王东丞的介绍，本来已和桂系的张伯璇有联络，桂系失败之后，遂反蒋而拥汪。不幸我们的矛盾已经没有方法消弭，而他们本身的矛盾又来，他们对于反蒋是自然十二分的赞同，但帮助俞作柏反蒋，倒是旧恨新仇堆积在一起，无从疏解。当中李德邻还比较大方，而白健生和黄季宽则对于俞作柏，很有死不两立之势。我们无论如何谈下去，均不得要领，这个反蒋阵线，始终为着个人的利害和恩怨，不能统一。

我到香港的消息不久传至南京，因为离法国马赛之时，那里的中国领事馆已报告外交部。我发给朱益之他们的电报，慢慢也泄漏了。朱益之先生为着明哲保身起见，据说已把我的电报呈明蒋先生，唐张虽没有把我的电报公开，却也被蒋先生所刺探。一天蒋先生故意询及孟潇和汪先生的关系，聪明的唐孟潇叹一口气说："我真没有办法，汪先生只信顾孟余和陈公博两人。"这句不即不离说话，倒使蒋先生相信唐孟潇不至作反。蒋先生倒知道孟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和汪先生究竟没有深长的历史。至蒋先生对向华那就比较凶得多了，向华在南京回至宜昌防地之时，去见蒋先生。

"公博回来了，你知道吗？"蒋先生很严厉。

“是，我知道的。”向华不敢隐瞒，实在也不能隐瞒。

“他有给你信没有？”

“有。”

“说什么话？”

“他说要做生意。”向华到底不善于辞令。

“我告诉你，公博是没有办法的。公博就使到了南京也没有办法。如果他有办法，我是忘八蛋。”蒋先生立刻沉下脸来，这时恐怕他是太急了，所以他已忘记了他的尊严，说出市井的粗语。

向华后来一句一句告诉我，倒使我笑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蒋先生那样不能自制，这样真使他太苦了。那位向华先生当时实在不想动的，临去宜昌之前，派他的内亲官先生来见我，说向华已不想打内战。但向华不动，我们就不干吗？我们先专心致志于广西的发动再说。

当时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广西未发动而先告失败。事实是这样，俞作柏先生自命左倾，谁知一倾便倾至共产党。他回南宁之后，左右都布满共产党徒，而且他还想掌握兵权，又和他的亲戚李明瑞各争队伍。在香港之时，我和薛伯陵商量，打算我们两个人一同入广西，但后来上海总部不赞成我轻离香港，所以只由伯陵先去。伯陵一至南宁，便感觉俞先生靠不住，那时南京也深悉俞先生的举动，一下便任命了广西的师长吕焕炎做广西主席，来颠覆俞先生。梧州是人吕焕炎的手内了，就是俞先生的外甥黄权师长也把握不住了，至是俞先生旗还未举，而身先下野。伯陵没有办法，又从广西跑回来，一肚子牢骚，只有找我发脾气。

"俞作柏和共产党勾通,你知道吗?"伯陵气急败坏的。

"怎么说?"我也着急。

"我到南宁,他左右都是共产党徒。住在我隔壁房间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伯陵申诉着。

"你是和他同在上海会议的,而回来也是和他同船南归的,怎样你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反诘问。

"总之,我们上当罢了,猛野,我们以后什么事都要慎重和考虑才好。"伯陵很忧郁的辞去,猛野是当时我的浑名,在广东土语是"厉害的家伙"的意思。

"失败是革命者常干的事,我们总不要灰心。"我只好安慰伯陵,其 当时也入了悲观的状态。

广西刚失败,张向华在宜昌发动了。向华前此不愿发动的消息,由他的亲戚官先生带来,不止带给我,而且带给薛伯陵,四军官佐留在香港的,都不满意,对于向华批评和詈骂。现在张向华倒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发动,到底为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是出于故意或是出于偶然,蒋先生突然的命令张向华的军队由宜昌调驻山东的德州,并且派福建军队曹万顺一师来接防。向华以为蒋先生这个命令,是要解决第四军,因为四军由宜昌调德州是要经南京对岸的浦口的,这样分批运输,也容易分批缴械。张向华一个人也不通知,俟曹万顺的军队到宜昌,迅雷不及掩耳的给他全体缴械,立即渡河跟着湘西的路线撤向广西。这时官先生又来香港了,说向华已经发动,兵力共有八团人,要我们筹款接济,并要求向广西先容,和指定驻兵的地点。张向华既有八团兵力为什么不溯江而下占夺武汉,却迂回这条长路到广西?我有点不明白,但同时又不得

不设法接济。

俞作柏既靠不住，恃之反蒋固不可能，恃之收拾广西也不可得，于是我和德邻、季宽商议，请他们绕安南迂道入广西，或者收拾残余，可以响应向华，也可以合力以图两广。德邻、季宽赞成这个提议，实在他们也正在运动广西的军队，于是他们便秘密离开香港了。

十月上旬汪先生已自法国回至香港，我真象"如释重负"，以后诸事都可秉承汪先生的意旨，可以不必单独负责。那时我们只有急忙的筹款，至于华中和华北自有上海总部主持。上海总部是时非常活跃，所有反对南京的皆集中上海，而各省省党部之不赞成指派代表的也举出代表成立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指挥军事的有军事委员会，办理党务的有联合办事处，此外更有两家日报，一家由陈孚木等主持，一家由彭学沛、梅恕曾、陈言、杨全宇、李心辉诸人主持，很是旗鼓鲜明，有声有色。各路的护党救国军也发了委任状，自第三路以下的总司令，有唐孟潇、李德邻、张向华、胡今予、石友三诸人，连何芸樵和好几省的军长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受了委任。至于第一路和第二路的总司令当时未曾发表，为的是留给冯焕章和阎百川，一时声势浩大，俨有气若河岳之势。

张桂军会合之后便计划再攻广州。我没有回至香港之前，李任潮被囚，李德邻即偷出了上海回至香港，更上广州找师长而兼公安局长的邓益能，想联同两广宣布独立。然而陈真如和陈伯南都反李了，李任潮的师长徐景陶和邓益能也被免职了，李德邻只有逃香港，而叫黄季宽起兵打广州。季宽也是动了兵，但据德邻对我说，广西实未倾师而出，所以后来广

西军队吃了大败，并且一个师长黄应榆也做了俘虏。这时张桂军会合，鉴于前次失败，广西的军队几乎全体动员，殆以为占据广州是指顾间的事了。

蒋先生知道张桂军必会攻广州的，命令朱绍良和毛炳文两师援粤。以兵量而论，张桂军实敌不过广州之数，但大家所靠的是质，而广西又是哀兵，当张桂军合攻广州之时，大家颇具有必得之志。张桂军由梧州浩浩荡荡出发，兵威所至，一路无阻，陈伯南则凭据德国顾问所做的工事，内线作战。张桂军兵力单薄，又是久疲之师，围困了几天，已占了白云山脚下的龙眼洞，终为陈真如的摩托车队所攻破，东面的张向华支持不住，西面的李黄军队只作撤围，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乘胜追击，后来一直侵入了广西，辗转苦斗了大半年，等到胡汉民先生被蒋先生囚禁汤山，广州开非常会议，张桂两军才得苏息。

张桂两军正在苦斗广州，唐孟潇也正和冯焕章艰苦作战。其时蒋先生为着打冯，曾把唐孟潇的军队移驻郑州，本来大家约定一气发动的，冯先生是出兵潼关了，而唐先生反在那里拼命抵抗。当时我们实在非常焦急，冯先生派在上海的代表天天来总部质问，唐先生反而消息寂然。末后孟潇派他的代表邓寿荃先生来港，说明孟潇拒冯的原因，谓他的前敌总指挥宋哲元先生欺人太甚，就是布告上宋哲元三个字也大过巴斗，似此非把冯军打退，不能反蒋。这个理由确是妙不可言，但当时又有什么办法？恰恰蒋先生又命令石友三援粤，石友三军队一至浦口即改扮护党救国军，但石先生也是妙人，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据长江，只在浦口大掠一阵，便扣了许多火车，撤兵北据徐州，和韩复榘连在一起。

唐孟潇毕竟把冯焕章打退了，他见石友三也起了义，赶快集中军队直下武汉，可是先头部队刚抵武胜关，便给何敬之挡住。而他自己呢，在后方毫无准备，直给杨虎城一夜袭了营，孟潇仅以身免，间道从旱路偷过济南，直至天津，转道至香港，他的军队便全体给陈诚解了甲。自此护党救国军便烟消云散，另外开了一页北平扩大会议的新史。

在我们失败之中，还夹着一段痛史，王乐平先生在沪被刺身死，同难的还有潘学吟同志，这是蒋先生叫杨虎他们干的。至民国廿二年才由我们正式公葬于山东的千佛山，但公葬又何补于他的惨死！

张桂军的失败，使我失眠了十几夜，我并不痛心于军事上的失败，因为革命者的失败，是革命史常有的事，而使我最关心的，是不是我的观察完全错误，而对于革命的低潮应该如何才能补救。

第一，这次张桂军之合攻广州，在我们的想象，并不是为着割据，也并不是为着私仇。南京的三全大会明明是违法，而国民党人似乎除了少数人之外，毫不注意。而且张桂军由动员以至进攻，我们绝不见民众起来，所有农、工和小资产阶级，都袖手旁观，绝不参加一些运动。他们并不是不帮助我们而去帮助了南京，他们对于南京和我们两方面都一样的冷淡。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已脱离了民众们，至于党的违法与否都是党内的事，与他们绝不相干，这样对于国民党的本身，我们应该重新检讨一下，绝不能单靠几条空虚纲领就可以号召天下。

第二，自从党的一分一合，已使许多人们冷淡和灰心，尤

其拥着国民党籍的军人，他们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恤党的法统，其新入党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历史的也渐渐归还本性。谭组安先生本是一个看得透而又是大澈大悟的人，在宁汉分裂之后，遇有会议都在席上打瞌睡，组安如此，其他可知。所以宁汉一复合，谭组安和程颂云就想夺回湖南的地盘，而张向华也想以广东为他战功的酬庸地。即如此次护党军兴，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即以广西而论罢，俞作柏本来可以不必回广西，当他的军队初抵广州，即可起而占领，把广西让回李白，这样南方也可以成一个局面；然而俞作柏为报个人的私怨，又舍不得广西的地盘，而李白更触起他们的旧仇新恨，非推翻俞作柏和拿回他们的根据地不可。至于俞作柏与共产党勾结又是另一问题，就使他不和共党勾结，他也不能一方面安然奄有广西，而一方面更进图广东的。

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入于地方军阀政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然而这种军人的地方割据观念，蒋先生也于北伐时期就养成，广西和湖南是整个来归的，自然一时谈不上军民分治，但长江几省是北伐军力役夺取的，除湖北由我们力争才任命

一个无兵的老军人孔庚做主席，此外江西给了朱益之，安徽给了陈调元，江苏于宁汉未分之时也给了程颂云，这都是养成军人盘据地方之渐。我和朱益之当日也算是一个知交的朋友，但他被任江西主席，我就反对。但蒋先生以为江西实在找不出一个适当的文人，我虽然极力陈说，但蒋先生有他的成见，我说了两次也就罢了。

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大约人心厌乱，中国应该来一个比较长治久安之局罢。但要长治久安，必得与帝国主义者和旧势力妥洽，这个看法徘徊于我脑中，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遂患着失眠；以后虽然上了北平，参加了扩大会议，但已鼓不起兴味，亦只有聊尽人事，以待天命而已。

第 十 章

北平扩大会议

在张桂军还没有失败之时，胡今予先生已自告奋勇，往天津住居。他的目的是想拿天津作一个运动北方的总把；一面联络阎百川先生的部属，一面和深入阎先生内里工作的潘宜之先生相呼应。阎百川要动了，阎百川要动了，这个消息，时时都传到了南方。但消息即管传来，而行动却毫无踪影。冯焕章是失败了，张桂军是失败了，唐孟潇是失败了，石友三是失败了，果然阎先生踌躇满志，真要动了。

胡今予先生从天津打电报来，说阎先生真要发动，请汪先

生派一个代表到北方，汪先生考虑了几天，终于派王励斋先生和我两个人做代表北上。王先生是北方人，和北方的将领很熟，那时他还在上海总部负责，汪先生打电报请他径往天津和我会合，我即于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赴日本的香港长崎直航船赴日，绕道门司赴天津。

我们到了天津即住在胡今予先生家内，在天津见过阎先生部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那是北伐时守涿州的名将，三天之后，便和励斋往北平。我们在平又会过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师长王靖国和市长张荫梧，但仅仅两天，我们便又趁早车回天津了。事实是这样，阎先生或者已下了反蒋的决心，然而他还有不少的顾虑。其一，冯焕章那时已久居太原，他因为军事失败，遂下决心单身入晋作说客，他和阎先生会于介休之后，阎先生请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备，形同软禁。冯先生虽然屡次表示服从阎先生的指挥，但冯先生在阎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他的部将也是不容易指挥的，这样随便发动，是不是会上当？其二，表示服从阎先生的还有石友三和孙殿英诸人，石友三曾反过冯先生又最近反过蒋先生，而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宝皇陵的英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先生所易驾驭。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侧面最容易受威胁的是东四省的张汉卿，这个东面的外交办不好，殆未易在中原争霸。其四，阎先生的不稳消息传出以后，南京曾托许多人调停，最主和平的要算阎先生的老朋友赵戴文，阎先生的踌躇不决，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种顾虑，阎先生表现于外边的态度自然是模糊了。

我们刚到北平的第二夜，社会局长梁上栋来见，梁先生是

山西人，是王励斋的老友，也是改组同志之一，他说阎先生还未下决心，山西万不能随便去。梁先生不说，我们也是观察不定，何况梁先生是山西人，他这一说，遂使励斋先生摇动了。我们既然不去太原，实在没有理由久居北平，因是到达北平的第三早，便大家又返天津等消息。我为什么写这一段来去匆匆的小史？因为证明阎先生起初就举棋不定，而使归附者离心，及后兵骄将悍，使阎先生难于指挥，都在起初的时候，给他们看透了阎先生的弱点。

在天津又住了个多月，冯先生算是释放出来，回至本军了，徐永昌并且不做河北主席，将要任为前敌副总指挥了，潘宜之不断有电来催励斋和我两个人到太原了，这样大概一定要发动了罢，我和励斋再赴北平，转道平汉铁路，沿石家庄入晋。

山西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次借着见阎百川先生之便！还是第一次一览表里山河之胜。正太路困难的工程，娘子关的雄峻姿势，一一都收入眼底。我对于山西事前没有什么印象，有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东方杂志》读了一篇《阎百川先生的佣民政策》。据我推想，山西是百废俱举的，然而确是守旧而进步很慢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印象。但登车之后使我吃了一惊，那是车厢中男女分座。这种男女界限的划分，在火车里头，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到了太原，我还问了一个山西朋友，据说男女的划分还不是当局之意，只是相沿已久，也无人提过异议，有时女厢人满，妇女迫得离座到男厢，她们反觉得不自然，所以也听其维持自古已然的习惯罢了。但无论如何解释，使我感觉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

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二十年。男女界限的划分，不止在火车，即在戏院和电影院里，也像一条鸿沟，彼此不能侵越，可是在大街上倒有许多青年男女骈肩同行，这种矛盾我想不止在山西，大概边省都有这些现象罢。

车过阳泉以后，倒看见山西境内土地辟和田野治的好景象。大概山西二十年来未受兵燹，老百姓倒能乐业安居，只是在车上有朋友告诉我，山西白面很流行，旁至行伍里的士兵，深到家庭里的妇女，很多有海洛英等毒物的嗜好。阎百川先生为什么容许这些恶习流行呢？这一点我至今还不了解。自然有人说这或者省政府因收入的关系，所以纵容他们胡为，可是海洛英是私运而非公卖，省政府的收入倒是有限的很罢！

我们到达太原已在下午，到车站接我们的有无数的熟人。在汉口很相熟的孔雯轩，到过江西的赵芷青和胡经武，在广州就已认识的潘宜之，此外留于太原的河北主席徐次辰，调主山西主席的商启予，都挤挤拥拥在车站。我们刚到山西大饭店，阎百川先生已来会，我们和阎先生谈了一个多钟头，阎先生倒虚怀若谷，每事下问。我对于阎先生的贡献，是于就要快，因为缓了，在军事难得占上风，在政治容易灰了海内的热望。从这一席话中，我感觉阎先生优于考虑，缓于判断，只长于静如处女，而短于奔如脱兔。我当时很感觉到这次会战恐怕还是失败多而成功少，只是那时形势大有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罢了。

在太原一住就二十多天，我对于阎先生已没有多大献议，因为我这人有什么话一天就说完，并不会吞吞吐吐逢人只说三分话。这二十多天我最感烦闷的是和谢慧生、邹海滨两先生讨论党的问题。那时所谓西山会议人数已并不多，剩下的台

柱要算居觉生、谢慧生和邹海滨，其次要算覃理鸣和傅沐波。居觉生因为在上海运动熊天翼，中了熊先生鸿门宴的毒计，一下便被捕送到南京去幽禁了。这次来太原的是谢邹傅三位先生，覃先生则留在天津，没有参加这个讨论。我最初主张维持第二届法统，邹谢反对，我们请了汪先生的示，让步至会合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而成扩大会议，然而邹谢两先生还因为他们在上海也曾开过他们的第二次全会，坚持着把那些委员也要加入。我以为别的可以让步，这一点确实难于赞成，我们为什么要动兵？原因在于反对非法的第三届全会，现在不独第三届可以加入，连环龙路的非法中央党部也要加入，那不是我们也违了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又何以自白于天下。不过谢邹两先生倒是非常倔强的，即使事不成而环龙路的党部不能放弃，我们越谈越成僵局，只有再到天津再说罢。傅沐波先生到底是一个青年人，不赞成谢邹的主张，但理鸣不在，他也孤掌难鸣，不好向久于同事的谢邹抗议。

在太原无聊之极，倒趁辩论余暇去游兰村，逛晋祠，大嚼傅青主的羊头脑，和看模模糊糊的电影，以及听十足秦腔的山西戏。晋祠风景在山西境内确是一个名胜的地方，有碧水青山，有唐槐汉柏，唐太宗起义的晋阳城，虽然倾圮不堪，但在戎马倥偬之时，来此一游，惹起我怀古的幽情，和凭吊的感慨。我读了晋祠贞观古碑以后，写了一首七绝：

"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藓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我们到天津再谈党的问题罢，依在这个愿望之下，谢邹两

先生从正太铁路回天津，我倒和傅沐波、黄少谷诸人绕道大同一览云岗之胜。山西我没有到过，自然大同我更没有到过了。雁门的险巇，塞漠的风沙，一日之间，风景变换了好几次。大同虽然小小一个城池，却充满历史传说的罗曼斯，街道也还齐整洁净，不如太原的厮杂。可惜得很，我实在没有机会去欣赏，仅到城门，警备司令赵承绶便带了一队官兵来迎接，把我一抬便抬到县长老爷的衙门，入夜又摆宴洗尘，使我和同来的朋友们都感觉乘兴而来，败兴而坐。

还幸第二天风沙稍静，我们可以骑马游云岗，云岗的佛像是北魏时的建筑物，几座临河的峭壁雕满了佛像。那种庄严的佛相，并不如近日俗人打雕塑得俗不可耐的，尤其壁上的神女服装酷似近日西洋女子所穿的衣服，古代的服装恐怕东西各国都受了印度和小亚细亚的影响，只不过蒙古和满洲两次侵入了中国，使中国妇女的衣裳越弄越俚鄙罢。只惜小佛像很多被人斫了头，据说日本人来游云岗很喜欢偷佛像，自然当中也有乡人偷了不少出卖。最粗俗的要算迷信人们为酬佛愿，重塑金身，好好一个石像，装上士敏土牛鬼蛇神的脑袋，佛像满身还贴满了红色祈福的纸钱，最大的佛像下边，乡民还搭盖了两座茅屋，养满了猪羊和鸡鸭。云岗雕刻是古代的文化，这种稀有的艺术已被埋于鸡豚臭粪之下了。我对赵承绶先生的贡献，以为云岗是一种艺术，佛像就使被偷了头，也不宜拿士敏土来补缺，罗马和希腊很多无头的石像，如果善于保存，也是文化的象征。赵先生欣然的接受我的献议，后来听说云岗就不如我到时那样龌龊。

在大同只停留了一日，夜里十二时附包头来的火车经张

家口回北平。路经南口下车休息了二十分钟，等调转机车下岭，因此又看见当日建筑平绥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南口的工程在世界铁路史是有名的，大约因为詹先生是广东人罢，我瞻仰詹先生的遗像，也引起我对于乡土豪杰的崇拜。我们到了北平，即当夜赴天津，覃理鸣先生在吴达铨家内食夜饭，我们又到吴家会合。覃先生倒是一个痛痛快快的人，他不赞成谢慧生先生的执拗，他也不满意邹海滨先生的罗苏。我那时还和邹海滨先生打了一次笔墨官司，然后藉着汪先生的调停，扩大会议才勉强宣告成立。

…………

扩大会议是什么呢？表面上合着一二三届的中央委员，骨子里还容纳了上海的二届两三人。那时我虽是坚持着要维持护党的法统，只是汪先生大有让步的决心，我还记得汪先生有一次来电很愤激，说我不应该过于坚持原来的法统。汪先生既是那样让步，励斋和我都没有话说，扩大会议就那样成立。老实说，改组同志会是汪先生后来在十九年一月一日通电解散的，就使当日不解散，改组会的精神也在那时消灭得无影无踪。因为改组同志会有它的主张，有它的立场，而阎先生另外有他的一套，西山会议派又有它的私见。我们既会在一块，改组同志会的主张只好一骨碌袋起，只谈反蒋，不谈主张，这样改组同志会的精神便根本萎谢了。还有的是改组同志会以反对非法的三全代表大会为号召的，现在北平的扩大会议，既不维持过去的法统，也难谓为合法。并且阎百川、冯焕章，都是三届的委员，为着事实，没有方法不把他们包含在会议之内，这样改组同志会以反对三全大会始，而以容纳三届的

委员终，更且包含了第一届委员而又包含了上海的第二届委员，虽然上海的第二届没有明白抬出招牌来，但实质上已融洽在一块，由是改组同志会仅有的立场也因此消失了。

我对于此次扩大会议的办法，内心非常之不赞成，无如汪先生既有这种坚决主张，我们若不让步，北方的局面也会受严重的影响，于是东凑西凑，扩大会议于是乎成。至于阎百川先生个人呢？他素来揭橥容纳各方人才，于是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变为三山五岳的英雄，一气麇聚北平，很像摆下一个诸仙大阵。

军事是发动了，冯焕章已做了前敌总司令，鹿瑞伯被任了前敌总指挥，徐次辰副之，陇海一战，西北军已进至兰封；石友三主席山东，孙殿英主席安徽，都已内定。至于山东方面的军事，阎先生打算自己主持，傅宜生因为在涿州之役和张汉卿有相当的交谊，由东四省借了一百辆列车以为运兵之用，山西的战将如傅宜生、张荫梧、王靖国，也都调了德州方面作战。

党务和军事有了粗糙的确定，汪先生遂由香港假道日本到北平，所谓粤方委员除了何香凝仍旧坚持联俄、容共、农工的主张，和王乐平在上海被刺身死之外，全部来了北方，就是宕翔诗酒的经子渊也趁了热闹，参加这个扩大会议。

汪先生抵平之日，正是共产党焚占长沙之时，北方的军事正在进展时候，李、黄、白、张，也从广西动兵，倾师而出，放弃了广西，而进略武汉。扩大会议趁此时候命令张桂军队恢复长沙，但以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从广东衔尾紧追，张桂军仅仅占了长沙，又回头和广东的军队战斗，在衡阳附近受了挫折，又退回桂柳。

怀仁堂做了扩大会议的地址，上海的各省市党部联合办公处也搬了来，而熔解于会议内的各部门。然而当时西山会议派正诚心协作之时，又来了山西李冠洋反对改组派的运动。原来阎先生对于军政党都有他另一套的手法，当时他的劳资合作论就是李冠洋的大稿。李冠洋先生是山西人，原始属于丁维汾先生反共大同盟旗帜之下，及至被派回山西办党，遂离大同盟而专替阎先生帮忙。我头一次到太原之时，李冠洋曾拿阎先生的劳资合作论和我研究，我很惊讶的其中许多理论和我的《革命评论》相同，李先生也不自讳的说内中采取不少《革命评论》的主张，那篇劳资合作是代阎先生主稿。既然李先生的主张许多和我相同，而他为什么反对改组派呢？这就因为小组织的关系，他每月拿了阎先生四万元办党，终不能不别树一帜，以表示他自己有才力，有能干。扩大会议那时虽然不含一些改组派的主张，而一切事务倒多落于改组派之手，这样外有南京的强敌，内有山西的对峙，徒有形式的改组派，那时已岌岌可危。

陇海路的战事，冯先生始终保持他的内线作战计划，一连几个月，南京固然屡次失败，而阎冯也毫无进展。关心政治的人们屡次催阎先生组织政府，而阎先生以军事为理由，始终犹豫不决。山东方面倒很顺利，韩复榘的军队固不能抵御晋军，迫得向东撤退，晋军遂渡河占领了济南。可是得之易而守之难，蒋先生从广东调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北来，在汶河一战，晋军大败，几溃不成军，能够全师渡河北归的仅有王靖国一师的队伍。这次晋军失败，北方还有一个流传的笑话，说是因为秋雨连绵的关系。山西军队多数是抽白面，那就是海洛

英，他们拿烟卷安上白面抽，作为鸦片烟的代用品。这次交锋，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洋火点不着，无法可抽海洛英，毒瘾既来，交锋大败，这个笑话到底有否其事，我不得而知，但山西军队间有抽白面的毒癖，大概也不能为讳。济南这一战，扩大会议的命运也随此告终了。

…………

那时具有举足轻重之势的，是那徘徊关外的张汉卿。南京固然对他极其奉承，北平对他也曲意巴结。蒋先生的代表张岳军和吴铁城，阎先生的代表贾毓儒和薛子良，大家齐集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而一劝其连横。聪明的张汉卿，使他部下的军人和他们鬼混，自己却老装着病，轻易不肯见人。济南失守，张汉卿到了葫芦岛主持开幕典礼，顺便到了北戴河，北平一班朋友劝我去见张汉卿，梦想或者于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一条出路。

本来我初来北方之时，汪先生曾有一封介绍信，请我于便中时候，看看张汉卿。说张汉卿这人玩是太好玩，但脾气还干脆，并且说我也是干脆的，或者见面之后，能够投契也未可知。迨我到北方时候，第一为着组织扩大会议忙，忽而天津，忽而北平，忽而太原，接着汪先生也来了北平，使我不能抽出一个时候到关外。其次我听见张岳军和吴铁城都在沈阳鬼混，贾毓儒和薛子良则终日坐冷板凳，那我实在不能陪他们向张汉卿上衙门，所以一耽搁便耽搁到现在。

张汉卿既到了北戴河，那里的人不比沈阳那么复杂，郭复初又适在那里避暑，来了一个电报，说顾少川也赞成我到那里一行。我和汪先生商量之后，便和覃理鸣一起去作说客。

北戴河对于我眼中又是一番新景色，说也可怜，中国避暑的胜地，都和我没有缘份。除了牯岭在十六年因公上过去两三天，青岛和北戴河对我竟直是一个生客。我们抵北戴河之时，夏天算是恰恰过去了，郭复初到车站等我们，还有张汉卿的部下胡若愚也来迎接，给了我们许多不可靠的欢喜消息。他们都说小张纵使不助阎，也决不助蒋，张岳军和吴铁城都跟他到葫芦岛，到北戴河，但是始终张汉卿都没有和他们深谈。这个消息或者是可喜的，然而贾毓儒和薛子良也始终没有和张汉卿深谈，这他们便不解释了。

顾少川替我们约了张汉卿，他打算第二天夜里请张汉卿和英国公使蓝浦森食饭，并且在饭后玩扑克，请我们于夜里十时到他的别墅见面。我们依约而去，十时后蓝浦森才走，扑克局面已在开场，我们——顾少川、张汉卿、覃理鸣、郭复初和我——五个人就在厅外的走廊朝着海谈话。顾少川是主人，只负介绍之责，不参加意见的，郭复初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敲鼓边的人，也不大说话。我为着年龄起见，让覃理鸣发挥他的宏论。

覃理鸣先生运用战国策的口吻，想游说张汉卿，说他这次来见，不但是要救中国，还要救张汉卿本人。他的理论很长，我也记不清楚。但好玩的张汉卿，本来中国就不在他的眼内，自己更不需乎拯救，覃先生的高论当然一毫也听不进他的耳朵。

张汉卿的话匣开了，说他姓张的不会听任何人的游说，只于东四省有利的他都愿做。他说他父亲交给他东四省，如果做得不好，对不起他的父亲，并对不起东北的人民，也对不起一班老前辈。张汉卿说了半阵话，又起身说对不起，要入内解手，良久良久才出来，说他夫人闹肚痛，他要招呼她，但后来有

人告诉我，他是吗啡针瘾发，要找副官打了针才能继续谈话。

“汉卿先生的意见我很明白。”我单刀直人。“但东四省是没有可以中立的，今日战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为你不帮助阎，简直帮助蒋也是一个办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见很对。但无论如何，我非从长考虑不行。”张汉卿真认我干脆，故也直接表白他的意见。

这场谈话算是告终了，扑克场内已再三的催促张汉卿，座内真是珠光宝影，无数的夫人小姐们正兴高采烈的在斗扑克。这种玩意我是玩不来，仅和张汉卿摸了四圈麻将便归旅馆就寝。熬了半夜不打紧，忽然我得了重伤风，这个重伤风病一直至到退入太原时，才得痊愈。

第二天卧了一天床，第三天便赶回北平，外间的传闻说覃理鸣和陈公博见了张汉卿了，累得扩大会议一般人空欢喜一阵，而张岳军和吴铁城还担忧了好几天，但我知道这个情形，并且断定张汉卿将于最短期中转变，急转直下取消他的中立态度。

济南一败，北方军事已根本动摇，残余的晋军不但退至黄河北岸，而且越过德州，更退沧州。陇海线的西北军虽然能维持原来的阵地，但樊钟秀已在许昌炸死，石友三以不满意阎先生在济南处置为名，不听命令擅自把他的队伍撤至河北岸的新乡屯扎。军事形势如此，平津看看人于蒋先生的掌握，这样顺手牵羊的事还不干吗？张汉卿先生便一手拿了蒋先生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一手便下令出兵入关。当他举兵入关之时，照例在沈阳举行一次会议，那位张老将张作相自然老成持重，不肯赞成，但自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张汉卿谋杀之后，所

谓老派已没有力量。环于张汉卿左右都是佻达急利之徒，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的戏院，无一处非张先生和他左右日夕的绮思所寄的；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为什么不干？所以这次会议，于决定之后才请张作相参加，一班所谓老派也只好缄口不言，让张先生乘传入平津。

张先生倒也文绉绉的，动兵之时，通告阎先生说东北军要来平津驻扎，每至一地，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先期撤退，正合着阎先生的"礼让为国"。东北军的前头部队是于学忠，他本驻在滦州，到天津非常便当，何况北宁铁路本在东北军的高纪毅手里。

东北军一至天津，扩大会议便起动摇，大家在怀仁堂召集一个会议，打算全部迁入太原，表示和阎百川先生共患难，其中也有一部分委员以在外活动为名，到天津看风色。汪先生是扩大会议的主脑，自然首先表示入山西，汪先生既决心西行，我自然不能例外。照那时的情形观察，失败是失败定了，军事既然遭了极大的挫折，而政治上又一无主张，甚至一个政府自军兴数月也成立不起来，赶到事无可为，阎先生才草草于九月九日九时在怀仁堂就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其他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当时就算成立罢，一般聪明练达的人，对于部长也恐怕虽三顾草庐还高卧不肯就聘的。

我们一行人于早上四时到西车站附车往石家庄，车刚过长辛店，忽有电话赶来说萧仙阁要来报告东北军的消息，我们又不能不停着等待。萧先生的好消息报告，我已叙于"三月二十之变"的一章中。我们被他阻迟了行程，于第二天深夜才到石家庄，即在铁路饭店住下，重新商议后来的计划。

…………

阎先生早已在石家庄，自开战以来，他都以石家庄为大本营，来过两次北平，到过两次山东的前线，其余时间都在娘子关口的正太总站上。我们虽然到达此地，山东退下来的情形还是不十分清楚，前方将领也正在沧州间做收容工作，一时没有回来，倘使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大局虽然危急，还不至于崩溃。我们到后，要定一个新的计划，还得要等材料，于是把扩大会议的委员们和各部分人员先送往太原，汪先生和我留在石家庄等候。

我们何妨趁此时候往郑州一行，汪先生提议着。我那时也愿意见见冯焕章先生；我对于冯先生充满古怪的印象，有人说他冬天穿上大兵的衣服，而里面统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走之后大嚼其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之时，有政府供给的华丽汽车不坐，而和士兵一同坐货车。有人说冯先生对于高级军官不客气，动不动打军棍和罚跪。这种印象都模糊而错乱，使我脑内描不出一幅冯先生的图画。我十七年在上海时候，郭春涛衔冯先生之命来见，曾送我一件老羊皮袍料，这是我们已往仅有的往来，但我在汉口之时的确对于冯先生没有很好的感想。我听见冯先生治军很严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那怕你年纪多老，也要随班上这堂早课。然而每次冯先生的代表来汉，无不大嫖大赌，他的参谋长每夜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五百元一底的麻将。我那时断定冯先生终久要失败的，因为桎梏人的性灵太厉害，部属只有作伪应之，相率而为伪，迟早必召崩溃。可是我始终没有机会看冯先生，我倒要真真认识他一下，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怪物！

汪先生和我于到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专车往郑州，那时同行的还有王东丞，他和西北军的军官很熟，这次同行，一半算是侍从武官，一半也算军事顾问。郑州白天是不可以去的，每天都有南京方面的飞机来轰炸，火车须于晨光未亮之前就要进站。我们车过彰德就要算时间，第二天绝早过了黄河桥，冯先生派了汽车到站相接。

冯先生的总司令部在一间隔城墙不远的破庙中，他自已更住在另一间小破庙内的神廊里。我们到后，就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天一大亮，便同往城墙边一座棚厂内食油条和稀饭。人家对于油条稀饭的滋味怎样，我不知道，可是我倒非常的高兴，我孩童时代，每朝进学之前，照例食一碗稀饭和两条油条，此时我一面看着初出的朝阳，一面食新鲜的油条稀饭，倒惹起我孩童时代的回忆，增加我不少的朝气。

果然八时左右，南京的飞机便到了。可怜那时也没有防空哨。只由前敌阵地看见飞机经过，打个电话来，城墙上更有站岗的哨兵，了见飞机飞近，长吹一声哨子，便算空袭警报。城墙边掘下几个防空洞，既没有钢骨水泥，也没有木桩板壁，我们远见飞机来临，很从容的缩入地洞谈话。大约冯先生每日必有两次在洞内办公署，有临时安置的军用电话，有几幅地图，还有一部《资治通鉴》。这时来轰炸的飞机只有八架，集中目标在车站，炸弹声隆隆的响，夹着逆击一两声炮声。那是不是高射炮呢？当时北方还没有这样阔气的高射炮，只把一两尊野炮向着天乱轰，飞机狂暴地炸了两个钟头，又施施然去了。据说蒋方来的飞机时间很准确，每日早上八时，下午二时，照例降临，可幸炸弹还不很大，炸了一个多月，郑州车站

毕竟没损伤，只有几架货车被炸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飞机轰炸和防空洞的滋味，我想飞机还不怎样可怖，所以后来在南京，在武汉，在重庆，在成都，对于日本来的飞机，我都夷然视之。自然后来的轰炸比郑州轰炸的规模大不相同，不过有了这次防空经验，我总觉得飞机不是决战的最有效兵器。

赶到飞机走后，我们出来草棚食午饭，我很留心冯先生的待客盛馔，桌上有一盘炖鸡，一盘猪肉，一盘蔬菜，两盘馒头，此外还有几个小碟。这餐午饭的味道倒不错，我想冯先生确异乎我所闻，大概世故渐深，作风改变了。饭后我们在草地散步，我询问黄少谷给我介绍的宣传处长雷季尚，他告诉我冯先生一向都是如此，不馔也不丰，有没有客，菜俱是那几样，至于外间宣传冯先生恶衣恶食，那是故甚其词。大约冯先生治军是认真的，对于军官是过于严厉的，至于平常起居，倒不是太不近乎人情，我对于冯先生的观念，到那时算是有些改变。

这次我们和冯先生谈话，大都谈谈过去，谈谈未来，实在没有谈到什么计划，至夜冯先生更提议汪先生应该到到开封，他打算打个电话到前方兰封，叫高级将领们到开封相会。汪先生是难得到前方的，各将领也想趁此时机领领汪先生的训话。汪先生答应了，我们食了夜饭便开车到开封，半夜里鹿瑞伯和庞炳勋等前方将领都来，在车内谈了两小时，我们便还郑州，不再停留，一直驶至新乡才停下。

石友三那时驻扎在新乡，他是不奉命令而自由撤退的，他的任务是担负西北军的左翼，他经两次战争之后，一声不响便往后撤，留下一个大空隙，几乎西北军受了蒋先生的大包围。石先生既是那么逍遥，而阎冯两先生一点也不敢执行纪

律。石军虽然势力不大，也还是一个大军团，倘一不满意，在后方捣乱起来，由新乡以至石家庄，一些军队也没有，那我们真可以一起变为俘虏。石友三已和张汉卿发生关系了，阎冯两军中人这样传说。这个可能性自然很重，因为石先生原是吉林人，而石先生又是善变的奇人物，加上萧仙阁在他左右，真是极天下的奇事，他都可以毫不介意，径情直行。当汪先生离石家庄之时，阎先生再三请托，希望汪先生能够顺路望望石友三，藉着汪先生的面子，使他不好意思反戈搅乱这个已残之局；在郑州时冯先生也赞成这个办法，所以我们一面在郑州车站打个电话给他，一面车至新乡便停住，打算入镇见面。

石先生倒很客气，不让我们到镇里，亲身到车站来，我们见面时，宾主寒暄，状还亲切。汪先生拉他到车厢内说了一阵话，无非说他的军队既要整理，很可以安住新乡，阎冯那边如有误会，汪先生可以替他解释。石先生切矢说他没有异志，只是军队经过几次战斗，不能不加补充，阎冯两先生不谅解他的困难，所以除自动后撤，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车站散步，见石先生的兵士皆着起新武装，军　的式样和阎冯的军队都不同，高高很像法国的军帽，精神靠着形式鼓励，很有些纠纠之势。"那是法国式的军帽吗？"我问。"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本军的式样"，旁边有人低声说。呵！谁说石先生没有和张汉卿勾结呢？那倒证实了，连军服也改换了！我们的军事更难乐观了！

我们回至石家庄，山东前方的将领，除傅宜生之外，张荫梧等都已回来，阎先生提出军事的新计划，征求汪先生的同意。这里所谓新计划，合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在山

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打算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驱逐出关，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这个计划是不是可以行呢？当然是一个计划。但以我当时的推测，计划虽好，不易实行，因为冯军的军心已变，而晋军已无斗志。一天我们为避飞机，到乡村谈话，冯先生的参谋长刘骥恰于那时来石家庄，汪先生也邀他同行，顺便问问军事。

"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汪先生有意或无意的说。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了。"刘菊村不假思索的下断语。

我在旁边听见，心内在打算盘，刘菊村只是冯先生的参谋长，在汪先生面前有这大胆的陈说，纵使不代表全部的冯军，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的心理。当时我也不愿参加意见，因为参加意见也没有用，总归一句话，就是剧场上的打败仗成语"大事不好了"！

对于这个新提出的军事计划，汪阎讨论了很久，认为可行，其实除了那个办法，也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但这事必须通知冯先生，为着来往电报说不详细，阎先生打算再请汪先生一行，自己也陪同前往。汪先生把这事告诉我后，又邀我同行，我说你们要谈军事，我可以不必去。汪先生听见我不去，默然不语，没有几久，又叫人找我谈话，说阎先生还是希望我再走一次，说我"明，决，快"，非我去不行。我这人到底豪气，听见阎先生恭维我明决快，我又准备再走一趟郑州。

即夜我们挂了一辆专车往郑州进发，半夜冯先生派人来

报告军情，我们只得在半路上一个记不起名称的火车站上停车相候。这一耽搁便已到差不多天亮，刚过顺德府，有人来报告，说石友三军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军队已斜出大名。阎先生立刻变了色，因此行必要经过新乡石友三的防地，这个消息如果确实的话，岂不是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虏。阎先生踌躇了半刻，教停下车，要偏劳汪先生自行，自己挂了一个小机车，把我们的车辆分作两半，我们南辕，他自己北撤。阎先生怕做俘虏，难道我们就不会做俘虏吗？不过当时实在再无适当的人去郑州，我们仗着自己是文人，而石友三又在浦口举过兵，和我们有过联络，凭这一点关系，大胆唱唱空城计。

我们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我在车内睡不着，天色微蒙之时，又到黄河桥，我瞟见一两只水鸟逐流上下的低飞，忍不住诌了一首七绝：

"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心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冯先生还在前时的破庙等我们，汪先生把来意说明之后，冯先生也不犹疑的赞成。

"但这事办起来，恐怕有许多困难吧？"汪先生听了冯先生赞成之后，加这么一句。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先生很斩钉截铁的说。

这事算已原则决定了，至于如何把全部军队退至河北，如何驱逐奉军，如何布置沿河的据点，那是军事专家之事。那早照例食油条稀饭，照例八点钟飞机来炸，照例午饭是炖鸡、大肉、馒头，不过在许多照例的当中，在午饭后我觉得有些异样了。中午汪先生和冯先生都休息睡午觉，我和王东丞走进参

谋室，看见张省三和李兴中在抽三炮台香烟，他们见我来很欢迎，说："公博先生，请抽一根三炮台，冯先生那里只有红粉包，大概你不过瘾的。"我们一面吸烟，一面谈到军事。他们谈话倒不避忌我们，认为军事无望，据河自守也不是计划。他们有主张和蒋先生开和平谈判的，也有主张派人去见张汉卿请收编的。这些都不是沙中之语，而是公开讨论。这种事我是有经验的，在广州失败时候就有这个现象，这完全表现了军心动摇，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刚食过夜饭，消息似乎很紧，据说南边已有一团南京军队冲入，更有一个情报说黄河桥附近就有百多土匪窜入来，冯先生还镇静，在神厅上退回了他的走廊，摊开地图在地上，和几个参谋在那里点着蜡烛指手画脚。少顷我们都到草地，冯先生就在席棚下打军用电话：

"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冯先生口角还挂着笑容，把军用电话挂上，又和我们谈话。

他一面谈话，一面催我们早点动身回石家庄。王东丞在我耳边说："我们催汪先生早点走罢，听见军事很紧，这边早晚便要失守。"我那时已经证实，所谓百多土匪就是南京方面的便衣队，我们在九时左右便上车，冯先生还很从容的陪我们上车站。

那夜在路上再不停留，第二天过新乡也看不出什么动静，这样我们便回石家庄了。我们和阎先生见面之后，即于第二天早上入太原，汪先生至太原时，车站还很热闹，全城的文武官员、党部、民众团体，都在站上欢迎。在山西大饭店门前，汪先生还对大家演说，但李冠洋他们有几个人在大呼"打倒改组

派"，我因人声喧闹，听不见，可是有些改组同志听见，大发牢骚。我按住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和李冠洋先生一群人那样没见识；我的看法阎先生不久也和我们一样失败，只是冠洋先生要表示李派的力量，不能不闹一阵，恰象囚在笼内的一群雏鸡，大家都走了背运，依然还要相啄的一个小把戏罢了。

扩大会议借了傅青主的祠堂开会，大家无事可议便讨论起草临时约法。仅仅两三天，陇海路上的军队便全部崩溃，孙连仲和几个将领带着军队过了南京那方面，大概他们不愿再受苦，怕渡河。冯先生的根据地陕西也给杨虎城袭据，刘郁芬仅以身免，西北军全部除宋哲元带了张自忠和冯治安两部沿途受击退过河北之外，其余都给蒋先生收买过去了。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七十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七十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

阎先生从石家庄来了一个电话，说冯先生已退回了娘子关，很希望汪先生到那里会商善后，那时我们虽然没有食不下咽，却真是寝不安席，至太原没有几天又要再走娘子关了。在娘子关的车站，会见了阎冯两先生，我们就在树林里举行会谈。东北军那时占了平津，占了张家口，而陇海路上又那样溃败，军事自然是人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但事到其间，也只有据娘子关以自守，徐商善后之局。

…………

说到此地，我很想缓和点紧张空气，补写一段离奇的软性

新闻。其实是这样，我们在未再走娘子关之前两夜，太原党部的同志，请我们看髦儿戏。太原差不多是一个荒凉的堡垒，古典的庙宇，你想髦儿戏还有漂亮的么？大概是无聊罢，或者是我急于去观光戏院的内容，我也随着大家去欣赏。我到戏院时，看见陈树人先生两夫妇高踞包厢，他用绝不打紧的诗人风度去听戏，我确有些艳羡。他两位老人家在十时左右便走了，我也恹恹欲睡，只是一个人回饭店还不是睡觉么，打熬下去便算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饭厅内又碰着。

"博老，我昨夜也看见你听戏呢！"树人先生一路都招呼我做博老，因为我叫他做树老，他有点不服老，这是回敬之意。

"是的，为什么你夫妇两位那样早便走？"我不经意的问。

"委实没有看头，我们走后还有好戏吗？"树老似乎余兴未尽。

我太跳皮了，存心要和树人开玩笑。我们一般朋友都叫陈先生是陈两人，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树人，而他平时作诗，题目最好写"赠闺人"，左一首赠闺人，右一首也赠闺人，所以我们暗地里常戏呼他是陈两人。

"怎么没有？你走后，演珠帘寨，那个扮二王娘的，真是艳夺天仙。"我开玩笑说。你想太原的髦儿戏是北平的四五等角色才来，而扮二王娘又照例是一班内次一等的角色，哪里会有好戏？

"这样，你今夜还去吗？"陈先生好奇了。

"怎么不去？我今夜打算去捧她。"我又开玩笑。

"你打算怎样捧法？"陈先生认为真实了。

"我已包了六个厢房，和池子前排六行位子，并已定了四对花篮。"我知道太原戏院的池子是官厅禁止包的，而且九月凉秋，塞外草衰，不止没有花，连一根草也找不出，花篮更是无从提起。

我说完之后，脑内早忘了一干二净，即日陪着汪先生往娘子关。第二天早上回太原，有人报告我，说树人先生在中央党部通知了各职员，说陈公博捧那戏子，她必定可观，叫各职员不妨随兴看看。公博捧戏子，真是奇迹了。那天夜里，中央党部真是空营而出，惟是看不见花篮，更看不见捧戏子的阔少爷，因为我已经往娘子关了。

改组同志会山西干部为着这件事，还举了两位同志来劝告我，说在此困难之时，不宜捧女戏子，我又是出头出角的改组派，应该善自检点。这两位同志是改组派，自然来意甚诚，而且措词也温婉有礼。我禁不住大笑，把那顽笑告诉他们，惹得他们也笑个肚痛。

真是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太原都知道我捧戏子，只是那二王娘是什么，既然是次等角色，当然不会登她大名在海报，于是有好事之徒，千方百计找出她的名字叫做郭艳霞。过了一个星期，汪夫人陈璧君到了太原，她是专好搜小报告，听耳边神的，提着我一定要请她听戏。我把上次的新闻告诉了她，并说这件事已闹得这样满城风雨，请听戏我可以出钱，但亲身奉陪，敬谢不敏。

"好，这也使得，我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传传谣言，倒还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话，那倒太冤枉了。"汪夫人和我开玩笑。

那夜我真出了山西票十二元，订了两间厢房请汪夫人听戏。夜里十一时我还未睡，汪夫人一群人已听完戏，打从我的房门经过，拍我门：

“公博，你真冤枉了。那个戏子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象起了鱼鳞。”我还未及开门，她已回房休息去了。

黑又有什么要紧？我一生没有捧过戏子，这次过屠门而大嚼，又何妨担些虚名呢？好事的覃理鸣又把那位郭小姐找到了山西大饭店，据他说她的手臂真是全黑的，原因她是下等角色，在班内少不得每天都要烧茶煮饭。覃老先生大约也看她不上眼，只找过她一次便不再领教了。

我们的同乡名士马小进先生，那时他是太原一家大学的国文教授，兼了扩大会议的秘书，公余之暇，专作打油诗以自娱。有一首是咏郭小姐的：

“国事真是丢那妈！近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

他许多咸诗都不传，独这一首，因为有所本罢，倒不胫而走。我真对他不起，这首诗竟直张冠李戴，人都说是我作的，因此郭小姐享了一个短时期的盛名。这段故事，陈树人先生始之，马小进先生终之，我担负了虚名，而郭小姐得了实惠。

…………

扩大会议依旧每日进行它的约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许久，才把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定为第一章的大纲，以下分章规定细目。汪先生倒很起劲，每日必到会，孳孳矻矻的讨论，而我呢，除了第一第二两星期以外，十次倒有九次缺席。汪先生对我的懒惰很不高兴，但他是很客气的，对我还没有

表露责备的意思。其实我何尝懒惰，只为信念不同，我总以为国家的根本法，首先必须提倡民权，各地的自治一点基础没有，而想实行民主，这是根本走不通。虽然有那一本黑字白纸的约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实是一个绝大的疑问。我虽然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一个人，但要我花精神于这种空虚的会议，我倒不如多看点书，多考虑些实际事实。

军事到了那时已无可为，但阎先生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打算整顿军容，据关固守，若事不得已时，退陕西，走宁夏。阎先生或者有这个决心，然而军心早已涣散；山西军队都是舒服惯的，要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裹粮，事实上绝不可能。况且西北是著名贫苦的，这次西北军的崩溃，就是他们怕回陕甘，渡黄河。西北军还不愿受这种苦，山西军又焉能忍那样痛。南京和北平两面这时倒怕激事过急，恐生剧变，于是提出和平条件，只要阎先生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存，对于山西军队的实力也不会分割。我们正在开约法会议，山西的代表已络绎到北平，我们若久留山西，倒变成一种障碍之物。

我们赶快把约法起草完竣，公布后即离开山西罢。阎先生对于这个提议是默许了，难得阎先生始终如一，在我们离晋之前，还拨出山西省银行纸币一百万元，大约那时合了现洋可值五十多万，以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经费。诸事停妥，我们便分途离晋。

怎样走法呢？当时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循正太铁路出石家庄以至平津。一条是出大同沿平绥路至北平，一条是从山西腹部越关至河北。但这三条路都要秘密走才行，那时不只平津在东北军控制中，连石家庄也已有了一旅东北军驻

扎。谢慧生和邹海滨是附着山西代表的专车至北平，恃着代表的招牌掩护，藏在他们的车厢内。汪先生是出大同走平绥路，我因为人太多，恐怕累了汪先生，等汪先生一夜离了大同，我才搭车至北平。

这次出亡，要经张家口，经北平，经北宁路，处处都有被扣留的可能，大概总要改装了。我买了一件长袍，一顶瓜皮小帽，留起了胡须；买了一部《三国演义》，预备在车上无聊时看看，并向高启予借了一部汽车往大同。

大同的行程，大有今非昔比之象，我知道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早已退至那里，但我是出亡的人，不好看他，只在一家小客栈住下，每天住宿费是五角山西票，合着大洋不到三角钱，尝了这种味道，也可以增加些经验。我到小客栈时，看见一辆汽车开进来，并且听见汪先生副官的声音，我知汪先生也到了，只是不住在我那小客栈，我为着使汪先生休息起见，只在房间温《三国演义》。

第二天起来，知道汪先生已于昨夜十二时走了，是夜我买了一张三等票，也由平绥路出北平。在车站碰见覃理鸣也背着手在那里踱方步，等包头开来的车，覃先生告诉我今日才由太原赶来，在小客栈很受宪兵检查的闲气。宪兵问他是什么职业，他回答是“办笔墨”的。湖南所谓“办笔墨”，即是办文书当老夫子的意思。怎料湖南话的“办笔墨”，在山西人听来倒象“办秘密”一样音调。那时警戒森严，有人来山西办秘密，这还了得？于是宪兵罗唆了，覃先生解释了半天才度过这度难关，我听见之后，真笑到打跌。覃先生是买二等票，我是搭三等的，他于是高踞着车厢，我却要钻到篷车内。这个三等车

也好玩，没有位子，只搭着几条长凳，虽名客车，实是货车，这时因为天冷，当中摆着一个火炉，还幸车内人数寥寥，我倒觉得非常舒服。第二天午间到张家口，东北军上车来检查，这几个兵大爷倒很随便，上车来看了几眼便走，下午五点多钟便抵北平的西直门了。

我往哪里宿一夜呢？朋友是不可以拖累的，旅馆更不可以住的，有了，我想到我的法文先生法国太太那里逗留半夜再说，她是一个外国人，是和中国的政治不生关系的。我到东裱褙胡同，天已深黑，这位太太倒吓了一大惊，但她很庆幸我离了太原，她自己睡在梳化，让出她的房间给我睡。我到三点半钟便起床，赶搭五点的快车往天津，法国太太还煮些牛奶，烘两块面包，给我作早餐，她的盛意真是可感。

车开以后，大雪便漫天，呵，今天不是重阳吗？怎么今年下雪这样早！三等车厢连我只有两个客，沿途天色微蒙，已分不出是不是天还没破晓，抑或因下雪而黑暗。四野田畴全成了银装世界，树上的秋枝，田间的茅屋，一概被雪罩着，好大的雪呵！

到了天津，天气倒变了晴，只是车站的屋檐，雪已融化，滴滴象漏水。我雇了一部手车到胡今予家，全家还没有起来，当差的进去报告，今予才披了一件寝衣起身。不久郭复初也到了，大家很高兴，为的是重复见面。

“汪先生也于昨日到了，但我还未见，只见了王东丞，据说汪先生住在一个他的工人家里。”今予对我报告。

“是的，我在大同等他起了程，我才于第二夜动身的。”我也据实说。

谈了半天，他们只批评我的布长褂、瓜皮小帽，迄未谈及我的胡须，我有点气不过了。

"你们见我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没有不同的地方呵！"他们有些奇异，并且端详我很久。

"我留了胡子，你们没有发见吗？"我真发急。

"哈，哈，你不说，我们真不知道。"今予笑起来。

"你就在嘴上贴一张字'有须在此'罢。"郭复初加这么一句。

我有些气，拿起镜子来照，果然嘴上的须，活灵活现的一边二十九条，一边三十二条，并且还不黑，还不长。胡子可以数得出，它的成绩也可想见，我于是又决心剃去。到了天津已有两天，汪先生和璧君先生才见面。

"你什么时候到的？"汪夫人问。

"我倒来了两天了。"我说。

"我们昨日才到的，我们在大同还耽搁一天，游云岗，并且在丰台还逗留了半日看菊花。"汪夫人象解释似的，她的脾气无时不想秘密她的行动。

"呵！是吗？"我只笑了一笑，心想汪夫人又向我卖灵符，其实她在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到达，我都知得清清楚楚，只是说穿了大家没有意思。

过了几天，扩大会议各人又重张旗鼓，分配工作。汪先生又草拟了一篇宣言，说明扩大会议的工作，和今后的行动，我很不赞成中间有我们愿做在野派的一句说话，我和郭春涛都争得很激烈，而汪先生则似乎非坚持插入这句不可。我的见解，在中国的现状，南京哪里肯容纳在野派，言之于事无补，转

灰天下之心，我那次坚持，并不是为着有成见，而是为着盱衡时局而发，汪先生对我的坚持，认为不止有成见，简直似乎反对他。郭春涛过了几天对我说："我们不要坚持了罢，汪先生前夜回寓时和我同车，他对我叹气，说：'我不懂，公博对我亲近一个人都反对。'这样汪先生对你恐怕有了误会"。我只苦笑一下，大概所谓亲近一个人是指西山会议派罢，既是这样，我不如离天津算了。

我搭了一艘津港的直航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到香港，不料十三日香港《大同报》已登出汪陈破裂的天津电讯，我哪里有意思有资格和汪先生破裂呢？算了吧，我也不再辩。我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在十九年一月一日报上登出汪先生解散改组同志会的宣言，当时我即草了一个赞成通电，托广西驻港主持人夏煦苍打到天津，那时我知道汪先生早已到了香港，但他不叫我见面，我也不好去见他。自是我于十九年一月底便离港赴欧洲，直至十月一日才由欧洲回抵香港。那时胡汉民先生早被蒋先生囚在汤山，广州非常会议早已成立，九一八事件已哄动了世界，而宁粤两方又要开和平会议了，世事的变幻真是太多而且太速啊！

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

广州非常会议，我始终没有参加，但我虽然没有参加，而改组派的朋友倒有许多身与其事，这一段史实，我打算从我出国时起，到参加南京政府时为止，全是传闻的不写，专叙述亲身所听，亲目所见的。

我为什么出国？原因真是复杂到难以叙述，让我一件件的描绘在下面罢。

以前我不是说改组同志会自始的主张就不统一，组织就不健全吗？实在说，改组派的成立，是成立于一本我所著的《国民党所代表是什么》那本小册子，末后《革命评论》刊行，更标出许多主张。归根一句话，或者我是对，或者我是错，我承认社会是有阶级的。因为有阶级，就有阶级的争斗，我自然不承认阶级争斗的过程和终局，象马克斯那样宿命论的呆板。对于阶级争斗，有些国家是不能避免的，有些国家是可以预先设法消弭的，我的理论根据是承认社会有阶级，而提出种种方法去消弭阶级争斗。

然而顾孟余先生是否认有阶级的，他也知道有阶级，但恐怕提出阶级两个字，会惹起争斗的情绪，他于是提出"职业"，提出了"界"代替了阶级的名词，对于我那本小册子分析成农工和小资产阶级认为不对，所以改组同志会成立之初，起了

不少的争论，终于后来经汪先生调停结果，把小资产阶级改成了“小市民”。

汪先生是调停了，但他还是依顾先生的主张，而且他一次从巴黎来信，采纳了林柏生先生的提议，主张国民党是“超阶级”，我批评了一顿，虽然不算激烈，也是不大客气，于是汪先生更不满意。

改组同志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中央委员难于产出，即以粤方委员为中央，换一句话说，即是以汪先生为领袖。但不知汪先生听了谁人的话，以为汪先生要做改组派的领袖，不如做全党的领袖，这句话我也承认为有十二分的理由，自此汪先生虽然数数来电，指示改组派的方略，并亲自提出欧洲干部的名单，但他对外宣称，他对于改组同志会是同情的，但他不是改组会的同志。

汪先生既然否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那领袖自然是顾孟余和陈公博了，然而孟余先生身弱多病，谈一个钟头的话就要睡一天的床，而且他最怕麻烦，怕谈话，怕见客，于是一切事务都集中我的身上。不过我始终也未承认过我是领袖，并且我也最怕做领袖，以我的地位、年龄、脾气，都不合领袖的资格，只是慢慢一班同志既没有人请教，不期然而然的集中一切问题到我身上。在一班派外的人物，虽然或者不以为我夺取领袖地位，但在他们看来，我的形势有些象历史上权臣用事，势倾人主。

派外的人物都有这些感觉，汪先生的左右，自然有些不安。加以汪先生未回国之前，广西的俞作柏因勾结共党，立刻

失败，于是广东一班将领，又把广西失败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这件事情，的确我蒙不白之冤，俞作柏在民国十七年我只见过一次面，这次他运动李明瑞是上海总部同意的，张向华和唐孟潇是和俞作柏会过议的，薛伯陵和李朗如是陪着俞作柏在上海计划，而且又陪着他一路由上海回香港的。他们怎样做，我在巴黎，一概不知，迨我由欧洲回至香港，俞作柏早已回桂。但张向华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动，及撤兵回至广西，找不到俞作柏，自然光起火来，于是俞作柏失败，我要负责任了，俞作柏勾结共产党，我也要负责任了，他们不止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而且胜则居功，败则诿过，诿过应该诿之什么人，自然又是我陈公博了。

不止如此，还有一件滑稽的事情，当俞作柏定期举兵之前，我曾在香港通电，数蒋先生十大罪状，讨蒋的檄文，无过是千篇一律的成语，当中有几句话，"成则总理在天之灵，不济则以死继"，而汪先生左右又指出那是以领袖自居的语调。那公博不是要想做领袖吗？汪公馆充满了这种苛酷的批评，可怜我蒙在鼓中，直至民国廿四年陈春圃先生才在南京告诉我这件事。

改组派的成立，我要做领袖，而俞作柏的失败，我要负责任，经过许多许多人浸润之僭，汪先生也感觉不安起来，于是在回香港的时候，汪夫人和汪先生对着我和余恺湛遂有以下的谈话。

十八年十月初旬，汪先生回国至香港，我第一次见他在山村道，我坐在客厅，汪先生还没有下楼，汪夫人先出来见我。我们照例说一番海程上的说话，汪夫人说：

“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国，而这次又急急的回国，你知道汪先生的意思吗？”

“汪先生不是在巴黎时已约好回国的吗？”我莫名其妙。

“是的，汪先生以前苦苦不肯回来，是不愿意当领袖，这次急急回来，是想早一点让出他的领袖。”汪夫人解释他们回国的意思。

“那不是笑话么？除了汪先生，谁人配做领袖？”我还以为汪夫人开顽笑。

第二天夜里，余恺湛跑来见我，说：

“我刚才看见汪先生，他说了一番话，说他这次回国，是要帮助你干的。他说公博年来很努力，应该做领袖，所以这次回国，是帮忙你干，而不是他自己干。”

我虽然不明白汪先生的意思，但知里头包含了许多文章。但汪先生太不了解我的性格了！我自始至终就没有政治的兴味，只有打不平的脾气。倘使没有蒋先生三月二十之变，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成立南京政府，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叫我们倒李任潮，跟着又给李任潮几十万元打我们，我深信我不会反蒋。倘使蒋先生不违法指派代表开大会，我也深信我不会反蒋。我发起改组同志会是为着我个人吗？无非为着汪先生罢了。我听了余恺湛的报告，又印证汪夫人之言，使我两夜通宵没有睡，那时我真想离开，只是送佛送上西天，在失败时期，怎好离汪先生他去！

在张桂军围攻广州时候，汪公馆谣言又来，说我的左右为争广东省政府的厅长，几乎发生冲突。我听了只是苦笑一下，我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左右，而且汪先生征求我的同意，倘若广

州国民政府能够成立，叫我做内政部兼外交部，我推辞再三，说内政部我还可以勉强担承，但外交已摆着郭复初在那里奔走，我何苦兼了许多不能干的职务。两个部我都不肯兼，难道要兼省政府主席，而又让左右的人争厅长，这些空穴来风之言，真令人有口难诉。

我们在北平开扩大会议时候，李朗如先生又来报告造谣言，说香港的改组派干部开会，李伯贤宣称汪先生不配做领袖，有领袖资格的只有陈公博。还幸汪先生很坦白，李伯贤他也认识的，遂把李朗如给他的报告与我看。我明知李伯贤不会说那样蠢材话的，但不可以不查。我为着这事打了一个电报到香港，不止李伯贤没有那样说，并且他根本不是干部常务委员，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干部会议。朗如先生为什么爱挑拨了？我想起来他恨我不替张向华筹饷。我自回港之后，曾在李登同处借了十万元给俞作柏，汪先生回来之后，我们又共同向李登同借了三十万元给张向华，末后又向南洋烟草公司借了十二万元给张桂军，财源就是如此，说到筹款，真是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末后张向华在围攻广州失败，转入广西，再攻南路，朗如又要我筹款，我说向华得了南路，军饷应当可以自筹，我们的财源枯竭，再难设法。这个话我还不是直接给朗如说的，而是给一封信与汪先生，不料汪先生坦白的将我的信件公开给朗如看，李先生自此恨我刺骨。朗如先生的脾气，我是深知的，他的为人或者没有恶意，只是婆婆妈妈的好搬是非，算了罢，何必辩护，等待成功，早点身退便了。

经过许多刺激，我真有些意兴阑珊，到了北平之后，酒我也喝，牌我也打，管他呢，人生贵适意，暂时摆脱政治，我早就

决定了。自太原再退天津以后，汪先生竟怀疑我反对他，我想这是时机，应当走了，所以在天津时，扩大会议还举了我办刊物，我一再固辞，一声不响，于十一月七日便乘船回香港。

还有一件事最使我感慨的，汪先生见了《大同报》所载的汪陈分裂消息，给我一封信，说他没有对我不起，何以有这传闻。汪先生早就回香港，然而来信还署着由天津发。我回了汪先生一封长信，把上项的事件详叙一过，并说我自认在国民党里仅得朋友两人，一是汪先生，一是廖先生，廖先生已死，当然只有汪先生一人。说到汪陈分裂，不论是历史，是地位，是年龄，是资格，都难配得上分裂两个字，《大同报》所载消息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而我十五才到香港，可见消息的刊载，我还在途中，天津谁人造谣，我倒莫名其妙。这封信发了以后，又促成我离国的决心，而且改组同志会是解散了，我对该会已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还是走罢，最少可以清清自己的头脑，换换空气。

十九年一月底便趁德国的邮船往意大利，自是在海外渡了几个月的流浪生活，罗马、威尼斯、维也纳、柏林、捷克、巴黎、尼斯、卢森堡，一直至到比利时才安住下来。我为什么要住比利时呢？说起来没有多大理由，自然那里的生活比较便宜是原因之一，而最大理由是卷烟好而又便宜，我是抽烟卷的，我实在挨不住专卖烟卷的价昂而又味涩；伦敦烟卷好，然生活又太高，左右思量，遂择定比利时做一个安乐窝、逋逃薮。

我在欧洲流浪了几个月，真感觉得有点苦闷，我别的没有嗜好，只有抽烟卷，看电影，食中国饭。各国的烟卷贵而不佳，看电影绝对不敢入大戏院，尤其不愿意入中国的饭馆。我很

怕碰到本国人，因为反对我们的，固然不好相见，赞成我们的，也难于答复，而且每逢碰着一个人，要背一篇很长的故事，我没有这种耐性，也不愿花费这些时间。

比利时的春天委实太惹人爱恋了，有不冷不热的天气，有不闹不寂的通衢，有丛密的森林，有青葱的田野，我每天在饭馆食完午饭之后，伦敦的《泰晤士报》也从飞机运到了，我照例在街角买一份《泰晤士》，在路旁的公园长凳坐下，吸一口的烟卷闲读着。

陡然使我吃一惊，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蒋先生扣留，送往汤山安置，这个消息在《泰晤士》的国际新闻栏内印在第二行。这是什么一回事？赶快又买了几张法文报，但所登的消息比《泰晤士》更简单。在中国可算是一件大事了，可是坐在小公园看报的人们，面孔上一些表情也没有。啊，是了！这群欧洲的先生们，对于中国事情本来就隔膜，尤其对于胡汉民三个字，面生可疑，等于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对于东欧和南美的政治家名字，绝不认识，纵使有人提过他们的名字，根本也懒得去强记。

过了一些时，报纸又登着南京开国民会议了，广州的非常会议成立了，汪先生也入了广州了。中国方面寄来的报纸，说当胡先生被扣时，汪先生在香港曾发表过一篇宣言，对于蒋先生是责备，对于胡先生是批评，我心想胡先生已是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汪先生何苦这样！当夜我起了一张信稿，打算劝劝汪先生，想了一下，事已过去，说也无补，又把那信稿撕掉。

国内的朋友渐渐有信来，劝我归国，我的钱也将次用尽，

欧洲虽好，不是久恋之乡，就此打叠回国罢。八月又湾转了意大利，附了一艘德国货船归国，九月二十过了锡兰的哥仑堡，船上已得无线电，日本军队已于十八日占了沈阳，这种无头无尾的消息，更使我惶惑，于是在船上打了一个电报给汪先生询问真相，直至船到了星架坡，才有机会读报纸。九一八的经过，真相渐明，惟南京方面怎样应付，广州方面又怎样应付，我还是不知道。

我于十月一日才到香港，汪先生早使人来通知，请我不必到广州，他定期五日来香港见我。在香港这几天非常之忙，因为广州已在打算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的改组同志也有一部分人参加，香港是别省到广州必回之路，他们找我谈谈国际情形，说说未来做法。

汪先生果然在五日到了香港，夜里请我食饭，并邀我早一些到，告诉我广州的情形。我见了汪先生之后，他原原本本告诉我他到广州的经过，他说：

"你刚回，许多情形你是不清楚的，请你不要问，我从头至尾告诉你。待我告诉你完毕之后，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你才问。

"广州我不愿意去的，知道去也没有好结果，但白健生和张向华打从广西来见我，说汪先生就为同志打算，也要到广州一行，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是没有出路，根本也不能和陈伯南合作。白张这样劝我，我不得不到广州，我可以说我这次到广州，不是为主张，而是为同志。

"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孟余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我

到广州之后，展堂虽然还囚在汤山，他托铁道部的医官邓铁真打了一个电报给古勷勤和孙哲生，说：'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甘万不能共事。'哲生倒也老实，给这电报与我看，所以我派人请你在香港等我，就因为他们对于你和顾孟余、甘乃光都拒绝。

"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礼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末后汪先生更告诉我，为着九一八事变，宁粤应该合作，奔走调停的陈真如已到广州，大概两方合作也没有什么条件，只是商量合作的办法。现在已有了一些眉目，即是南京须要把胡展堂和李任潮释放出来，同时两方面都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一二三届的委员都选出连任，更扩充名额安置历年有功之人。

我听了汪先生这番说话之后，我第一劝他这次不要当和议代表，第二劝他应该和胡展堂合作，我正谈到这里，汪夫人已看完日场的电影回来，一进门口见了我，便说：

"公博，汪先生都告诉了你广州的情形吗？我们真气死了！"

"公博还劝我和胡展堂合作呢！"汪先生笑着说。

"什么？你劝汪先生和胡展堂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汪夫人气虎虎的。

"我都知道，但我还是这种主张。"我坚决地说。

"好罢，我们下次再谈罢，我今夜还要赶回广州。"汪先生结束了这次谈话，我们跟着食饭，汪先生并叫我和孟余接头；

顾先生也是不能去广州的，所以留在香港。末后汪先生更叫我先到上海和宋子文接洽，我可没有答应。后来许久汪夫人告诉我，因我不肯先到上海，汪先生很不满意，大约汪蒋第二度合作，已在那里进行而且成熟了。

大概是十一月罢，陈真如又衔南京之命南来，一切条件已商量妥当，蒋先生下野，国民政府主席由林子超先生代理，行政院长本是蒋先生兼的，也辞了职，由陈真如代理，更把陈真如的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使得广东方面的人安心到南京。

汪先生果然又亲自出马当和平会议的代表，他临行之时，路过香港，又约我去谈话。

"我真不能和展堂合作。你知道吗？古勷翁他们对你实在猜忌之至。我临动身时，古勷翁卧病，他说要来送我行，我因为他病，倒去看他。勷翁和我谈了一阵，我说：'勷翁，还什么话呢？'他说：'我还有一句话，如果汪先生要和胡先生合作，必须要离开公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公博是共产党，汪先生不知道吗？'我说公博真不是共产党，勷翁长叹一声说：'汪先生，你给公博骗了！'这样，他们只和我合作，而不同我们的同志合作，怎么合得起呢？"汪先生长篇大论的说了一遍。

我听了古勷勷对我的批评，我真忍不住笑起来，我劝汪先生说："我们不要听古勷翁的说话算了，我个人是毫无问题，我看汪先生还是和胡先生合作有利。"大概当时也许是事实，也许是汪先生已具成见，也许汪蒋合作早在我回港之前已经成熟，我无论如何说法都说不进去。而且前几天我也见过孟余，他反复说明汪蒋有合作的必要，他说汪蒋在民十三四年在广州同负艰巨，虽然中间仳离，可是有过共同的历史。而且汪蒋

的左右多数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身，性格多数相同，比不得胡先生底下全是官僚，格格不入。我印证了汪先生夫妇的说话，不觉默然，算了罢，反正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我还坚持一己之见到底吗？不过我默祝，即使汪蒋合作，汪胡也不可再破裂。

我辞了汪先生出来过九龙，在渡船中正碰着伍梯云和傅秉常一群人也在船内，他们正过海去附美国邮船到上海。我见梯云坐在舱内，人很多，只和秉常在舱外的船面说话，我请他转达梯云，劝胡先生千万和汪先生合作。

在香港又住了一个多月，上海的和平会议已开，孙哲生又赶回来开四全大会，那时国民政府的主席虽然不知道定什么人，可是行政院由孙哲生组织，倒是双方同意。孙哲生在浅水湾酒店约我谈话，提出组织各部问题，征求我的同意任实业部长，而孟余则为教育部长，我答复他等我问问汪先生的意见再说。

那时汪先生已有电来，邀我到上海，南京方面朱益之、丁超五、周启刚，也联名电邀我到京，我这样便启程，京粤两方正忙着开四全大会，我两处都没有出席。我想将来问题正多罢，两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余，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

到上海时，和平会议早已结束了，中委也选出了，胡先生不止释放出来，而且已回广东了。

“你还主张和胡展堂合作吗？他反对你极烈呢！他劝我回广东，我鉴于在粤的气闷，实不愿回。最末后他说：‘精卫，如果你要和我合作，你必定要离开公博。’‘你为什么原因那样不能谅解公博呢？’我问。‘我别的都能谅解，惟有他在文章里批评我，我实在不能谅解。’”汪先生又反复的把胡先生临别的话告诉我。

“我主张汪胡合作是为着整个党的前途，并不为着我自己。胡先生反对我，最多我不能做官，他总限制不了我的活动。我的年纪还轻，可做的事业也很多，汪先生不要为我个人打算。”我又反复的想汪先生最后容纳我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第四届的全体执监委员要在南京开会，汪先生忽然患病　在医院，不能起床。在我的想象，汪先生若然不到上海则已，到上海终归要入南京。我很想汪先生和孟余在京主持党政，而我则留在上海办杂志，汪先生这一病，我的计划倒变了幻梦。我到医院辞行，汪先生谈了一阵，我便辞去，刚刚我到了房门口，汪先生又叫我转回，他卧在床上对我说：

“我还有一句话；你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是必要让他们一点。这班老先生的心理，我是很明白的。他们的心内说：‘你公博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年龄终归是我大，你不让我，我是不答应。’这样，我想既然合作，你就让他们一点罢。”

我那时也不好怎样回答，汪先生这番说话，我是感激的，然而我的确是一个敬老慈幼的人，共产党和第三党的朋友们不少在杂志的文章内公开骂我是温情主义者，是封建道德的

残余。大概汪先生是怕我和吴稚晖先生再吵闹罢，好！从此我真缄默不作声，看看我是不是象吴老先生所骂的“毫无忌惮的小人”！

南京是到了，有三个人我很难见面，去见他不好，不去见他也不好。哪三个人呢？第一个是蒋先生，我差不多是反蒋的急先锋。第二个是吴稚晖，在上海我们打笔墨官司，真是双方都头崩额裂。第三个是李任潮，我驱逐过他，而他又曾替我树立过共祸纪念碑。但中国真象谭组安先生所说，到了不了之时，自然就了。我们到南京，全住在铁道部的寄宿舍，蒋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找汪夫人，说他知道他们到京，本来是想来看我们的，因为铁道部人太杂，请汪夫人、孟余，和我三个人，至军官学校相见，这个第一重难关算已度过去了。

第二天夜里，蒋先生在励志社宴请全体中委，我突然碰见吴老先生。幸运得很，他坐近门口，而我远远坐在另一边。谁知等到席散之时，他老先生还站在门口不走。这太难了，难道他不走，我也不走吗，正走到厅心，碰着陈布雷先生，我差不多当他是救难符，拉着他说话，心中期望吴先生快快出了门，我好走。谙于世故的吴老先生，大约也知道我面嫩，笑吟吟的走到我身边，和我握握手，说：“公博先生，几时到的？”这把手一握，算是两家前嫌尽释，莫逆于心，这样第二度难关也度过了。

第三度难关跳得更容易，当全体会议的第一天，我到会场门首签到时，李任潮先生正在署名，两个人偶然一碰头，拉拉手，他说：“公博先生，你好吗？不见很久了。”这样两个人一起说话，一起入场，旧日的怨恨全算冰消瓦解了。

当全体会议之前，日本又进兵锦州，那时上海的学生全体到京请愿，一天竟打入了中央党部。真是全国沸腾，人心激昂，中央虽然还没有具体办法，可是国民政府主席倒已选出来，五院院长和各部部长也都分别选定和特任，这样广州非常会议就此结束，而国难也跟着一天一天的严重。

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

“一二八”之役自然将来历史有官书的记载，我这里所记述的是当时的情形，和政府的内幕。

或者，我要记述还是应该从汪蒋合作当时的情形叙起罢。我进南京之时，汪蒋到底合作的成熟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一概蒙在鼓里，或者因为我曾劝汪先生和胡展堂合作，所以汪先生不再和我商量。十二月底我到了南京，璧君曾约我和顾孟余到何敬之家谈过两次话，当时在座的有主人何敬之，和来客陈果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朱益之等几个人，那时原定国民政府主席举于右任，而行政院长选定孙哲生，那就是将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分给宁粤两方的意思，汪先生只愿意任政治会议主席，而不愿兼其他的实际职务。不过到了一中全会，主席团提出国府主席是林子超，行政院还是依照前议，至于中政会则设常务委员三人，即是汪先生、胡先生和蒋先生三位。

南京对于孙哲生长行政院大概早是不满意的，宋子文已有计划的打击孙哲生，他暗地里叫财政部职员全体辞职，来一个总同盟罢工。哲生对于财政了无办法，他知道自己兼，会塌台，因之还是征求宋子文，子文本来有计划的，当然不肯干，继之又征求孔庸之，庸之或者想干，但也为着他们的团体罢，婉转的拒绝。孙哲生没有办法，只好命黄汉梁署理，一切部长都特任，惟有财政部是署理，那自然整个行政院摇摇欲扑。

黄汉梁上台之后，一筹莫展，军饷本来早已欠了不少，只是在他半个月任内，就有一千多万发不出。至于政府的经费，只是实业部一部，原来经费是每月八万多元，黄先生一月之内只发过三万元支票，而这三万元支票当中，有二万元是空头，始终支不出。这样怎么干呢？单是财政一个问题，已够行政院倒塌了。

其次陈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汉口硬干一个方法以外，也提不出什么办法。他主张和日本绝交，这个案提出中政会讨论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能有力量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也能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

蒋先生在他的奉化故乡，发出通电了，他明白的反对对日绝交和宣战，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蒋先生既是这样主张，如果真是对日战争，他的军队当然不会打仗，张汉卿已

明白的不抵抗，阎百川刚刚由大连飞回山西，自然也无力打仗，这样如果真打起来，只有两广的军队了。两广的军队固然没有准备对外，即使有了准备，也不能以两省之众而敌日本全国之师，况且由两广调兵至北方，更是一件谈何容易之事。

财政无办法，外交上寻不出一条端绪来，孙哲生先生又怎样能支持下去呢？于是借着外交政策不行为名，一去上海便不再回南京，连带离职的还有内政部长李君佩先生、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铁道部长叶誉虎先生，甚至南京的市长马星樵先生也一去而不复返。南京真成了无政府的状况。

孙哲生能走，我是不能走的，第一，我们本来不是一个责任内阁，无连带辞职的束缚，况且他们事前一点都不通知我，而且又只是走而不是辞。第二，国家的事总不是一件儿戏事情，岂能发公子哥儿的脾气，连一个交代都没有。我们正在南京彷徨着，忽然听见汪先生由病榻一跃到了杭州会蒋先生了，我打了一个电报去也不回，隔了一天听说汪先生和蒋先生一齐由公路到南京了。这几天的变化，我真如坠五里雾中，事后汪先生对我说，他知道南京已成无政府状态，而且上海的事件又紧，不能不扶病到杭州，会见蒋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来。

汪先生突然到杭州，孙哲生他们绝对不能原谅的。他到杭州的前一天，冯焕章去见他，医院说汪先生病得很厉害，不能见客。孙哲生也去见他，医院还是拿病状厉害为理由，谢绝来宾。昨天还病重，今天忽然乘车到杭州，这是什么一回事，任你如何解释，孙哲生他们依然不能谅解。

南京政府正入了混沌状态，上海终于打起来，日本海军见了陆军在东四省建奇功，也想援例在上海来一次沈阳事

变。恰巧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死一个日本和尚，海军方面提出种种的过分要求，上海市政府都答应了，依然还要跃跃欲动。上海事件那样紧张，而孙哲生死也不肯回，于是在一天之内，便提出汪先生任行政院长，改组行政院。当时忙得要死，各部长也不及补人，外交部长由司法行政部的罗钧任暂兼，铁道部由我暂兼，而内政部则由汪先生暂兼，因为政府须要立刻迁洛。

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二十五六两天，各部都把重要文件装上火车，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出发。

当日各部部长没有行的仅四个人，军政部何敬之是留守南京的，自然不能走。外交部罗钧任要负外交职责，也只有暂留。交通部陈真如本来是京沪卫戍司令，也不能不坐着指挥军队。至于我呢，本来没有留的必要，但我真要看看怎样打法，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怎样的不同。罗钧任并且留着我帮忙他，我只交带次长郭春涛带着职员移洛办公，我留在南京看热闹。

我们四个部长约定每日在萨家湾外交官舍见一次面，以备交换情报，二十七中午，我们照例会见，何敬之没有来。

“真如，倘若日本海军真要打起来，你们是不是要抵抗？”我急切的要问个究竟。

“据高佬蔡说，上海打不得，那里没有阵地。将来要打，也必定要撤兵至真茹和南翔。”高佬蔡是蔡廷锴的浑名，真如解

释着。

"真如，你错了。你们除非不抵抗则已，要抵抗还是应该在闸北。你们以为闸北不是阵地，但日本人占了闸北，不来真茹和南翔，你们岂不是有抗战之心，无抗战之实。而且我承认这次上海战争，还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倘若在闸北不流一滴血，闸北必将变为日本的租界。"我把许多理由告诉真如。

"公博说的话很对，赶快打电话到前方。"罗钧任承认我的献议。

真如想一想，承认我有理由，即在桌上拿起军用电话打至上海找蒋光鼐：

"你是憬然吗？公博主张除非不打，打就要在闸北。你的意见怎样？"

"贤初也是那么主张，就这样干罢。"蒋光鼐停了一阵，在电话那一头答话，大约已得了蔡廷锴的同意。

上海的战争差不多成了定局，我们得到许多消息，都说日本海军非冒险行动不可，只是痴心爱好和平的人们，心里还挂着一线的希望。日本总领事送到上海市政府的要求，吴铁城市长都接受了，并且也正式道过歉了。据吴铁城的报告，日本领事馆也很高兴的告诉他，大概已没有什么变故，然而日本的外交岂是在领事馆手内的？一月二十八早上三点钟，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事前没有一点通告，进攻闸北，而十九路军也积极抵抗，掀起了上海"一二八"之役的民族战争。

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之前夕，已迁到洛阳，林主席驻节在洛阳的西宫，而蒋先生和汪先生则乘了专车到徐州，听见上海

战役已开了衅端，又折回至浦镇。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过江到浦口去见汪蒋两先生，说也滑稽，上海两军不管日夜炮火连天，日本陆军陆续由日运送上海登陆，吴淞和闸北横被轰炸，而湾泊南京的日本兵舰依然安详的浮在长江的水面，我们每天过江都绕过日本兵舰面前，而中国的海军也行若无事的，相对着象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夜，日本兵舰毕竟炮攻南京的狮子山了，我虽然住在安铺营，每夜都睡在罗钧任的家里。他那里有军用电话，每天战况均有详细的报告。我们正在饭后，忽闻隆隆一声炮声，那不是大炮吗？我们走出天阶，看见天际火光又闪烁一下，来了第二炮，接连着放了几炮，便又寂然停止。何敬之的电话来了，说日本兵舰在开火，他正在调查开炮的原因，至于狮子山炮台方面，决定暂时不还炮。到了夜半，第二个报告又来，说有人对日本兵舰通岸的浮桥掷手榴弹，所以日本兵舰开炮。夜太深了，让军士警戒着，明天再说罢。反正几条日本兵舰占据不了南京，可是南京那时真是在唱空城计，除了宪兵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军队来拱卫这个首都。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罢！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象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

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罢。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上海的战事，十九路军的确没有方法支持了。蒋先生虽然调了张文伯的第五军参加，然而兵力还不够使用，共产党趁着江西的军队向下游移动，乘虚而人，占领了抚州，蒋鼎文那师由赣东调至浙江以赴上海之援，沿途也被共产党邀击，未至杭州，而十九路军已退。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

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经各国公使的努力调停，上海算是停战，而且开了和平会议，终于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那个协定，只有请读者翻正史，恕我不赘述。协定签订之后，我们的外交次长郭复初给人打破了头，一班所谓人民团体的代表，对于停战愤愤不平，他们只知停战之可耻，而不知军事之无法，大家去见郭复初要求说明，把一筒纸卷的铜圆，掷在郭先生的额角，使郭先生进了几天医院，至今额上还留了一条纪念痕，来纪念他此次在折冲坛坫的功勋。但有什么要紧呢，郭先生为这一掷，后来立刻做了中国驻英大使。

日本算是胜利了，在虹口公园开了一个祝捷会，在会场上给高丽的革命党投了一枚炸弹，白川大将送了命，重光葵公使送了一条腿。重光葵还不错，虽然卧病在医院，刻刻还希望和平，至病好离沪之时，还谆谆的说话，希望中日早日恢复和平。我心里想这位重光葵先生，还算得上一个政治家，虽然受伤，依然维持他的远见。自此上海又歌舞升平，直至廿六年八月又沦入血海。

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

民国二十二年新年的某一夜，我正在上海的意大利公使馆食夜饭，人数只不过十来个人，夜饭刚完，齐亚诺公使接到一个消息， 上显著不愉快。他拉着我到了他的书房，说日本军队已占据山海关了，这消息是山海关意军拍电到上海意国兵舰报告的。我立刻离开公使馆，当夜即回南京，而南京的情形，立刻浮现着紧张空气，可是大家犹是等着，看看张汉卿的态度，因为没有得张汉卿同意之前，南京是不好动兵的。

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张汉卿到底肯动员，万福麟也立下了遗嘱，督师向滦河出发了。不到两星期，万先生没有到前线，便已退回来。至于滦州方面后撤的抵抗部队，步兵倒变了骑兵，他们去时是走路，回来掳了老百姓不少的骡马当坐骑。

汪先生这时又忍不住，一听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又从欧洲跳回来。原本汪先生在去年的夏天，因为张汉卿不肯动兵出关救热河，愤而通电辞职，到欧洲养病。那时我恰有事赴上海，临行知道汪先生要北上，和张汉卿商议出兵援汤玉麟，曾通知罗钧任，如果汪先生要飞北，请他通知我，以便同行。谁知疏忽大意的罗先生，他竟直和汪先生与宋子文一声不响的飞北平，绝不给我一个电报。汪先生是到了北平，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大概张汉卿或者是托大，或者是难于

答复，总推着病不接头。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汪先生这一气非同小可，此来专为商议军事，而结果落得一个无聊。他知道张汉卿已是没有希望，匆匆回到南京，遂通电辞职。这次山海关又失，他老人家再也忍不住，又匆匆由欧洲回中国。

张汉卿这次退兵，虽然兵败而将不亡，他再也不好意思留在北平，于是通电下野，准备出洋到外国。临行之时，把河北的主席王树常免了职，换了非东北籍的于学忠，把察哈尔的主席刘一飞免了职，换了非东北军的宋哲元，他的意思是表示大公无我之心，顺便企图为收拾人心之计。部署定了，一直至上海预备出洋，并且挨了一个多月非人的痛苦，请了美国的米勒医生，把吗啡针瘾硬行戒断。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耽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真除，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罢。

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的人物首当其冲。当汪先生离国的前后，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子文也很高兴，准备登台，对于行政院的副院长，自然子文非预先找替身不可。一夜我在罗钧任家里喝酒，忽然子文到了南京，用电话找到我的家里，又追踪我到罗钧任的家里。我和钧任倒喝得有七八分醉意，踉跄走到鸡鸣寺的山顶子文家中，子文拉我出阳台，他说：

“公博，你看什么人最适宜当副院长？”

“最好是黄季宽。”我极力推荐。

“黄季宽怎么行？他不能代表汪先生。”子文质问我。

“季宽近来得了蒋先生的信任，而且汪先生也有许多事和他商量。”我还推荐着。

“可不可以再想想？”子文追着问。

“我的意思，第一是黄季宽，第二是黄季宽，第三也是黄季宽，若要找第四人，那是顾孟余了。”我依然坚持我的意见。

“黄季宽不必提了，孟余也未必肯干，他也似乎不适宜干。”子文说罢便默然。

第二天早上子文赶至牯岭和蒋先生商量，他们谈什么话，自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但他出来之后，对澳洲的朋友端纳说：“什么都完了 All is finished。”完的是什么呢？自然蒋先生不答应子文当行政院长，终汪先生的出国期间，行政院还是由子文代理，显然的等着汪先生回来，对日缓冲，这样汪先生回国，那有不再干行政院之理？

汪先生回国，我们照例是到上海欢迎的。我到码头稍为迟一点，汪先生已换了小轮从别处登岸。他留下汪夫人等我，一直把我送到贾尔业爱路另一所地方。我到达之时，汪先生和孟余均已在座。汪先生首先提出行政院问题，说他准备辞去不干，聪明的顾孟余也跟着汪先生说行政院不能再做，汪夫人更声色俱厉的阐明行政院不能干的理由，我只保持着缄默，一声不响。

“公博，你的意见怎么样？”汪先生忍不住。

我不觉笑起来了：“汪先生的理由很充足，汪夫人和孟余

先生的陈义也很高，可是据我看来，太不切于实际。你想汪先生出国几个月，行政院始终没有换人，显然的蒋先生不愿他人干，至于什么理由，我姑且不去分析。这样汪先生出国，行政院还不换人，那有今日汪先生归国，行政院倒去换人之理？而且汪先生这次归来，岂不是为着山海关丢了，所以急急又来共赴国难吗？赴国难是要负责任的，今日回国，而不负责，对外又将何辞解释？自然谁干行政院都倒霉，而且一个内阁的最大作用是军事、外交和财政，今日军事汪先生是不能过问的，蒋先生的外交情报又多不到外交部的，财政更由子文一手把持，连问都不许的：这样的行政院，又哪能再干？可是不能是一件事，不能不干又是一件事。这是我的意见。”

“你这样爱干，你自己就干去。”汪夫人大声的似斥责。

“如果汪先生到南京提出我当行政院，而又通过的话，我不干是忘八。”我反抗着。

“你不用吵了。”汪先生对汪夫人抑制着，“公博的话未尝无理由。”

这个谈话便结束，汪先生回到南京之后，重新又干行政院。我一天碰见汪夫人，和她开顽笑：

“你不是拼命反对的吗？怎么你又不作声呢？”

汪夫人只愕然一下，再不答话。我心里想，原来汪夫人那天的造作是哄我的，我为什么不学孟余，也赞成汪先生辞职，他自己干不干，我乐得一点都不负说话的责任。

张汉卿下野之后，早离了北平，蒋先生亲自北上，到了保定，中央军调了四师人至长城各口，并已经命军政部长何敬之兼了北平军事分会的代主席。长城各口战事正紧，汪先生

便叫我北上劳军。我欢迎汪先生时，到了上海，那时情形，恰象上海战争时的平津，地方依然匕鬯无惊，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一切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还是纸醉金迷，肩摩辐凑，我叹了一口气，中国就是那样一个国家。我的火车过黄河，雪正飘飘打满了车窗，我一时感触，胡诌了两首诗：

“去年海上角声哀，今又征鼙动地来。还是江南风景好，梅花依旧及时开。”

“风雪萧萧寐不成，每逢危难赋长征；黄河渡口冰初结，关外遥知已鏖兵。”

我刚到北平，何敬之已使人催我见面，我食了一顿早餐，敬之已有三次电话来。迨我到居仁堂时，敬之和季宽已在座，季宽虽然是内政部长，他是一个军人，那时已奉蒋先生的命令，勷助北方的军事。

“公博先生，你来得很好。今天请你替我们做一件事。”敬之央求的说。

“什么？”我有些愕然。

“各路军队都败下来了，打败仗不要紧，他们已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宋哲元的军队已撤过了长辛店。这样实在太丢人，所以我想你今天说几句话。”敬之说。

“你的命令还不听，难道他们听我说话吗？”我还不明白。

“不是这样说。我要你对他们说，中央已有办法，不要他们作无谓的牺牲，这样他们的心便安稳住了，不至于大家忘命的逃跑。”原来敬之要我做的是另一件事。

“我是奉命劳军，只能说激励将士的话，我哪能空口提出无根据的和平？”我实在不愿撒谎。

“事到今日，也不能不劳烦你了。敬之显然进退维谷。”

“这样我要砍头的。”我还推辞着。

“如果中央责备你，要砍头大家一起砍罢。”敬之和季宽齐口合声敦促我。

这真出了我意料之外了，为要稳住军队，我只好担下血海的关系。那时我想打个电报给汪先生也不行，因为何敬之拖住我食午餐，一点钟各将领便来，我真是分身不出。午餐刚完，各将领都顶盔贯甲的齐到，他们还嚷着前敌怎样的胜利，他们的军队都在扎硬寨打死仗。

“今天请诸位来，没有别事，只因为陈部长奉命北上劳军，并带了中央的旨意来宣示，请陈部长给我们说几句话。”何敬之说了几句开头语，登时满座浮现出严重的气氛，一切的眼睛都注视着我，满充了疑骇的目光。

“兄弟今天奉了中央之命来慰劳各位，诸位同志都劳苦功高，中央非常之挂念。自然今日军事很紧张，前方将士浴血苦斗，奋不顾身，这不独中央欣慰，全国的人民也属望于诸位深且切。不过中央还有一个意思，即是我们以血肉之躯而与钢铁相拼，中央也不会叫诸位作无谓的牺牲，最近期间中央当另行想出一个适当办法，使各位不至于终久困苦的。”我那时已变了一部机器，专靠着何敬之在那里转擎。

我那番说话真是不得已的，并且也是言不由衷的，但为稳定军心，我又有何法可想？我说了这番话后，万福麟先生首先眉心起了笑容，其余一切人等都露了愉快的颜色，大家虽还在矜持，禁不住松了一口气。

这样混了两个钟头，我真坐立不安，回至旅馆之后，立刻

给汪先生一个电报。何敬之夜里又催我回南京，说这边真相，非简电所能详，要我亲自回京报告，请中央急行设法。至于北平呢，何敬之打算留下一师中央军死守，万不得已时，与城共存亡，并且打算埋下炸药和煤油，待日军进城时，首先从紫禁城焚起。

我看那时真不能打了，军事我不懂，前方我也没有去过，只有三件事，我觉得很滑稽；其一，北平夜间每夜宣布戒严，把人力车、汽车截在街上过夜，而日本的军官倒坐了电单车，到处横冲直撞。因为北平戒严，照例要对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送通行证的，中日没有绝交，日本也有公使馆，我们还得送通行证，因此日本军官可以在戒严时期，通行无阻。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戒严，当然是对付日军，今戒严戒不到日本军官，而单戒了本国的人民，这次仗从哪里打起？其二，我们军队源源由北宁路输送，而北宁路照例要经过塘沽。为着辛丑条约的关系，塘沽就有日军驻扎，日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拿着一本日记册，对于我们的军队往来运输，人数若干，番号什么，军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紧是使敌人不知自己的虚实，现在军队输送，一一要经过敌人的眼睛，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其三，最滑稽的，于学忠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陪他们去看壕沟。唉！这样滑稽，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我回至南京对汪先生陈述之后，我贡献一个结论，即是，要打得要大规模的打，正式的打，这种零碎的仗，非正式的仗，不要再打了。

蒋先生得前方的情报，当然比我们更清楚，中央军虽勇，

敌不住日本的大炮和飞机。长城各口在张汉卿手中，本无工事可言，中央军队到了之后，草草做些工事，大炮一来，全给毁坏了。还有最痛心的事，前方将士还没有看见日军的影子，便先做了牺牲品。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没有日军的那么远，纵有少数大炮，数量也比不上日军那么多。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罢。

南京讨论了一回，打算成立一个北方政务委员会，以便和日军折冲，人选问题，着重在黄季宽，因为季宽早已在北方，而且以内政部长兼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也似乎合理。商量停妥，汪先生遂提出于中政会，但我到会之时，使我吃一惊，政委会的条例依旧，而人选已换了黄膺白。那又变卦了！恰好汪先生坐在我前一行，我写张条子给汪先生，问何以人选变了，汪先生在那张小纸批了几个字："改提黄膺白完全出蒋先生之意。"中政会许多人看见黄膺白三个字，一时哄起来，首先站起来的是罗家伦，他不好反对黄膺白，只说北平无设立政委会之必要。跟着罗家伦说话的又有几个人，当时局面，真是僵化。汪先生从前行又递过一张条子，说："兄刚从北回，请多说几句话。"我为着缓和这个僵局，并解救汪先生的困难，不得不站起来解释。我也不好护持着黄膺白，因为我那时根本就和他没有见过面，只申述许多理由，北方政务委员会有成立的必要。经过我这番解释，这个提案算是通过，其实我就不解释，这个案还是要通过的，黄膺白之提出，谁不知是蒋先生的意思，不过大家要使黄膺白难堪，特意捣这么一个小蛋。

黄膺白被任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逗留在上海，

迟迟不行，前方军事又那样紧急，日军越过滦河，长城各口相继陷落，我们真是急极。后来我们打听，才知道膺白先生正在和日方的宫内大臣接头，因还没有回话，所以在上海老等。

迟之又久，膺白才北上，东京的宫内大臣是否有了回话，而回话的内容又是怎样，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膺白经过天津，在车站上还吃人打一枪，幸而遇刺不中，他终于到北平就了北平政务委员长的职。

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福建的人民政府，虽然还没有后来陈伯南先生失败快得那样滑稽，但也够使人骇愕和可笑。由他们起事时始，以至失败时止，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主张，他们有什么把握，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那样快。

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人物，自然是我的老朋友陈真如，但真如原本是拥蒋最力的，忽一变而为反蒋，这其间原因很复杂，有些关系主观的，又有些关系客观的。真如的个性，志大而才疏，好高而骛远，他原是一个好好的军人，但因为志大才疏，以为天下事不足平，中国的政治非他出来治理没有办法。因为好高骛远，于是许多共产党和第三党失败下来的人物，一时麇集其门，时时拿理论去煽动他，拿领袖去引诱他，于是真如很想取蒋而代，甚至乎以为国民党的政纲和政策还不够。

至于客观方面，蒋先生有许多事实，使真如感觉不安。在蒋先生眼中，真如是一个有力和有识的军人，真如在广东还当师长时，蒋先生就有许多事托他主办。他赶许汝为，事前和他商量。招致唐孟潇加入国民革命军，派他当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广东。而真如呢，的确也替蒋先生卖尽许多气力，宁汉分裂，真如宁可放弃了他的军队，也不赞成武汉而走南京，张桂军围攻广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军之力，才反败为胜。

蒋先生在扩大会议之时，真是精疲力尽，也全凭十九路军恢复济南，才重安北方之局。似这样大家推心置腹，不应该凶终隙末了。可是在宁粤复合之后，真如以调人之功，颇有举足轻重之势。京沪卫戍归十九路军了，陈真如并且当了行政院副院长而兼交通部长了，而且行政院各部的部长，布满真如左右的人，除了陈孚木做交通次长外，实业部的次长许锡清，教育部的次长段锡明，内政部的次长罗贡华，甚至乎国民政府的参军长吕超，上海市的社会局长麦朝枢，都和真如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样情形，真合着古语所谓势倾朝野，自然非蒋先生和他左右所能忍受的。

自十九路军抗战之后，蒋光鼐和蔡廷锴更成了民族英雄，海内外耳有听，听十九路，目有视，视十九路。各人只知有十九路军，而不知有黄埔，只赞扬陈真如，而不赞扬蒋先生。因此连参加沪战第五路的张治中的黄埔军队也被埋没了功勋，还有许多不满意于蒋先生的人们，专在那里作幼稚宣传，说蒋先生本来就不抗日的，说蒋先生始终不肯以实力援助十九路，后来并且说十九路之失败，完全为蒋先生所阻挠，这一下更非蒋先生所能忍受了。

沪战停止之后，蒋先生曾和蔡廷锴谈过一次话，暗示蔡廷锴要脱离陈真如，蒋先生这个手法不独使真如感受彷徨，整个十九路也起了恐怖。兼之蒋先生的嫡系部队，逐渐向南京附近集中，这或者为拱卫首都，或者为便于训练，但军人的感觉究竟和文人不同，十九路已不敢再卫戍京沪，亟谋脱离京沪范围，极力运动往福建屯驻。

在十九路军正酝酿离沪前后，我在上海曾和真如见过面，

劝他不要作奇想，他说："你怎么知道，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被解决了。"

"十九路军是有功于国家的，蒋先生敢冒这大不韪吗？"我表示不相信。

"蒋先生什么做不到？"真如表示对蒋极端的不信任。

我知道这时真如已为利害和环境所困，我的话再听不进去了，末后我又和他开玩笑：

"我们反蒋，你还帮他打我们，现在你又要反蒋了，当心你还象以前的一般人被蒋先生各个击破。"

虽然我知道真如有异志，我还是留着他所推荐的许锡清先生在实业部，他虽然提出两次辞职，我还是苦留他，终于一天，他不肯再留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我问许先生。

"大概他们快动手了。"许先生也很坦白。

"他们真要动手，你辞职还不迟。"我劝他。

"那时恐怕走不脱。"许先生表示着坚决。

"你们打算用什么名义动手？"我又追问。

"这个我还不知道。"许先生真是不知道的。

"算了罢。"我替许先生分析："现在动手，无疑的一定要失败。如果不成立政府，必师出无名，要成立政府罢，有两个不可能。第一，政府是有纲领的，我敢担保，真如提不出什么纲领。第二，福建单独必不能成功，其势非联络两广不可。广西是不敢发动的，如果陈伯南不答应，广西是不敢发动的，但陈伯南现在那样舒服，肯冒险么？他不满意胡展堂，便捧出中央，不满意中央，又拿出胡展堂，他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再戴上

一顶大帽子。

"你们如果请我做参谋长的话，快不要说反蒋。现在明明白白摆出一条好路，你们连合闽粤桂三省的兵力，其战斗力实不可侮。倘若三省一齐向江西共产党进剿，共党一定崩溃，这样你们一有剿共之功，二得天下之望，至时大可向中央摆出改革政治方案，何必要反蒋呢？"

许先生只笑了笑，因为他知道拿这种书生之见以劝真如是没有用的，而且或者他自己根本不敢说。许先生辞了实业部次长不久，又被任为福建的财政厅长，我想福建或者一时没有变故罢。

一夜十点钟，汪先生忽然打个电话来，说要来我家坐，我情知有大事，但还想不到真如居然到福建。

"福建已动手，你知道吗？"汪先生坐下便说。

"我还不知道，他们怎样干？"我问。

"情报还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已动手，今早他们已开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华民国改了中华共和国，并且成立人民政府，把国旗也改换了。"汪先生告诉我大概消息。

"他们一定失败的。"我立刻判断。

"我们走不走呢？"汪先生问我，因为我们初进南京，即立誓不赞成再有内战，蒋先生再发动内战，我们决定辞职。

"我以为我们不必走。因为这次他们干法，与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不同。他们改国号，改国旗，我们在南京固然反对，不在南京也应当反对，甚至乎我们逃亡海外，也得反对。既然都是反对，我们何必走！"我分析着。

这一席话算是决定我们不走了。事后我们知道陈真如还

拖着李任潮和徐季龙回到福州，任潮只知道他们要干，但怎样干法，他事前毫不知道。那天开人民代表大会，所有代表固然东拉西凑，不啻摆了一个诸仙阵，任潮当了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主席，见黄琪翔演说太赤化，还在后边警觉他，说："琪翔，不要太红了，不要太红了。"琪翔先生不只是太红，并且在身边扯出他临夜预备的新国旗，即在场上一哄之下通过。这次改旗，恐怕事前知道的没有几个人，做大会主席的李先生不知道，自然被邀参加大会的民众更不知道，十九路军自师长以下各军官也一概不知道。

失败是注定的了，蒋光鼐先生还对人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们要不干，真如就要自杀。横竖十九路军是真如的家当，他要拆散了，我们也只好由他。"

十九路军的官兵，对于人民政府成立，都莫名其妙，对于更换旗帜，更一致的反对。真如固是志大才疏，蔡廷锴更粗心浮气，他估量蒋先生最少要二十多天才能派兵到福建，他还很逍遥的到闽南阅兵，谁料只在人民大会开会的一个星期内，蒋先生的军队已开到了福建省境，并且占据了军事据点了。

一般官兵，一枪不响，散的散，降的降，陈蒋蔡三位先生分路逃出福州，其他代表早已纷纷离开，这一场的滑稽戏就这样结束。

真如这班人失败那样快，大概不出几个原因。第一，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并也提不出什么纲领，人民政府几个字对于民众实在面生可疑，中华民国何以一定要改为中华共和国，不止一般民众不懂其中真谛，恐怕连发起人的众先生们也都说不出其中道理。第二，中国那时真是民心厌乱，南京若

无很大的罪状，无人愿意附和。第三，那时十九路军以抗日为号召的，他们处在福建，迫近台湾，非和日本妥协，难于发动，这一点实在陷真如于两难论，无从解释。第四，真如首先和共产党妥洽，这或者是第三党的政策，那时江西的共党虽然还是声势煊赫，然经过经济的封锁，食盐和布料发生极大的恐慌，真如首先送了许多盐和布与共产军，但赶到福州人民政府发难之时，共产党动也不动，使十九路军独蒙军事的失败。第五，也许是历史关系罢，十九路的前身是第四军的第十一师，而第四军的前身是邓仲元、邓铿的第一师，它和国民党有深长的历史，一切将领都受过国民党的洗礼，现在不要党，还要换旗，使一般将领都怀疑，都反对，因此不旋踵便烟消云散，只便宜了蒋先生多得了一省，而十九路在沪抗战的英名，至此仅留下了一个陈迹，而军队则根本消灭了。

二十三年春天，我往南洋视察实业，路经香港，真如托了一个朋友来见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会面，政治是另一问题，而交情犹在，怎么不可以会见？一夜我们又回复旧时的生活，衔着烟卷，东拉西扯谈天。

“你为什么这样冒失，干下了这样荒唐的事？”我对真如是不客气的。

“还谈什么？自然我失败了，你批评我冒失。倘若我成功了，你又会称赞我聪明。”真如勉强着解嘲。

“我不是批评你失败，人家失败还打三两仗，惟有你失败，连一枪也不响，这又何说？”我真替他抱不平。

“那是高佬蔡要负责任，我几次和他商量集中军队，他总说老蒋的军队没有那么快来。我到福建之时，曾要他召集军

事会议，他也说不用，他个人就可以代表十九路全军，要问大家，倒不如问他一个人。唉，已失败了，还更有何说！”真如那时十分的沮丧。

一个冒失的陈真如，加上一个粗率的蔡贤初，又加上一个荒唐的黄琪翔，那福建还有不失败的吗？更那有失败不快的吗？我也再没有话可说，自此真如已另起炉灶：组织他的社会民主党，又组织一个革命大同盟，直至八一三上海第二次抗战，蔡贤初首先到南京，陈真如和蒋景然跟着也来聚合，我劝他取消了他们的组织，反正他们的组织也不过那样一回事。以后我出使欧洲，回国之后，在汉口差不多每日和真如见面，他也不谈军事，也不谈政治，只埋首学做诗，发发牢骚，寄寄清兴，我对于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也只字不提了。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那天是开六中全会的第一天，闭会之后，赶着要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早上很象有点先兆，大凡开大会，差不多刻板的，七时到紫金山谒陵，九时行开会典礼，跟着开预备会

议。开会典礼之时，中执会推定汪先生演说，程序上原定有默念的，司仪的人员大约忘记了，喊着演说，张溥泉先生大概抵不住，连声呼喊司仪人，可是那时汪先生已步上台上，听闻身后有嘈杂的声音，许是一时神经感受不宁，在演说时候，神色是苍白，声音是颤抖，汪先生最擅长于演讲的，今日到底为什么，台下的人们无不怪诧在那里揣想。

演说完毕，照例又是摄影了，中央委员全集在中政会新厦的门首等摄影，蒋先生迟了不来，中央党部的职员催了两次，末后说蒋先生已上了楼，不来了，摄影师才动手拍照。我和黄季宽同站在大厦门首的右边极端，因我记得汪先生十九年底对我诰诫，凡事须要让让老先生，所以每次摄影，我都站在最后一排，或者站在两翼的末端，总不肯和老先生们挺着胸脯站在前列，在镜头前显着威武。

摄影刚完，人便嘈杂的乱动，大家回身上石阶预备入会议室开预备会。我知道要有一回的，横竖不是立刻开会议，我们何必忙，我在身上掏出一包烟卷，自己衔了一枝，又给一枝黄季宽，正在划洋火，忽然听见连珠的枪响，我发梦也想不到有人开手枪。

"为什么今日放起鞭炮来？"黄季宽很诧异的，他原本是一个军人，这时连手枪的声音也辨不出。

"我也奇怪，实在没有必要。"我吸着烟卷，意思是等这枝烟卷抽完了，才上会议室。

一时参观摄影和参加典礼的人们，象潮水般涌出，又象波浪般分散，我的经验从下意识透出来，使我知道有奇变。人群刚涌散，朱骝先先生已气喘败坏的从石阶走下来。

"什么事？"我问。

"有人打张静江先生。"骝先说毕便走开了。

跟着骝先过来的是张汉卿，他见了我，说：

"凶手拿着了，我一拳把他的手腕击倒，手枪跌落地，拿了他了。"他说完也走了。

"等一等罢，季宽，抽完烟再说。"我向着季宽说，我的心里，既以为人也没伤，凶手已就获，我们大可以不必急迫。

砰！砰！又听见两声枪，我眼见大厦门首空地上睡着一人，警察还要拿驳壳枪打他，我急步上前止住警察：

"不要再打，我们还要问口供。打死了，哪里得凭据！"

我说完之后，回首已不见黄季宽，我步上石阶，曾仲鸣朝着门外冲出来，额角有一块血迹。

"你受伤吗？"我那时有些着急了。

"不是我，汪先生受伤了。"仲鸣说了便走。

我上了石阶，铁栅已关闭，六七个警察露出了驳壳守卫着，我一入门首，汪先生斜睡在地上，面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全染透了鲜红血。汪夫人屈一只腿跪在汪先生的身旁，和汪先生把脉搏，蒋先生也屈了一条腿在汪先生的右边，把着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汪夫人很悲愤的，但还沉得住。

"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要你单独完全负责了。"汪先生气有些喘，说给蒋先生。

我那时非常之焦闷，也悲愤，那时我如果有一根手枪在身旁，也许打一个人。但也奇怪，我时时都携有手枪的，独这一

天没有带。

“公博，你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打电话找医生，并请你赶快通知金陵大学的何文杰。”汪夫人催促我，何文杰是她的未婚婿。

我上楼之后，摇了几次电话才把中央医院的先生们说通了。末后又打电话到金陵大学，好容易才通知教务室去找何文杰。把所有的电话弄通，已经有十多分钟，我下楼之后，汪先生还睡在那里，蒋先生和汪夫人还依然站在一旁，可是人数已减少很多，中央秘书处把各委员都请上楼上，是使伤者得以安静的意思。我忍不住又走出新厦等医生，那时全院真是鸦雀无声，凶手还呻吟着睡在那里，间有一两个工人伸出头在窗外探望，面上都深刻着大难将至的神色。又过了五六分钟，中央医院的医生和救护车才来，他们在裹扎汪先生，我也上楼看看是不是开会议。

楼上会议室也充满了严紧的空气，只不过加上嘈杂的人声。我看各人面色最忧郁的还是阎百川，他自从和蒋先生破裂之后，这是第一次到南京，一碰就碰上这次奇变，他心中自然比什么都难受。这时又听到当时凶手放了三枪，便给张溥泉拦腰抱住，否则或者要放多几枪。为什么当时误会张静江先生被刺呢？原因张先生本不良于行，也不良于站，摄影时也坐着一张椅子，事变一起，他便滚倒在地，各人一时以为他被打倒了。还有孔庸之先生，他也来不及走进门中，他急得往旁边的汽车下一滚；只是急迫起来滚进去容易，迨从容时爬出来就难，他的随从费了许多工夫才把他拖出来，一件马褂的袖子，扯开了两半。

那早会议还是照常进行，散会之后，对于凶手的来源已有些眉目。那个凶手名唤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员。晨光通讯社成立已一年多，军警到社搜捕时，余党早已远飏，只剩得几件破家私，和一堆纸灰，那是秘密文件烧毁的痕迹。晨光通讯社在市政府请求备案的担保人还是实业部两个职员，当中一个是郭春涛的堂弟，这两个家伙对于晨光社的背景一些也不知道，真是代人受过的两个傻瓜！

汪先生被刺消息传出后，闹得全国风雨，上海更盛传我也在被刺之列，北四川路还有些外围报馆，把我的照片搜出来，挂在窗外来充实它的新闻。中央党部是什么地方？那天开六中全会又是什么一个日子？在军警森严之地行刺，除了蒋先生自己的特务队，还有何人？这不独大家在那里证实，而且广西的李德邻和白健生来电正式质问了。蒋先生自己也怀疑着，第二天下午找我和顾孟余、谷正纲、唐有壬，到军官学校谈话。

“我看这件事不是自己人干的，因那种子弹不是配那种的手枪，而且他们所用的手枪也不是那一种。”蒋先生解释着，他所谓自己人，自然含意甚明，实在当时他也失了自信。

“我看也不是自己人干的。因为自己人要干，随时可干，何必在中央党部，更不必在开全会那一天。在中央党部干这行刺事情，很明白要打击国民党。不过有三点要请蒋先生注意的：第一，这次行刺是有组织的阴谋，因为晨光社成立一年多，阴谋的酝酿最少也有一年的长久。第二，看凶手身边仅有几块钱，可以断定这组织是没有大笔经费，大凡凶手行凶之后，没有不想脱逃，现在他的身边仅有此数，想来那组织也不见得充裕。第三，既然这次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晨光社居然在京混

了一年多，那就可以判断他们还要继续施行他们的阴谋，并且在京的组织恐怕不止一个晨光社。”我大略把这次事件从客观上分析一下。

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蒋先生对于他的特务队很怀疑，一次他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说：“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果然不到几天，晨光社的社长兼主凶贺坡光，从镇江捉到解到南京，另外还捉了许多人，关在监狱，等候裁判。凶手们的供词，我始终没有机会窥其全文，仅知道和前几年的福建人民政府有关，据说那班凶手久无成绩，总机关要撤消他们经费，所以那天孙凤鸣见了蒋便刺蒋，见了汪便刺汪，倘蒋汪都不在，也随便放几枪，打倒几个中央委员算数。这个刺汪案一直至汪先生二十六年一月回国还未结，汪先生还上呈文国民政府，请求特赦他们，这班人后来怎样处置，我一些也不知道。

汪先生的枪伤，中央医院始终取不出子弹，就是左额的子弹也等到德国医生诺尔从绥远飞回来才取出，至于背后的子弹，在上海时给牛惠霖开一次刀，也找不着子弹所在地。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印象，是在开五全大会时，汪先生所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蒋先生无法帮助选出，彭浩除和郭复初两人也是在选举之后，蒋先生用主席团名义，提出补上。汪先生所想举出诸人不独没有预期的被选，原来属于汪先生一系的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一致落选，还有唐孟潇则得一个候补委员，他的部属何键和刘建绪倒高高在上。

汪先生于二十五年二月离国养病，我劝他回南京一次才

起行，他也不采纳我的献议，悄然离沪，启程之后，才留给我一封信。行政院长怎样办呢？汪先生正式辞职，蒋先生也正式登台，在此交替之中，还有一段小把戏。一天蒋先生找我到军校谈话，说行政院只有汪先生和他自己才能负起这个责任，他因军事不能兼顾，意欲任顾孟余为副院长，在汪先生出国之时，以副院长代行政院长的职务。

"孟余是不会干的，倒不如请蒋先生任命孔庸之或何敬之代理。"我知孟余一定拒绝的，所以诚恳的献议。

"无论如何，也请你走一走，征求孟余的意见。"蒋先生说。

我第二天附飞机至上海，至明故宫机场候机时，宋子文也恰来趁他包定的飞机。"公博，你到上海有什么事？"宋子文问。我告诉他，我奉蒋先生之命征求孟余同意为行政院副院长。

"Honest 诚实的吗？"子文用英语对我说，禁不住笑起来，我也笑了。

孟余对于副院长自然一口的拒绝，我复了蒋先生的命，任务便算完毕。行政院整套角色都换了，民国二十四年底的新行政院成立，又是一番新气象。

最可叹的，汪先生这次被刺，还有许多人在心内喜悦，更有些人在口上批评，例如立法委员楼桐荪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为民族英雄，大有可惜张良的博浪一击，误中副车之势。据我的分析，汪先生被刺，最少有几种人高兴，一种是共产党，一种是人民阵线，一种是福建人民政府遗下的人们，一种是蒋先生底下的从龙之士，又一种是盲目被人宣传者。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是反对整个国民党的，国民党内有力的人被刺，无论是谁，终归是快意的。福建的人民政府失败之后，

都结怨于南京一群人，蒋固然是他们所恨，汪也是他们所恨，因汪不在南京助蒋，则蒋未必庞大起来，这次行刺的凶手纵使不由他们遣派，如汪被刺，在他们视之也是一件痛快之事。至于蒋先生底下的人们，在上级的人比较能知大体，下一些的所谓青年后进，以为汪在，蒋终不能独尊，还有揣摩风气的，反汪虽然或者会被蒋先生痛骂，但一定必为蒋先生所喜。而且陈果夫和陈立夫两位先生门下的所谓二陈派，和改组派斗争了许久，一有机会，还企图进攻，那个楼桐荪先生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至于一般受盲目宣传的人，以为中国应该立刻和日本宣战，中国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东四省，还可以直捣日本的东京，南京对于这件便宜顺利的事不肯干，就因为有一个汪精卫在那里做秦桧，大家差不多以为汪先生一去位，中国便立刻可以宣战，日本便崩溃了。

要而言之，汪先生自从民国二十一年进南京，差不多自己替自己掘下一个大陷阱，他固然极意的表示亲爱精诚，竭力合作，然而汪蒋之间，还有重重的隔关。我呢，第一次汪蒋破裂，结果也是汪蒋合作，第二次汪蒋破裂，结果也是汪蒋合作，那么我难道还干第三次反蒋的急先锋吗？而且汪先生每逢汪蒋合作，差不多唯蒋先生之言是听，别人的说话，他不但不会采纳，而且认为破坏，我还是沉着一些，诸事不问，且把中国的经济干出一些眉目再说。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

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那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不愿大张旗鼓的做党的总理和总裁，不过他自己虽然不愿做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方面就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以上是主观的，论到客观，在南京的几年中，汪先生的受气，恐怕不在广州非常会议之下，让我简略写点出来：

一个行政院，也就是一个内阁，它的大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和外交三者。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劝汪先生不要管军事，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宋子文的说话，自然是受蒋先生的命令来说的，那些说话哪里是劝告，简直是警告罢了。汪先生自是对于军事毫不过问，对于蒋先生手下的军队自然不敢问闻，即对他以为是属于自己的第四军，也时刻避嫌，不愿接近。四川的刘文辉本来是拥护汪先生的，在汪先生行政院长的任内，就为刘湘攻击。刘湘是受蒋先生卵翼的，购买军械和飞机，得蒋先生助力不少，因为四川深处腹地，运送军械要经上海，经南京，经汉口，倘使蒋先生不帮助，随时都可扣留。二刘在四川打起来，中央政府一些也不敢过问，我在中政会议提

过几次要制裁，可是大家似是莫逆于心，绝对通不过。中央既然不能制裁，中央既然不能讲法律，地方只有实力解决了。因之刘文辉终于失败退了西康，汪先生只好承认事实，徇蒋先生之意，任　刘湘做四川省政府的主席。

财政一项也为宋子文绝对把持，用人是专断的，政策是秘密的，汪先生初到南京，想介绍唐有壬做财政次长，子文很干脆的拒绝。财政部所做什么事，行政院再也休想知风声。宋子文这位先生，他把持财政的情形，不独把汪先生挤在门外，蒋先生也有时蒙在鼓里，后来蒋先生再忍不住，压迫他辞职，换了一个听话的孔庸之。但孔老先生是只听蒋先生的话，而绝不听汪先生的话，就是法币政策罢，那是国家何等重大的事，连孙哲生也给他秘密通知了，可是对于汪先生就只字不提。提出预算案哪，发行公债哪，增减税率哪，事前绝不讨论，都是临时提出行政院，非立刻通过不行，也非立刻实施不可。宋孔两位亲戚真是萧规曹随，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提出议案，而是指挥会议。

说到外交，汪先生也是难于作主的，那时的外交，还说不上方针，全国只是瞎跟着国联，以为国联等于英国的国会。英国的国会权力，除了男不能变女，女不能变男之外，什么都可以解决，不过巴力门是英国的国会，而国联是世界的国会，一般中国人都那样想。外交部长罗钧任先生根本就不谈，也不想方针，私室内摆下一副牙牌神卦，遇到外交紧急之时，摆摆牙牌卦以卜休咎。赶到罗钧任去职之后，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那时岂止外交情报蒋先生没有尽量告诉汪先生，连在北方的黄膺白委员长，

也未必得到蒋先生的情报。一次黄膺白很愤慨了，对着我们也公开说："要我对付日本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给我，哪能够？还有更痛苦的，蒋先生答应了日本什么也应该通知我。常常都这样，日本人来要求，我拒绝，他说蒋先生已答应了，赶到我打电问蒋先生，果有其事，但为什么不通知我呢？"他又愤慨的说，他有一次再忍不住，打电报到牯岭骂蒋先生，请他对于外间说黄膺白卖国的谣言，也应该解释一下，电报示了一句话："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他和蒋先生是把兄弟，私人来往电报，都称蒋先生为弟，而称自己为兄。

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

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

我是懒惰吗？不，我实在管不了。无论哪里有民众纠纷，我派人去调查，各地党部一律奉命挡驾。更有奇怪的，我时常派人到上海调查和调解劳资纠纷，这个特派员住在远东旅馆，上海市党部就派人住在远东旅馆，那个特派员住在大东旅馆，上海市党部也派人住在大东旅馆。为什么呢？他们怕改组派活动，所以不得不派人监视和侦查。其后黄埔和二陈斗争，民众训练部还更难处。上海的总工会违法成立，中央是不能过问的，汉口的总工会被黄埔赶了二陈系，自行占据，中央只好塞明闭聪，让他们闹。党部太没有办法了，我辞了两次职，中央也不管，最后叶秘书长索性连我的辞职书也不给提，我只好交给王陆一先生，让他天天召集科长们在他公馆打小麻将了。

各省党部自然一气的起下承上，打击改组派。浙江省党部可以把改组派的人绑票，等到选举完竣才放出来，山东省党部更不客气，关了许多改组派，选举完竣，还囚在牢里，老不释放。汪先生自解散改组同志会后，已没有组织，然而改组派的朋友也不许活动，汪先生只好叹口气，一直等到二十五年改组派的朋友都变了羔羊，这些奇怪的现象才慢慢减少。

大事叙过了，我还叙些小事。我也不愿说蒋先生有意和我们为难，但底下的从龙人物，揣摩风气者多，我们刚到南京，上海已办了不少专对我们攻击的杂志。当中杂志最著名的要算《现代新闻》，这个杂志是屡次改名换姓的，而主持人是从前跟李之龙的丁默村。这个《现代新闻》，每次都有系统的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他们的眼中把改组派和共产党等量齐观，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登载一段消息，说上海没收日货值八千余万元，我把它变卖，完全充作改组派的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市党部才知内容，但这个《现代新闻》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先生底下人，我哪里能过问呢，不只是冷笑一下便算了么。

希风承旨的人太多了，骂汪先生和改组派的，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不满意于汪先生而投降过去的人们，要想做官，不得不大张旗鼓，尽量向汪派诋毁。汪夫人所认为最亲信的李恩焆先生，不知为着什么，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了，在上海办了一个月刊，第一期插着一幅漫画，绘着一家妓院，将汪先生绘成一个大茶壶，在门口拉人，门边挂着许多妓女的招牌，写着陈璧君和方君璧等等。谁说中国出版不自由，他们也是经过检查的，居然出版，居然行销，中国真变成民主国家了，啊，倒不是的，因为他们有极有力的背景。

黄埔团体出版的《灯塔》又陆续制造改组派的阴谋，那个《灯塔》本是黄埔的秘密刊物，而用以指挥他们团体工作的，每星期出一次，专载各党派的消息。在这个《灯塔》里，刊载改组

派恢复组织的通讯，说主持大计的是我和褚民谊与曾仲鸣。汪先生再忍不住，拿去质问蒋先生，及蒋先生追究起来，他们拿出同期的杂志，里面的文章一字不易，单了没有那篇东西在内。那一定是追究起来，临时抽出再版了，否则必定同时有两个《灯塔》了，或者是我们故意栽赃诬陷了。

甚至乎汪先生在洛阳召集一个国难会议，也足以使蒋先生的左右震惊，说："不得了，老汪收买知识阶级的人心了。"他们赶快向蒋先生上条陈，在军事委员会内，成立一个资源委员会。聪明的钱昌照先生，他替蒋先生拉了许多专门人材，丁文江、翁文灏等，都网罗在军事委员会的幕下。这个资源委员会专门和实业部为难，这也难怪他们，孔夫子还说，我待价而沽诸，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又那能责怪君子知几其神的知识阶级。

…………

小事说过，我似乎又该补述一番大事。那时中国的大事，最大无过于中日问题。汪先生对于日本问题的态度，他对于军事不大了了，最初他主张积极抗战，"一二八"十九路军能够在上海作战，不能不说汪先生是一个幕后的支持者。他看见张汉卿不抵抗，愤而辞职下野，这也不能说他纯粹由于冲动，他的确有爱国的诚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欧洲居住几个月，他已明了国际的情形，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俄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心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汪先生的意见如此，可惜他在二十四年八月之前，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至于蒋先生呢？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要打共产党则不能不联日，要抗日本则不能不联俄，但共产党正盘据着江西，怎可联俄以使共产党坐大呢？他决意使汪先生和黄膺白对日妥协，使他可以专心剿共；等到共产党消灭之后，然后才以国民政府的资格，拿莫斯科政府作对手，订立军事同盟，这样中国回头抗日本，东四省一定可以收回，华北一定可以脱日本的羁绊，而他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定可以成功。

我在二十三年夏天，已看出汪蒋所走的路太纷歧，我力劝汪先生不干，一而再，再而三，汪先生也讨厌我起来，一次竟征求我的同意去任德国大使。汪先生太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劝他不干，是想大家都不干，我并非想置身事外，贪图舒服，而到外国去养老。我谢绝汪先生的好意，一直挨到二十四年夏天，荏苒又是一年我忍不住，遂打算单独辞职。

民国二十四年的夏天，汪先生的糖尿病和肝病一齐发，在上海医了一个多月，医生劝他到青岛。那时黄季宽奉了蒋先生之命往四川，商洽一个对日和平方案，带到青岛和汪先生商议。汪先生打了一个电报来，嘱我和黄季宽一齐到青岛商量，我在八月五日早晨在明故宫等候黄季宽由上海坐飞机来，附机一起飞青岛。

到了青岛，季宽和我齐见汪先生，季宽把那个方案很谨慎的掏出来，和汪先生讨论了一阵。奇怪得很，我虽然同季宽一起见汪先生，汪先生却始终没有给那方案我看。我也不再问，只在旁边洗耳恭听，我们谈毕出来，汪先生嘱我第二日下午三点钟单独见面。

果然第二日下午我单独去了,汪先生劈头便问:

"你真打算辞职吗?"

"怎么不是,我真是一天也挨不下去了。"我决然的答复汪先生。

"唔!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

"汪先生什么时候回南京呢?"

"我大约十五回上海,二十回南京,听说蒋先生也将回来,他要约我相见。"

"汪先生如果二十回南京,我准备二十五日上辞呈,希望在九月一日交代。"

好,就这样决定罢,我们又谈了一阵继任的人选问题,我便兴辞而出。那时我真高兴极了,夜里和沈成章市长大喝其酒,真有些无官一身轻的感觉。赶到第五天下午,我还大醉睡中觉,汪夫人到了东海饭店,从床上拉我起来:

"汪先生有事找你去,怎么你喝得这样醉?"

"我面上太红了,等今夜再去罢。"

"不行,他有事等着你呢!"

我踉跄的赶到汪先生所住的韩复榘别墅,汪先生只是一个人在房中。

"你真打算走吗?"汪先生问我。

"汪先生不是已准我辞职了吗?"我很惊异的何以汪先生有此一问。

"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汪先生面色突然沉下来,我和汪先生做了朋友十几年,没有见过他那样断然的态度,"也许我在病中,我的说话是带病态的说话。我们

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已五十多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有中国再不损失主权和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汪先生是决定的了。”我问。

“是，我是决定的。”汪先生面色还是那样沉毅。

“我可不可以再说几句话呢？”我再问。

“自然可以说。”汪先生还是很严肃。

“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我想秦桧当日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复兴，然而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日国难更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黄膺白优为之，张岳军也优为之，又何必你汪精卫去送国。”我乘着酒意，一气说了许多冲动话。

“不过黄膺白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汪先生对我的疑问，又加以解释。

“不过我对于这种无计划的牺牲，总觉得值不得。”我又想

劝谏。

“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我已五十多了。”汪先生听了我话，沉思了一阵，又加上一层决意。

“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我谈毕之后下楼，汪夫人已洗了海水浴回来，我说：

“汪夫人，我从来没听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

好，又不走罢了，翌午我和季宽又飞回南京。过了几天中政会开会，为着外交问题吵起来，首先由张溥泉发难，而反汪大将张厉生继之，把汪先生批评得体无完肤，汪先生听见了，由青岛来一电报，呈请中政会辞职。这场风波又使张岳军衔了蒋先生之命跑青岛一次，才决定汪先生维持行政院的局面，至六中全会为止，开了会后再商量人选。

…………

说到第二次汪蒋合作，在汪这方面不能不算竭诚，而在蒋方面，则犹存疑忌。不止第二次如此，即第一次合作时，汪先生于万难中也提出蒋先生复职总司令，本来不必赶李任潮的，也徇蒋先生之意和桂系不睦；当时炙手可热的桂系同情是失尽了，国内对于汪先生善变的谣诼也流行了。至于第二次汪蒋合作，汪先生也于洛阳的二中全会提出蒋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是也失了胡展堂先生的期望，和李白对汪的热诚。当汪先生提出委员长的提案时，我两次请汪先生慎重，

汪先生怫然变色，说："我死也要这样做。"不止汪先生对蒋开诚布公，连汪夫人也对蒋弃嫌修好，每次我们稍有一两句批评蒋先生，即用斩钉截铁的态度，封住了我们的口，说："我是相信他的，我不懂你们怀着什么坏心事。"唉，汪蒋合作原是一件好事，我们何必反对，白费唇舌呢！

不过蒋先生有许多对不起汪先生的地方，凡反汪的中央委员，蒋先生无不置之高位，那位张厉生先生本来一无所长，但以反汪最力，得任为组织部长了。改组派的同志，具有君子知几其神的技术的，无论顶不堪，但求大骂汪精卫和改组派的，准有相当的工作。对于中日交涉，情形更显明，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固然蒋先生有他的困难，中国毫无对外作战的准备，事实上不能作战，但他是带兵的，不是拿笔的，一国的军事最高当局，若说不能战的话，马上塌台。汪先生知其然，他为着大局，为着蒋先生，只好以文人资格，不断发出妥洽论。

蒋先生的态度也真模棱，对于全国人士，当然不愿意漏出一字"和"，即对于他的部下，凡主战的来见他，他告诉他们一定要打，凡主和的去见他，他告诉他们怎样去妥洽。因蒋先生的模棱，底下遂分了两派，互相攻击，互相诋毁，然而他们虽然互相攻击和诋毁，但对外都是蒋先生的人，于是对外宣传都说主和是汪先生的主张，南京凡是主和的人们都因受了汪先生的暗示。甚至乎那位孔庸之老先生也对金融界宣称，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孔老先生根本就反对战，但那是另一回事，他对外宣传，总是归罪汪先生，这是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馥荪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馥荪先生是老实人，不会对我说假话的。

中国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何况东四省事实上被日本占据了几年，又成立一个满洲国？并且日本驻华军人的横行，贩毒，走私，扶持了殷汝耕组织冀东自治政府，支撑着宋哲元半独立的冀察委员会，那都是一件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于是全国的人心愤怒了，激昂了。蒋先生事实上不能打，但不打又失人望，底下的聪明才智之士，迫得替他作虚伪的宣传，说蒋先生随时都想打，不愿打的只有一个汪先生。蒋先生的底下人都这样说，一定不会假的罢，于是汪先生遂又变为众矢之的。

蒋先生对于这些宣传，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固然没有禁止，也从来没有在公共场所辩明。中政会议攻击汪先生不止一次，蒋先生总是不作声。六全大会，汪先生受伤卧在中央医院，蒋先生替他作外交报告，其时我真代蒋先生耽心，因为在报告里头，说打罢，立刻引起变故，说和吗，蒋先生绝对不敢负这责任。到底蒋先生有肆应之才，拿着孙先生的民族主义讲演中，拣出一节背诵了一过，出席的人们大拍掌，张溥泉大声叫："我们不信任外交当局，我们只有拥护蒋先生。打倒外交当局，打倒外交当局。"一时拍掌附和之声，震动屋瓦。蒋先生也不替汪先生辩护，也不声明和汪先生共同负责，我只有暗地把黄膺白电报背一遍："毋使天下后世，以兄为卖国者，而以弟为爱国者也。"

至于私人谈话，蒋先生也不是不说几句良心话的，六全大会，西南的代表到会，蒋先生请他们私宴时，曾对黄季陆先生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国，为党，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但蒋先生为什么不公开说一两句这类的负责话

呢？那只有蒋先生自己才知道，我是莫测高深的。

平情而论，蒋先生这几年当中，“最高领袖”四个字，由他底下的人喊出来，由黄埔喊到庐山的军训团，由军训团喊到全国，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这位汪先生在南京，军事财政不过问，外交做了蒋先生的护身箭垛子。胡先生是默默无闻，并且在广州抑郁死了，汪先生又低首下心的，差不多变了蒋先生的幕僚了，天下的物望无所归，结果大有民国初元“非袁莫属”之势，于是“全国最高领袖”遂由暗暗叫喊而明明抬出来，天下之人大有莫逆于心，无有间然之象。

蒋先生的独裁，都是老汪做成的，国内的人这样说，党内的元老也这样说。于右任和居觉生等老先生，因见事无可为，而且又要在南京做官，终于驯服了。还有些如不乐做官的蔡元培，为宋子文免职而不服气的李石曾，再也忍不住，在二十四年头，约汪先生到上海，凭着老友的资格，当面向汪先生质问，并要汪先生反蒋。

“汪先生这几年在南京的工作，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他们向汪先生责备。

“实在说，前几年我的力量虽然不能说比蒋强大，也可以说至少和蒋颉颃。可是我的力量都被你们老先生同心协力打光了。打光了我的力量而又劝我反蒋，究竟是什么意思？”汪先生这次算是对一般老先生报了一个仇。

最高领袖是养成了，主张妥洽又全是汪先生的罪了，汪先生被刺，怪不得有一部分高兴！

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

陈伯南先生下野，本来是一件极其微细的事，似乎值不得叙述，不过这次虽然没有放过一枪，蒋先生也因此动过三四十万的大兵，为着这点，或者也不能算一件太小的事，只好加以描写。

伯南先生怎样下野的？那经过也太滑稽。不过那滑稽还不止下野的当时，就以他坐镇广东八年的勋绩，也够耐人寻味。我不大佩服伯南先生的才干，但不能不钦羡他的福气；说他处事有没有一两手的技术呢？那也不能一笔抹煞。他自从宁粤合作之后，拿着一个西南政务委员会在那里变戏法，倘使他不满意于南京，便说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议决如何如何，倘使他要抵抗胡展堂先生，又说中央的命令怎样怎样。要而言之，终他在粤的数年，他确有他的神通，虽然不大高明，但也左右逢源，无不如意。

他对于他私人财政的安排，确是不大理于人口，他纵容他的老哥陈维周走私，所谓走私，实在是公然的输运；他们利用兵舰走私货，海关人员，只好白着眼让他们逍遥往来，他更纵容他的夫人莫秀英作投机买卖，广东没有公债可炒，她就炒香港纸币，广东银号有不利于她的开盘，她居然亲自带宪兵马弁出马，立刻禁止银号交易。他和他的夫人，他的老哥，究竟

有多少私产，谁也无法估计，只是陈维周先生为着他未嫁的女儿死亡，唪佛念经，开丧接吊，一用便二十几万，这可使一般穷措大张口结舌而不能下的。

伯南还有一种古怪的脾气，他迷信风水，迷信扶乩，举凡迷信的事，很象归他个人独占，一股碌包揽在身上。他用的军官，要先替他算命，看他们的八字是否和他老先生相冲；要先替他们看相，看他们面上和身上到底有无反骨。他凡是举大事，是必要扶乩用不着说了，最妙的他听了风水先生的说话，说洪秀全的祖坟本来出皇帝，因为葬错了方向，洪秀全才失败。他用势力，出金钱，终于买了洪秀全的祖坟，硬把他的母亲重新由坟里掘起，安葬在洪秀全的祖坟里。

陈先生许多妙事，确够他的失败了。他的失败不要紧，还累我为难了许多天。事实是这样，当汪先生入南京主政之时，我们曾约定不再赞成有内战，如果蒋先生再激动内战，我们首先设法阻止，倘或阻止不来，则惟有辞职下野，以为消极的抗议。可幸我们在京四年当局，还没有这种不祥的事发生，直至胡展堂先生逝世，我以为广东再不会动了。

我还记得胡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孙哲生先生约了一班广东人在他陵园寓所谈话，在座的有李文范、吴铁城、马超俊、陈策、傅秉常、刘维炽，一大群人。孙哲生先生请我入书室，问我对于广东今后的态度怎样，我当时有一个很明白的表示。我说：

"汪先生在中央服务几年，没有想过在地方树势力，我个人则更久矣乎不想回广东，所以你对于广东怎样，只有通知我一声，我无不鼎力相助。

“不过你得注意，你或者想拿广东作一个力量，然而你的矛盾还靠你自己解除，因为陈策、陈庆云、张惠长，是你的亲信，他们就给陈伯南赶出来。你是舍旧怨而与伯南交好呢？还是要修旧怨而与伯南交恶，另树新的力量呢？那你只有自己选择，我是无从助力的。

“只有一节，我要再三声明，我和汪先生都不赞成再有内战的，南京打广东，我们固然不赞成，广东打南京，我们也不赞成。除此以外，你对广东要我助力时，我总尽力帮助。”

不料胡先生死了不多时，广东居然向湖南出兵，其原因如何，我至今还莫明其妙。当时纷纷其说，有说陈伯南先生老早已想举兵，只是要举兵，不能不奉胡先生为领袖。现在的伯南先生已今非昔比，他实在不需要领袖，而自己要当领袖。胡先生在世，他不好举兵，胡先生逝世，他立刻要动手。也有说陈维周曾带了一个相士名唤翁半玄的到南京谒见蒋先生，他们看出蒋先生大运已去，必将下野，因此趁此时机，举兵争霸。这说是否真实，我不得而知，但维周先生的确曾来过南京，路经上海，适我也在那里，也来见过我，他很恭而敬之的称我为老上司，我问起理由，他说我在广东当农工厅长时，他是当县长，所以有僚属之雅。

伯南对于这次出兵大事，听说还扶过一次乩，那乩上大书“机不可失”，于是伯南先生遂下决心，找了李德邻到广东开会议，决定以抗日为名，分兵出湖南和江西两省。德邻是无可无不可的，对于反蒋，正合着他的胃口和主张，拿了伯南几百万军费，便回广西发动。德邻和健生商议，健生还是很怀疑，德邻因此还发过一次脾气，说：“你们不是天天说反蒋吗？现在

伯南已决心了，你们又不干，是何道理？”

湖南主席何芸樵先生也接受了伯南一百二十万，准备欢迎两广部队入湖南。但广西的部队已出黄沙河越至衡州，广东军队还未至郴州，到了郴州又有一部分撤回广东界。为什么呢？难道又妥洽吗？不是的，因为伯南又扶乩，神仙告诉他，此次举事，实在不必用兵，可以传檄而定。蒋介石必倒，那又何必真要出兵，多此一举。

那时正是夏天天气，南京的气候，正和广东的消息一样闷热。我夜里关起门看书，白天打打网球，只由朋友方面传来消息，说这次内战一定打成了，说蒋先生已调动三十多万军队了，又说陈辞修依旧主张调停，又说余汉谋恐怕要降南京。我是不主张再有内战的，既然不在其位，且自由它，还是读我的书，写我的札记罢。

一天中午，我正在看书，天气太闷人，不由得心内起点焦躁，我的副官进来报告，说：

“蒋委员长的副官处来电话，说今夜委员长请客，如果部长去的，就送请帖，不去的，就不送请帖了。”

“说我身体不舒服，谢谢罢。”我沉吟了一下。蒋先生的饭，我最怕食。因他老先生往往终席不发一言，而被请的宾客又都诚惶诚恐，固然无酒可饮，亦无烟可吸，纵使来宾身边带烟卷，为那干枯的空气所压，谁也不愿意首先抽烟。而且广东的军事正紧张，难保不讨论内战问题，更使我无可置答。

副官回了话，请帖却依旧送来，到了八点钟，蒋公馆又来电话：“陈部长不舒服，是不是不能起床？若能起床的话，还请来一下，因为蒋先生有事奉商。”

这一下却使我为难了，我吩咐副官答复，说我的确不能来食饭，假如有事的话，请于席散之时，再打电话来，我准到蒋公馆领教。九时过去了，十时又过去了，我如释重负，心里想大概不会再迫我了罢，迨时钟到了十时半，蒋公馆终于来电话，说席已散了，蒋先生和宾客正等着，请我立刻去。

蒋先生那时住在孝陵卫的孔庸之公馆，我到时，大家都坐在屋后的草场，电灯没有亮，人数又很多，从厅内射出的灯光，我微蒙的看见都坐着广东人，唐少川、王亮畴、孙哲生、李君珮、陈树人、陈策、傅秉常、刘季生，还有许多人，我不大记得，大概都是留京的粤籍中委。蒋先生招呼我坐在他的左手，我知道一定为着陈伯南的事情，并且推测到已经定了办法，只不过要我来画一个诺。

"余汉谋已于今天到南京了。"大家沉默了一阵，蒋先生向我说，似乎告诉我一点好消息。

"余汉谋这次来，不是陈伯南叫他来的，是他自动来的。"蒋先生又加上一句解释，恐怕我还不明白。

"我们大家商议一个提案，提议取消广州政治分会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请你也签个字。"这时孙哲生向我发议论了。

哲生先生手下的大将陈策，已不待我答话，赶忙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上面自唐少川以下都署了名。蒋先生看我没有笔，吩咐他的副官进厅内拿笔墨。统一是我的主张，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尤其是我的主张，但这幕戏剧，显然是孙哲生布景的，但为什么不在事前通知一下我，却似摆设鸿门宴，强迫我签字。我心里大不高兴，签了字便辞了蒋先生回去。

哲生先生当时确乎非常起劲，因为余汉谋之来，曾和他接

过头，除了省政府主席，蒋先生内定黄慕松之外，其余厅长人选，哲生都想出主张，民政厅定了立法院的秘书长梁寒操，建设厅定了实业部次长刘季生，不过财政则蒋先生早已定了宋子良，哲生想那时过问财政，已来不及。甚至余汉谋军队的政治部主任也定了立法委员钟天心，陈策先生虽然很想重握珠江的海军，到底仅得一个虎门要塞司令。

余汉谋一变，广东各军队都摇动起来，师长李汉魂来一个关云长挂印封金，通电辞职，别一个师长邓龙光也连带通电反对，不辞而行。有几艘兵舰逃出了粤海，归附了中央，更给伯南以至命伤的，黄秉衡带了许多飞机师，驾了飞机，一气飞到南昌中央的飞机场降落，银样蜡枪头的陈伯南，看大事已去，宣布下野，末后还听人说一件笑话，他事急起来又扶乩，乩上还是照旧大书特书"机不可失"。呵，前次乩语所谓机不可失，并不是说时机不可失，而是说飞机不可失。现在飞机已全飞附中央了，大事也去了，伯南先生似乎还不大识时务，派了一位师长陈汉光到牯岭见蒋先生，他是答应下野，但请蒋先生不要交广东给余汉谋。下野的人物说话还灵应么，当然照例应毋庸议，于是陈伯南先生只有悄然下野了。

陈伯南先生下野之后，又便宜了几个人，财政厅、两广盐运使，自然交代不清，继任的人物宋子良和唐海安得了很多好处，才风平浪静的过去。广东问题既已解决，蒋先生想以高压之势，屈服广西，不俟李白的同意，发表了白健生当浙江省政府主席，黄季宽当广西绥靖主任，然而李白知道若服从蒋先生命令，无异乎自杀，反正都不了，不如抵抗罢。

广西不独不服从，并且出兵广东的南路，占据了北海，并

且在海口又闹了一件交涉。蒋先生到底能忍耐，急忙化军事的解决为政治的解决，两方代表坐了飞机来往了几次，白健生和黄季宽的任命终于取消，自后李白依然坐镇广西，西南又宣告和平解决。

广东问题，其起也勃然，其终也寂然，不满一月，兵不血刃，而大局安定，这真是我们始料所不及，匪独西南民众之福，盖亦中华民国之福也。

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对于我是绝大的一个谜。读者要知道内容，爱读"官书"的，可以看看蒋先生自己著的《西安半月记》，爱发现秘密的，可以看看依格斯诺（Edgar Snow）所著的《遍布中国的红星（Red Star Over China）》——后来有人译为《西行漫记》。我呢，对于这两本书，以为《西安半月记》有不少自己隐讳的地方，而《遍布中国的红星》则太袒护和颂扬共产党。

我对于西安事变说它是绝大一个谜，不是说它谜在原因，而说它谜在结果。蒋先生在西安究竟答应了张汉卿、杨虎城和共产党什么条件，恐怕除了参加西安谈话的几个人之外，谁也始终蒙在鼓里。

廿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记得是张岳军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请我们食饭，那夜是两桌人，孙哲生也在内。那夜我不知为

什么，大概是偶然罢，不到七时便到了外交官舍，除了我之外，一个客也还没有到。张岳军匆匆的下楼招呼我，又匆匆的上楼，我觉得他神色张惶，而又故作镇静的样子。这时已有两三个客来，张岳军又下楼拉我到饭厅。

“蒋先生被捉了。”岳军还沉着。

“是被谁捉的。”我有点惊诧，因我以为蒋先生还在洛阳。蒋先生的行踪报纸一律不敢登载的，我对于蒋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愿意打听。

“被张汉卿捉的。”岳军似乎怪我连蒋先生早到西安的临潼还不知道。

“现在蒋先生在哪里？”我不由得感觉有些悲哀。

“今早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城了。”岳军声音也显了哽咽，但嘴边似乎挂着苦笑，掩饰他的悲痛。

“唉。”我不觉流下泪来，“我虽然和蒋先生很隔膜，但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抑制不住我的伤心，因为蒋先生到底是国民党一个负责人，今日遭遇了这个悲运，我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说，孙哲生来了。” 军抑着我，其时孙哲生入了客厅。

那夜的宴会算是草草终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后，岳军告诉我他要去何敬之公馆开会议，而我则要去告诉汪夫人，我约定见了汪夫人之后，再到何公馆会合。

是的，我一向一肚子不高兴蒋先生，自人南京之后，我的态度依然一般的强硬。我有一个怪脾气，也可以说是一种偏见，我凡是交朋友，如果这个朋友第一次对我不起，我很容易

原谅他，因为一个人谁没有过失呢，谁不会有误会呢？如果这个朋友第二次对我不起，我也原谅他，或者那不是他的过失和误会，而是一定我有不对的地方？我再反省，再原谅。及至这个朋友第三次对我不起，那就不管是他错或是我错，我决定不再做朋友。蒋先生对我不起，不止两次了。我最不平的是他无缘无故弄起三月二十之变，他要争领袖倒也罢了，他偏偏在李家桥对我胡诌谣言，说他之逐汪，是为汪要谋害他，我这个人一世都不肯受人骗，叫我如何能容忍？末后第一次汪蒋合作，我对于他也算弃嫌修好了，然而他一定要我们驱逐李任潮，及至我们失败，他又拿几十万给李任潮打我，这种翻云覆雨的手腕，不只使我看不惯，并且也使我沉不住。民国十七年胡先生由欧回国，他真张惶失措，要我替他办宣传，要我叫刘铁夫到塘沽夺白健生的队伍，及至胡先生提出妥洽方案，他反而压迫《革命评论》，迫我出洋，又在三全大会警告汪先生，开除了我们的党籍。这种举动还能谈政治道德吗？还能讲个人友谊吗？我决定不再和蒋先生做朋友了。

民国二十一年到了南京之后，我决定只和蒋先生存在着政治的关系，绝不恢复私人的友谊。他写信或打电话来请，我一定去看他；他征询我的意见，我一定知无不言。至于他请公饭的应酬，我照例请三次去一次，除此我从来不自动上他的门。自民国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蒋先生为着剿匪住江西，那时庐山俨然变了一个太上政府，我足迹就没有踏上过牯岭，无论南京夏天天气怎样闷热，我也接受着。

我的不奉承蒋先生，显然是公开的秘密。“到底公博有骨

气。”蒋先生底下的人也私自下了这个意外的批评。

“公博，你为什么不敷衍敷衍蒋先生呢？”汪先生大约也有些看不顺眼，一天终于劝我。

“我已决定不和蒋先生做朋友。为着政治关系，汪先生不能不敷衍蒋先生，至于我呢，没有很大的政治关系，我就不愿意再敷衍。”我依然坚持着我的成见。

至于宋子文也屡次劝我不妨对蒋先生让步，我说：

“（蒋先生是不容易做朋友的） General Chiang is very hard to make friends with。” 我用英语答子文，我们两个人向来谈话都用英语，因我不懂他的上海话，而他或者也不懂我的官话。

“（蒋先生不要朋友，只要僚属的） General Chiang does not want any friend; he only wants subordinates。”子文这样答复我。

老实说，我就愿意做僚属，也不愿意投到蒋先生的门，算了罢，我还是做我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我当日听了蒋先生被捉的消息，心内倒有些凄然，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的，也鄙视幸灾乐祸的，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桀骜枭雄，结果也象胡展堂和李任潮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对于他一向的强项，似乎已登时软下来了。

而且他的被捉，生死未可预期，他落在别人的手也还罢了，今日倒落在无法无天的张汉卿，无知无识的杨虎城，和素与国民党敌对的共产党之手，如何使我不同情，不悲愤！

…………

东北军早有异动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早

就知道了。钱公来先生是一个东北人，从前做过张汉卿的秘书，也是一个改组派的朋友；张汉卿自从解除了副总司令之后，他闲住在北平，虽然他闲住，可是对于东北军的人都厮熟，对于东北军的消息特别灵通和清楚。他为着张汉卿蓄有异志，曾两次到南京报告我。但他老先生的意思，并不是有害于张汉卿，他以为我和汉卿有相当的友谊，希望我劝劝汉卿，早日悬崖勒马。

"张汉卿已和共产党妥洽，陈先生知道吗？"钱先生诚诚恳恳的告诉我。

"我一概不知道，这恐怕是谣言罢。"我无论怎样也想不到张汉卿有这转变。

"事情很的确，因为张汉卿入陕之后，给共产党打了几次败仗，损失了好几万人，此后他的东北军，见了共产党差不多望而生畏。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又有两个近因，第一个是张汉卿自离开北平，他的底下人许多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已钻入陕西张汉卿的幕下，自命为东北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第二个原因是陈立夫们也太不管好歹了，五全大会张汉卿提出王树常和他的秘书长为中央委员，然而立夫选出不知名的CC系，使张汉卿和他底下的人都不满，这班失意的先生们，更日日怂恿他反南京。陈先生，你想消消不塞，收成江河，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汉卿个人，也应该设点法。陈先生，你和汉卿是好朋友，所以我请你有机会劝劝他，以免他走入自杀之路。"钱先生又诚诚恳恳的请求我。

"他怎样和共产党妥洽？"我还是不大清楚。

“东北军不打仗已大半年了。他们也不打共产党，共产党也不打他们，听说他们还做军械的交易，东北军预先把军械埋在指定的地下，共产党来，一哄便走。等到共产党拿到了军械，把购买军械的钱埋在原处，东北军又哄回来去拿钱，这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钱先生又嗟叹着。

“这样大事，难道蒋先生毫无所闻吗？”我不胜惊异之至。

“这个我不知道。蒋先生也许知道一点风声，但知道又哪能奈何张汉卿？不过他们实在那里干了。”钱先生确关心国家和张汉卿的本人。

“他们拿什么口号不打共产党？”我又追问着，因为总不明白张汉卿变得那样快。

“他们主张抗日，主张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钱先生到这时候才告诉我东北军的最近主张。

“张汉卿不是著名不抵抗的？为什么今日又大吹大擂抗日？”我忍不住笑起来。

“那自然哪，他怕在东北打仗，所以不抵抗日本。现在他在西北又怕打仗，所以愿意回老家。我看他怕打仗是真，抗日是假。”钱先生到底是一个改组派，对我说出他观察出来的真意见。

我答应钱先生倘我见着汉卿时，一定苦劝他，可是我自从和钱先生谈过话之后，张汉卿就没有来过南京，只是从朋友方面得了些未可全信的消息，说他时时请了太太和小姐们到西安玩，就在西安宾馆开跳舞会，一时还未动南京和上海的游兴。这个东北军异动的消息太严重了，我本来也想告诉蒋先生，不过一来我不愿上他的门，二来他和张汉卿的关系比什

么都密切。张汉卿自从举兵入关，摧破扩大会议，蒋先生当他是中兴的功臣，并且听说张汉卿的夫人于凤至曾拜宋老太太作干娘，社会上又久已传闻，说张汉卿要聘孔庸之的小姐作媳妇。这样差不多等于君主时代，立中兴之功，兼外戚之贵，我如何肯犯"疏不间亲"之嫌，去报告这个未可全靠的消息。而且说到张汉卿罢，我对于他的印象还不错，最使我认为漂亮的是在郑州兵败时留给我们那一封信。我认定这个人只是太爱玩一点，但还是一个爽快人，然而在他离国向我辞行时，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又认定这个人不知有国，只知有己。

他离国赴欧，真是一个极失意的人，我这人是永不打落水狗的，何况我对他有相当好的印象？我不免对他安慰，不免对他同情，一谈就谈到日本进兵滦河和攻长城各口的事件。

"日本鬼子真可恶。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抢东北的，得不到东北是不肯住手的，所以在奉天我也不抵抗了，锦州也让出来了。我以为他们总可以心满意足了，不料他们今日又要打入关。日本鬼子真可恶！"张汉卿悔叹着他的掐指神算不灵，于是在无意中对我发闷气。

呵！原来他在沈阳的不抵抗，锦州的让出，都是他故意的，而且在计划中的，这我可不能原谅了；所以他回国之后，管他驻节武汉，管他移防陕西，我都是冷冷的，因为这种没有心肝的人，我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钱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对张汉卿最近的态度，还请我劝劝他。这种人是劝得下的吗？只是徒费唇舌而已。

钱先生回北平不久，蒋百里先生从德国归来。他是替蒋先生走德国路线的，这时又回国报告。他本住在上海，专等蒋

先生回京，但蒋先生久留洛阳不归，百里只好前去。他路过南京，照例来看我，他告诉我要到洛阳看蒋先生，顺道还要考查西北的军事。我告诉他最近张汉卿的情形，叫他最好只到洛阳为止，再不要上西安，恐怕东北军旦夕有变，不要受那无辜池鱼之累。百里先生似信不信的，依旧起程，实在当时我也是似信不信的，最多以为张汉卿有一部分队伍勾结了共产党，实在没有料到他本人就是一个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百里先生至西安之后，果然做了半个月的俘虏，他回来时，还悔恨不听我的金石良言，受了一场惊恐。其实我也何尝是未卜先知呢？只和他说了一句笑话："不听山人之言，致有今日之祸。"

…………

现在我可以重复叙及当夜的情形了，我离开外交官舍，即至赤壁路见汪夫人。他在我未到之前，已得西安事变消息，和我谈了一阵，我们一同到何敬之公馆。斗鸡闸的何公馆那时立刻戒起严，巷口和门口满布警备，我们入室，已见了不少人在座，大概中央委员和各院部的长官，凡是知道这个消息的，都不期而会的集在何敬之家里。可是人只管多，不象开会的样子，主人的何敬之忽起忽坐，而聚在厅内的各人，都在那里交头接目，喁喁私语。我见那样纷乱的情形，忍不住对何敬之提议：第一、政府应将真相公布天下，以释群疑。第二、政府应该明令讨伐，免得张汉卿拿住蒋先生对中央要挟。第三、以上两件事办到，才打电西安要求释放蒋先生。何敬之在口袋里掏出一本日记簿，把我的提议一一记上。那时大家手忙脚乱的混至十一时，又一起到中央党部开紧急会议。

那时的空气是紧张，情形是悲愤，许多年青的中央委员，

平日盛气虎虎的，到了那时，不知如何是好，多数缄默不作声。到底还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来，演说一番大道理，结论是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这个提议，在一致沉默和悲愤之中，全体通过。何敬之又报告当日下午已派飞机到西安和临潼侦察，据说在华清池前面，有好几堆穿黄色制服的，头对头的倒卧地上作梅花形，那无疑的全是殉难的守卫宪兵，死后给张学良的军队弃置在那里。又说西安城上已遍树了红旗，这个消息，到后来才证实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只是飞机师有先入为主之见，发生了这种错误侦察。

过了一夜，南京已接到西安通电，张汉卿和杨虎城已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立刻采取抗日政策。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南京把这个通电扣留起，一心一意的筹备讨伐，不过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早上蒋夫人已从上海回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并叫澳洲人端纳飞陕，探明张学良的真意。这位端纳先生在东北时原是张汉卿"顾而不问"的顾问，他是外国人，想张汉卿不致加害的。那时可以说党部的意见是一致，家庭的意见是不全同，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

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庸之先生本来在会场上是素来盛气凌人的，或者因蒋先生被困西安，没有靠背罢，那时真是低声下气，变了一个宽容大度的谦谦君子。连那位平日伈伈伣伣的居觉生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讨伐派大约是胜利了，然而不然，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敬之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我虽然没有冀幸大位的嫌疑，但以事成僵局，只好不管。为着西安事变，我倒得几日的清闲，宋子文和蒋鼎文的来往，我也从不过问，因为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象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

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我看这种情形，不特不好参预，还以早日离京为佳，趁着汪先生闻得西安事变，赶紧回国之时，我和汪夫人遂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先期赴香港迎候。

我们是在二十五早抵香港的，我即上岸，而汪夫人却乘原船直驶星加坡。夜里我一个人无聊，往平安戏院看电影，直到

十时左右微闻各地的鞭炮声，我心怀疑着，这是什么，或者果真万幸，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罢。迨电影完毕出场，街头报贩真卖着号外，说蒋先生已平安离西安，我心头一喜，虽不知经过怎样，但蒋先生得安然脱险，总是好的。

我在二十六日打了一个电报去慰问蒋先生，一住香港便十多天，等到汪先生在一月十二日抵香港，我才陪同他一起乘船回上海。那时中央派了周佛海、邵力子、周启刚，来迎汪先生，我又问问他们我离京后的情形，及蒋先生脱险的经过。

“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汪先生在船上闲谈起。

“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五十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我笑着分析蒋先生的脾气，汪先生也笑了。

我们回南京之后，知道蒋先生早已回奉化养病，张汉卿也已受过军事审判。他的受军事审判，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照例的定罪，也照例的特赦，这幕喜剧，虽然不是预先演习过，却早已预先排好的。只可怜任临时军事审判的审判长李协和先生，还在审判时受张汉卿一顿大骂，说南京这样腐败，那样反动，一个个都应被革命。差不多除了蒋先生一个人之外，人人都该骂；他虽然不骂蒋先生，但他居然捉过他，囚过他，放过他，这也太够了。李老先生虽受了这一肚子气，也无可奈何，终于张汉卿随着蒋先生到奉化，在他的夫人于凤至没有由英国回国之前，蒋先生还叫赵四小姐陪他日日逛雪窦山，在山谷

内大放鞭炮，听着霹拍的回音，来排遣他的闷气。

在南京又碰见蒋百里先生了，他是西安一个偶然的阶下囚！我询问他当时事变的实况。

“在事变当时，你受了惊恐没有？”我问。

“哪里没有？那时只好听天由命罢了。在别人还不知什么事，我倒忆起你的警告来，断定是张汉卿作反。”百里事后想起，也化惊为笑。

“我真替你耽心。你本来不必去的；若真不幸，岂不是天外飞来的横祸？”我补述我在京替他焦心的情形。

“还算好，我们没有一个伤。只是一个不幸的邵元冲，他或者因为是一个文人，听了枪响慌了，赶快爬过西安宾馆的墙找地方跳，杨虎城军队看见有人在墙上爬动，放了一枪，恰恰打破他的肾囊，这样才丧命。”百里又惋惜着。

“你们被禁时，岂不苦闷吗？”我想知道他们被禁的情况。

“那到没有什么。我们自幽禁一起之后，张汉卿跑来看我们，连说对不起，并每人给了二百元，叫我们打小麻将消遣。我们事到其间，也只好听天由命，终日大打麻将。”百里又笑起来。

“还有什么奇怪新闻？”我又问。

“呵！还有陈调元结婚的故事，因为陈继承夫妇来西安，还带着一个老妈。那时我们被捉，四处被汽车集中起来，囚犯的运输是不分贵贱尊卑的。刚好陈调元和陈继承的老妈同车，大家笑他和那个老妈结婚，我为此倒做了一首咸诗呢。”百里先生忘记了当时的痛苦，谈起更感兴趣了。

“那夜曾扩情还在西安电台广播，开首他说算不是受胁迫

的，到底是不是出于自动？”我又忆起曾扩情的广播来，曾先生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人，我不大敢信他有这样事。

“那倒确是自动的。现在蒋先生已把他关起来，说他无耻。”百里详细告诉我。

“听闻蒋先生在受困时，态度很强硬，这还像一个样子。”我又想问蒋先生的状况，那时《西安半月记》还没有出版。

“是的，当时态度的确很强硬，但到蒋鼎文离西安时，态度反而软了。大概当他被捉之时，情知必死，所以不怕死，迨后来蒋鼎文可以离西安回京送信，又不觉有生还之望，所以反而怕死了。唉！人总是人，很难说的。”百里不禁深深叹口气。

“我听见人说，蒋先生对张杨的训话，还是过后补做登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又忆起蒋先生那段训话。

“当时蒋先生夫妇在西安起飞时还很狼狈，大概他没有时间训话罢。”百里沉默了一回才答。

…………

西安事变的实况，我大概清楚了。蒋先生答应了张杨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没有签字于任何条件是事实，然而他确曾保证实行几件大事，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但知蒋先生离陕的那夜，全国都在放鞭炮，并且警察沿街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

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了。张岳军的外交部换了一个王宠畴，所谓爱国七君子也逍遥出狱，在各地大吹大擂的演说和出小册子了。

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的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

"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于力子先生贡献。

"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的问我意见。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

"你说得对。"力子很坦怀。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

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叙述西安事变算已完毕了，我想还补一段尾声罢。廿七年夏天的一夜，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那时蒋先生每个星期六都在武昌开一次座谈会，散会后我和张岳军一起渡江回汉口。那夜在船上仅得我们两个人，武汉江面那样阔，就是风平浪静，也得费半个钟头左右才渡得过江左岸。我们在船上太无聊了，我又和他开顽笑。

"你真是走'秘运'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你是秘书长，大本营你也是秘书长；最高国防会议你又是秘书长。倘若国民参政会成立你又做秘书长时，秘书长都给你包办完了。"我们时时没有事便彼此说笑。

"唉，我真不耐烦干。我曾对蒋先生辞过职，我愿意不穿洋服，就穿军服。穿洋服就是希望蒋先生放我出洋，穿军服就是希望蒋先生叫我带兵，我还是顶瓜瓜一个士官生呢！"张岳军一半叹气，一半说笑。

"谁叫你文武全才，今日正好弄得不文不武。"我又故意挖苦他。

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